

瞿秋白論稿

王铁仙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瞿秋白论稿

王铁仙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71037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971037

瞿秋白论稿

王铁仙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插页: 3 字数: 200 千字
1984 年 2 月第一版 1984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0 本

统一书号: 10135·012 定价: 1.00 元

序

丁景唐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主要奠基者之一，瞿秋白同志，逝世已经四十八年了。对于秋白同志在中国现代革命史、文学史上所作的贡献的研究，也已有了很长的历史。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如所周知，瞿秋白同志和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一样，曾横遭诬陷，备受凌辱。颠倒是非的“批判”，代替了科学的研究。连历年来从事秋白同志著译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的有关人员，也被诬加上一种莫须有的罪名。如今再返顾十年内乱时期秋白同志的遭遇，自是十分清楚：秋白同志并没有因此而被革命者和广大人民误解，正相反，他更为革命者和广大人民所理解、所崇敬。其实，早在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对他作出了明确的结论，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决议在斥责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及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时说：“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明确指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对瞿秋白的打击是错误的；而且，这个庄严的决议，确认他具有“无产阶级的英雄气

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如今，胡耀邦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明确肯定瞿秋白是党的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今年九月，新华社还发布了关于修复秋白同志在八宝山的墓的消息。正是由于党恢复了瞿秋白的历史地位，瞿秋白的研究才重新开展起来。

也正由于如此，近年来的瞿秋白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无论从研究的队伍，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方法看，都远远超过了建国后的十七年。人们摆脱了“左”的思想的束缚，本着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解放思想，着手研究瞿秋白同志多方面的理论著述和实践活动，诸如他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他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及其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的一些方面，还接触了过去极少探索的党史方面的问题。对秋白同志的生平事迹，也不断有新的发现和辨正。不少同志的文章的水准，比以前有了提高，还出版了诗歌注释和年谱等专书。这些文章和专著的作（编）者们，采取了认真的科学态度，通过具体的分析，力求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既阐述了秋白同志的卓越贡献和高贵品质，也实事求是地剖析了他的不足和弱点。还应当提到的是，一九八〇年六月中国文联等单位联合举行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四十五周年的大型座谈会后，由陆定一同志作序的《忆秋白》、《瞿秋白诗文选》，和凝聚着鲁迅和瞿秋白友谊的《鲁迅杂感选集》、译作《海上述林》等相继出版，新的较为完备的瞿秋白文集的编辑工作也在进行之中。这给读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资料，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我相信，待到新的瞿秋白文集出版，瞿秋白研究必将会更深广更系统地开展起来。

我自青年时代起，就十分敬仰瞿秋白同志，决心搜集他的遗著，考辨他的生平事迹，研究他在中国共产党最初十五年间的的工作、贡献和思想状况，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其间，我和文操（方

行)同志,积十余年之努力,搜求秋白同志的著译,编纂了一本《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一九五九年一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同年十月再版),为瞿秋白研究提供了经过初步科学鉴定的著译版本检索;同时,又从多方面考证秋白同志和鲁迅交往的史实,记述他们在并肩作战中结成的崇高的革命友谊,从而把鲁迅和瞿秋白领导左翼文艺阵线,粉碎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战斗历史——中国现代文化革命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调查清楚,并试图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至今想来还使我激动不已。近几年来,我深受三中全会以来大好形势的鼓舞,又遣春温上笔端,矢志不移,继续进行中断十年之久的研究。但个人的努力是微浅的。我更热望有更多的同志作多方面的探讨,进行深入研究,取得新的丰硕成果。

正是出于这种心情,我对王铁仙同志这本论稿的出版,感到亲切,为之欢欣。这本论稿,虽不能说已臻成熟,但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瞿秋白同志世界观的发展过程和文学活动,叙述了他的家世情况。其中对于瞿秋白思想发展、文艺思想的得失和作品的风格,有一些新的见解。我们还知道,铁仙同志的母亲是秋白同志的胞妹,因而他有有利条件,也挖掘了若干新的资料。铁仙同志经过多年辛苦耕耘,所取得的新的收获,确是令人高兴的。

董必武同志于一九五六年二月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题词说:“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这个题词,道出了革命事业发展规律的真谛。我们党的宏伟事业是如此,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也莫不如此。秋白同志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入中国的先驱者之一,对革命文学的建立和发展,曾经提出过许多正确的主张和有益的意见,充分体现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学的革命精神和党性原则。鲁迅、瞿秋白以及其他革命文学前辈们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上的建树,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时代的文

学，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事业，都是极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营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对于瞿秋白同志的著作和文艺思想，作为整体研究，应当说，还需要我们进行远比过去更艰巨的努力。我愿以此自勉，也以此励人。让我们有志于瞿秋白研究的同志们，互相勉励，不断努力，不断前进，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和专著，为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九八三年十月，上海。

502

目 次

瞿秋白的思想发展及其特点	1
“忏悔的贵族”	3
“‘新时代’的活泼稚儿”	15
“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	28
关于《多余的话》	42
简短的结语	51
瞿秋白散文的创作个性	54
心弦的乐谱	56
社会的画稿	65
瞿秋白杂文的战斗风格	68
明白晓畅的文艺性政论	69
与鲁迅杂文的异同	75
瞿秋白文艺思想再评价	88
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90
关于文学与人民的关系	106
关于现实主义	124
瞿秋白的鲁迅论	139
对鲁迅的基本评价	140
论鲁迅前期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144

论鲁迅世界观的转变	150
瞿秋白的家世及其他	154
始祖和原籍	155
世系	158
父母	165
少年时期的同学友伴和亲戚	175
景白和坚白	180
瞿秋白研究概述	186
黑暗年代	187
黎明以后	209
十年动乱	222
拨乱反正	226
后记	1

瞿秋白的思想发展及其特点

瞿秋白集革命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资质于一身，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和革命文学运动的开拓阶段，都留下了卓著的功绩，是一位举世敬仰的历史人物。然而，当历史翻到六十年代中期，在一场罕见的社会动乱和文化浩劫掀起来的时候，他却因为一篇《多余的话》，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由烈士而沦为“叛徒”，遭受了奇耻大辱。瞿秋白经历上的这种一身而二任的状况，瞿秋白评价上的这种剧烈升沉起落的遭遇，都要求我们特别注意探究他的世界观包括人生观的发展及其特点。这是因为，他的世界观，是他进行革命实际斗争和从事文学活动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他在这两个领域里功过得失的原由所在。如果对他的世界观有一个清楚的了解，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比较深入地认识他的全人，就有可能对他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评价。

当然，在瞿秋白政治上的罪名得到洗刷以后，并非没有人谈及他的思想发展。但是在那场风暴中被大加讨伐的《多余的话》，给人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致一些研究者在涉足瞿秋白思想方面时，太注目于这篇他本人写于一种特殊环境和心境里的“自我分析”，甚至以之为主要依据，因而明显地带有片面性。实际上，“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

人。”^①自吹自擂不足凭信，自我贬抑也是不能作为依据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却正是在真实反映出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固有风貌的同时，作了许多过份的自我否定。它只能作为我们了解瞿秋白临终前一段时间里的心情和某些思想侧面的资料，而不能说明他的思想品格的全部实际。它倒是提醒我们，一个人，哪怕是早已蜚声国内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思想感情和性格，也会出现多么复杂矛盾的状态，不能简单对待。这恰恰向我们提出了要求，要我们对他进行全面的分析，要我们通过他一生的言行，实事求是地勾画他的思想面貌及其发展的线索。

瞿秋白的一生，是在阶级斗争异常尖锐激烈并且急剧发展的岁月中度过的。他在少年时期，遇上了辛亥革命的风雨；自五四运动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始终紧张而艰苦地战斗，曲折而坚韧地前进，遗下了深深的足印。他的达几百万言的著述，也大多不难找到。从这些丰富的史实和著述，可以窥见他思想发展的轨迹。即使就他的自我分析和自我评论来说，作为一个多思善感的知识分子，从少年刚更事之时起，就屡屡可见。而那些“声明”，都是随时作出的，比之《多余的话》，更接近于他的思想实际，更有参考的价值。

纵观瞿秋白的一生，他的思想清楚地经历了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时期，并且具有贯串始终的特点。一九二三年以前，是他的前期。其中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他反叛了封建阶级，逐渐形成和深化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一九二〇年春至一九二三年初，则开始从革命民主主义向着共产主义转变，可称为过渡阶段。在整个前期，他都表现出真挚地追求真理的品质和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的精神。一九二三年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579页。

以后，他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他的后期，也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先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家和领导人之一，活跃在政治战线上；一九三一年后，则主要奋战在左翼文艺运动中，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奠基者之一。不过后期这两个阶段，是就战斗岗位的转移而言的，并无世界观的变化。在整个后期，他虽在政治和理论上暴露出一些弱点，但其共产主义世界观和革命精神，却只有深化而没有改变，始终表现出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很深的马克思主义修养、高度的党性、无畏的革命气概以及民主的作风。他的真挚地追求真理、真诚地为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精神，在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新基石上，获得了更加深刻的内
容。

现在，就让我们循着他前进的踪迹，看一看他思想发展的具体过程和特点吧。

“忏悔的贵族”

瞿秋白于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出生在江苏常州府武进县一个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里。迎接他来到世间的，是风雨飘摇、夜气如磐的中国社会。极其腐败的满清统治者在此前不久，已屈服在帝国主义的枪炮之下，接二连三地与他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他出生的翌年，又有八国联军的入侵，出现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国家，愈来愈深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人民，更加悲惨地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封建士大夫这个阶层，也在这社会性质的变化中，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急剧地破败跌落下来。

所谓封建士大夫，属于封建官僚阶层。这个阶层中的成员，有的虽不做官，也是有一定地位的“读书人”。瞿秋白的家庭作为

士大夫家庭，是相当典型的。它的祖上，就曾世代为官，同时又是所谓“书香门第”。瞿秋白后来曾分析、回顾了它的特点及其衰落，说：“中国曾有所谓‘士’的阶级，和欧洲的知识阶级相仿佛而意义大不相同。在过去时代，中国的‘士’在社会上享有特权，实是孔教徒的阶级，所谓‘治人之君子’，纯粹是智力的工作者，绝对不能为体力劳动，‘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现在呢，因为中国新资产阶级，加以外国资本的剥削，士的阶级，受此影响，不但物质生活上就是精神生活上也特显破产状况。……我的家庭，就是士的阶级，他也自然和大家均摊可伶的命运而绝对的破产了。”^①事实确是如此，例如瞿秋白幼时尚在的叔祖瞿赓甫，是由举人出身而进入仕途的，官做到湖北布政使。大伯父瞿世琥，长期在江浙两省当知县、知事。外祖父金心芴，也曾任广东盐大使。但到了他的父亲瞿世玮，已不能为官作吏，更谈不上有经济上的“特权”了。他们不但没有一点田地或房产，后来甚至房租也无法支付，不得不在人们的歧视下住进祠堂里去。他们在物质生活上，已跌落到社会的下层，精神上也如落入万丈波涛的破船，感到空无依傍，前途茫茫。

这样的社会和家庭情状，在幼小的瞿秋白身上发生了什么影响呢？

已经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不可能再给瞿秋白安排“治人之君子”的前程。但是它的环境气氛，社会关系和对子孙的教养，仍然是士大夫式的。父亲瞿世玮虽然穷困潦倒，却还有个“浙江候补盐大使”的名义（这是仕宦后裔常有的虚衔），似乎还排在“治人之君子”的行列里。许多亲戚故旧，也都撑着仕宦家庭的空架子。封建阶级“读书人”的传统和氛围，更是牢固浓重。瞿

^① 《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0月版，第163—164页。

世玮擅长绘画（郑午昶编的《中国画学全史·当代画家介绍》中有他的传略），还学点剑术、医道，信奉道家学说，借以消愁解闷。母亲金璇，幼娴诗书，下笔成章，有相当深的旧文学修养。另外，不少亲戚长辈，或工于篆刻，或爱好书法。瞿秋白幼小时，就在他们的熏陶下学习诗文书画，同时也很自然地接受了某些封建阶级的精神遗产，养成了他后来自剖中常常说及的“名士”派气质^①。并且，“名士”派气质，又由于社会的动乱和家庭的贫困而加深。所以，瞿秋白在少年时期，就多愁善感，觉得“枯寂的生活，别有安闲的乐趣。然而外界偶然又有感触，即使一片云影，几朵落花，也能震动我的心神。”^②这也是一种“浪漫派”性情，“时时想超越范围”^③，超离现实，崇尚“性灵”，冥想人生的“奇秘”。这种“名士”气质，正如瞿秋白后来的自我评论所说，表明“和旧时代的精神密切相关，是旧社会生活的遗迹”^④。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很快可以看到，家庭的没落，却使瞿秋白能够较早也较清醒地觉察到本阶级的腐朽和丑恶，体会到下层劳动人民的痛苦，从而激起对封建主义的憎恶，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萌发了平等观念等民主主义意识。少年瞿秋白就是由此出发，成了封建社会的小小叛逆者。这与鲁迅十分相似。鲁迅比他年长十八岁而出身大致相同，鲁迅也是在少年时代的家庭变故中“看见世人的真面目”^⑤，而寻找新的生路，终于成为“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⑥。瞿秋白和鲁迅，都恰恰是在与革命对立的营垒里向革命迈出了第一步的。这是生活的辩证法。

①②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1页、18页。

③ 《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70页。

④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9页。

⑤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⑥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2月版，第997页。

封建阶级里往往表现出“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有一种“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①，但内中却隐藏着凉薄、冷酷和愚钝。这在它兴盛安逸的时候不很触目，当着陷入危难困顿之时就会清楚地显现出来。瞿秋白发现，在他那个“破产的大家族”里，“好的呢，人人过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坏的呢，人人——家族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经济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怨悻诅咒毒害，无所不至”^②，不少人暴露出精神的空虚，谋生的无能和道德的伪善。

瞿秋白还看到了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专制主义对于平民的压迫，他对此更为反感。他后期在给鲁迅的一封长信里，曾记下了“小时候最强烈的印象和记忆”。那是在十岁那一年，他正在看《三国演义》，忽听见父亲为一件事向一个人大发雷霆，“接着就是父亲的骂声：‘混帐东西，办他！拿我的片子，送他到衙门去！’后来，我打听着，那被‘送去’的人是打了二十下屁股。为着什么事情——我记不得了。但是，随便拿一张大红名片可以打人家的屁股，这使得我非常的奇怪。而且衙门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也是那时候打听清楚的。因此，张飞大打督邮那一回书，我看得特别有滋味；而尤其有意思的是张角他们的造反。我想：‘你们要打人家的屁股，人家自然要造反，为什么又要叫人家是黄巾贼呢？’”^③这件事，甚至在他在世的最后的日子，也没有忘掉。他在一九三五年五月长汀狱中，曾拟了一份《未成稿目录》，准备写一篇文学札记和自传性质的作品。其中自传部分（总题为《痕迹》）目录的第一部分《家乡》，分“1. 环溪。2. 大红名片。3. 父亲的画”等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254页。

②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3页。

③ 《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972页。

节^①。这里的“大红名片”一节，显然是准备记叙这件往事的。正是由于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嫉视，他非常厌恶自己的“少爷”身份。有一次，他在街上给乞丐两枚铜元，乞丐称他一声“少爷”，他又羞又恼，说：可不要叫我“少爷”，还是称我“先生”吧！他幻想出现一个人人平等的世界，希望有一个水泊梁山那样的地方可以投奔，去仗义疏财，扶危济困，自己纵然做不成手抡双斧的李逵，至少也可当一名接送好汉的酒保！出于这种心愿，他到乡下作客时，看到一个赤膊的农民孩子在风中发抖，就脱下自己的褂子送给了他，因为他觉得这个小朋友比自己还要穷苦。^②这类天真稚气的幻想和举动，生动表露了一个封建社会叛逆于孙内心的真挚。

显然，没落封建士大夫家庭，既对瞿秋白有消极的影响，给他染上“名士”派气质等旧社会生活的痕迹；又因其没落而产生一种反作用，最终促使他走上革命的道路。

不过瞿秋白之所以不为生身的剥削阶级思想的所吞没，不随着本阶级的没落而没落，他的思想里之所以能够开放出民主主义的花朵，归根结蒂，还是因为辛亥革命前后社会上涌动着反封建的思潮，弥漫着革命的气氛。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总主要是伟大时代的产儿。革命的时代才有足够的力量帮助他不断挣脱本阶级的思想羁绊，推动他在革命的道路上迅捷前行。当时瞿秋白就读的常州府中学堂监督（即校长）就是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还有好几位教师也是进步的留学生和同盟会会员。他们常常热情地向学生宣传孙中山的民主思想，讲述邹容、秋瑾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英勇斗争事迹，同时积极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以壮

① 转引自1980年9月《近代史研究》第3期。

② 瞿秋白少年时期的这类小故事很多，参见瞿轶群：《回忆我的哥哥瞿秋白》，1980年4月《社会科学》（上海）第2期；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1979年11月《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

革命声威。^①这样，一九一一年前后，瞿秋白已经不再停留在一般的平等的观念、浮泛的同情穷人和幼稚的造反幻想上，而认真地思考现实政治问题了。他曾多次对同学友伴说，要剪掉头上的辫子这满清王朝压迫的象征。当辛亥革命一爆发，他就不顾父亲的阻止和邻人的疑惧，决然剪断了辫子，为“皇帝倒了，辫子剪了”而兴高采烈，欢呼雀跃。尤可惊异的是，辛亥革命第二年的“双十节”，当家家户户挂出红灯笼表示庆祝国庆时，他却由于看到袁世凯已取代孙中山当了大总统，并且握有兵权，感到“民国”已经名存实亡，因此独独挂起一盏写着“国丧”两字的白灯笼，来表达自己的愤慨和忧虑。而这时他还只有十三岁！这盏白灯笼的光芒，比三年前对一张大红名片的反感，更清晰地照见了一个英气勃勃、敏感多思的少年爱国者、革命者的形象，反映了他思想上的进展。他已经能够以粗浅的民主主义意识，来鉴别现实政治事变的是非善恶了。

辛亥革命对于瞿秋白的推动是相当有力的。这场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并且最终归于失败，但它毕竟第一次推翻了千年帝制，给人民带来过前所未有的民主希望。革命党人中许多也是真诚的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不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受到他们的感染而跨出自己的第一步的。历史证明，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但其间的距离，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真诚地为人民解放而斗争的精神，就是由此达彼的桥梁。尤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建立，往往是他当初为了救国救民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瞿秋白的革命思想就是从辛亥革命发端的。

^① 据1979年11月15日江苏省常州中学《校庆纪念专刊》。

然而，这时瞿秋白毕竟还太年轻，还只初具革命民主主义的某些观点，尚未形成完整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因而，当辛亥革命失败，逆流汹涌、浊浪排空之时，他“敌不过现实的政治恶象”，从失望而陷于迷惘，走了一段弯路。特别是在“袁世凯做皇帝梦”期间，他埋首故纸堆里，“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和社会隔离”，甚至以浓厚的兴味去钻研佛学和老庄哲学^①，因而“对于老庄特殊有研究”^②。佛教教义和老庄玄学思想都是用唯心主义解释人生的，它们在我国历史上也确曾合流。政治逆流，佛学、老庄，就使瞿秋白坠入了“唯心的厌世梦”，十分消沉。这种精神状态，时显时隐地一直持续到五四运动爆发前夕。

瞿秋白在前进道路上之所以会有这个曲折，究其根源，也主要是在于时代，在于当时政治逆流的冲击和悲观失望的社会思潮的影响。李大钊在一九一五年的《厌世心和自觉心》一文中说：“近者中日交涉，丧权甚巨（指袁世凯为了使日本帝国主义赞助其恢复帝制而承认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引者按），国人愤激，骇汗奔呼”，“政治之罪恶既极，厌世之思潮，隐伏于社会，际兹晦盲否塞之途，哀哀斯民，谁复有生趣！”^③这篇文章，说出了厌世心理的社会原因。瞿秋白自己后来也回顾说：“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革命，只赚着一与台奴婢匪徒寇盗的独裁制。‘自由’‘平等’‘民权’的口头禅，在大多数社会思想里，即使不生复古的反动思潮，也就为人所厌闻，——一激而成厌世的人生观”^④。这一分析，不仅说明了厌世态度产生的社会政治原因，而且指出了它的思想根源，那就是人们对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幻灭之感。

这种幻灭之感，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批判。

①④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1页。

②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1955年6月《新观察》第12期。

③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页，28页。

因此，在瞿秋白的这段曲折里，在厌世、消沉情绪的背后，未尝不蕴含着一种积极的东西。他的“厌世”，主要是对辛亥革命的失望，而不是因为个人的不幸；他的研究老庄、佛学，并非为了有托而逃，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而是企图“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实现“佛教人间化”。这种“愿心”，当然虚幻，却反映出“救世”的宏愿。丁玲回忆说：在瞿秋白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还“曾用过‘屈维陀’的笔名，他用这个名字时曾对我说，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最是嫉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①。后期的共产主义者瞿秋白，不用说完全抛弃了虚幻的佛教思想，但从他所用的这个笔名和他的解释来看，他仍然肯定了自己当年钻研佛学的动机。在当时的消沉中，他并没有丢弃救国救民的志向。

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前夕，瞿秋白的思想面貌，在他写于一九一七年或一九一八年的一首旧体诗里曾有生动的反映。诗云：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一九一七年，瞿秋白已由常州而无锡，由无锡而湖北，由湖北而北京，有了不少社会经历，但仍然没有从对辛亥革命的失望和迷惘中摆脱出来；加以“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②。社会恶俗，佛学虚幻，前

^①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1930年2月《文汇报增刊》第2期。

^②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2页。

途难测，当然不能使他摆脱惘然的心情。然而他并不倒退回去，对于江南旧家族的一切，已经视如烟埃。出路在哪里呢？他不知道，在惘然中，他只能自处枯寂，寄意梅花，以坚操守。这首诗，既写出了瞿秋白要与旧世界决裂而不明出路的深刻苦闷，又流露出原有的洁身自好的狷介的名士气息，凸现出一个来自封建阶级而矢志反叛又积习未除的青年形象。

这首诗，是瞿秋白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重录下来，书赠鲁迅的。诗后，瞿秋白写有这样一段跋语：

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

后期瞿秋白重录这首诗，把青年时代的自己称作“忏悔的贵族”，是相当确切的自我评论。站在共产主义者的高度，他自然否定了当年的“颓唐气息”，因为这是“贵族”气的流露。但对于“忏悔”，瞿秋白却无疑是肯定的。“忏悔”，是对“贵族”即封建阶级的告别，又是向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靠拢。在瞿秋白的其他许多文字里，还多次出现过“忏悔的贵族”的名词^①。他这个称呼，原来主要是指俄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民粹派中的一部分人。民

^① 如《赤都心史》的《贵族之巢》一节中说：“那‘忏悔的贵族’，——‘往民间去的青年’，一世纪来在社会思想上为劳动人民造福不浅。”（《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26页）；《新资产阶级》一节中说：“郭质生——虽是‘非政治主义者’，然而始终是热烈的‘忏悔的贵族’，鄙视市侩主义的文化。”（《赤都心史》，商务印书馆1924年6月版，《瞿秋白文集》未收此节。）又如《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中，四次提到七十年代俄国的民粹派，都称之为“忏悔的贵族”。（见《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500页、503页、506页，517—518页。）再如《谈谈〈三人行〉》一文中，则认为“五四时期的‘往民间去运动’的青年，近似‘忏悔’的‘贵族’，这里的‘贵族’是指中国封建阶级。”（见《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0月版，第336页。）

粹派由平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些贵族知识分子组成，他们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主张发动农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曾表现出不畏强暴、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他们在理论上虽然有许多错误，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但是在反对农奴制度的资产阶级性的斗争中，它却是‘合理的’（就特定的历史任务来说）和进步的。”^①瞿秋白在叙述复杂的“忏悔的贵族”时，尤其对他们“自己牺牲家庭的幸福，上等人的特权”而“到民间去”^②的决心表示赞赏。

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了。五四运动揭开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也使瞿秋白真正开始建立起革命民主主义的世界观，迅速成长为革命民主主义者——他是彻底地“忏悔”了。

五四运动扫除了他的颓唐心情，“打破”了他的“孤寂的生活”。他“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③当学生代表，到街头演说，成为俄文专修馆等几个学校爱国学生中的“谋主”^④。并且，和许多爱国学生不同，他在热情地投身于狂涛骇浪般的群众斗争的同时，还进行冷静、紧张的思考。他认为，不能“只有攻击没有创造”，“社会改革不能单靠一时的群众运动”^⑤，而应当“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⑥。他撰写文章，编辑刊物，认真地探索革命的真理，中国的出路。他的敏感多思的特点，更充分地显现出来，给同学好友以深刻的印象，被目为“少年老成”^⑦。

①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土地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8页。

② 《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500页。

③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3页。

④⑦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

⑤ 《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1919年11月11日《新社会》旬刊第2号。

⑥ 《社会运动的牺牲者》，1920年1月11日《新社会》旬刊第8号。

瞿秋白首先注意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问题。他分析了封建时代的传统思想，认为无论是“流于无为”的老庄哲学（他自己曾深受其影响），还是表面与之相反的儒家说教，都贯串着以“君子”治“小人”的“贵族”思想；他又回顾了辛亥革命等政治运动，指出“从前中国的革新运动——戊戌政变、庚子以后的新政，辛亥革命，几次几番的再造共和，都不是真正的革新，因为总带着‘君子小人’主义的色彩”^①。这一看法，不禁令人想到他早先目睹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以后在一九一二年挂出“国丧”白灯笼的那件往事。那种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推翻封建统治、必须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这时是大大深化了。他明确指出，应当相信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发动群众去“实现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的国家或世界”^②。他还由此出发，告诫人们不要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抱有幻想，而要同他们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由于站在彻底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瞿秋白在“创造新信仰”的过程中，逐渐否定了纷至沓来的外来思潮中的许多流派和社会改革方案，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在此过程中，瞿秋白并不是没有受过其他外来思潮的影响，例如曾倾心于托尔斯泰的学说。他和郑振铎等人创办的《新社会》旬刊发刊词，就表示过反对“以暴易暴”，提倡“以普及教育作和平改造运动”，“以博爱的精神，恳切的言论为感化工具”。这篇发刊词虽然是郑振铎写的，但也代表着瞿秋白当时的思想。瞿秋白本人也说过，托尔斯泰所宣扬的“伟大的爱”，“有很深的哲理”，“很有可以研究的价值”^③。所以，瞿秋白希望“到民间去”时，具体的设想是去实施平民教育。同时，

^{①②} 《革新的时机到了》，1919年11月21日《新社会》旬刊第3号。

^③ 《答论驳〈告妇女书〉之节录》的译后志，1920年3月1日《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5号。

瞿秋白还研究过美国的宗教新村运动、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等等。但是，由于他首先着眼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力量，因而研究的结果总不能令他满意，令他悦服。他终于被科学社会主义所吸引，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选择，在他写于一九二〇年春的《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①一文中，相当明确地表现出来。

在《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中，瞿秋白根据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事实，指出“世界的进步着着向着社会主义发展”，从而得出结论：“我以为历史派的——马克思主义派的直接运动（是）不可少的。”所谓“直接运动”，与新村运动相反，不是逃避现实，在不触动反动统治的情况下去另创一个“共产主义”实验区，而是由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进行直接的社会革命。这种“直接运动”，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之初就向许多爱国学生宣传过^②。瞿秋白认识到，新村运动根本不可能解决社会上为数众多的劳动阶级的问题。例如美国的奥格拉村，划出一万八千英亩土地，不过养活了四百个人，并且这些人又“大多数是医师、律师、僧侣、教授师——受过现代社会的高等教育的人”，因而它“仅仅是新式理想的桃源”。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则无论文化高低都可参加，又“直接对于劳动阶级有利益”，“是较普遍的较易进步的办法”。此后不久，瞿秋白还明确而热情地赞颂“主张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的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说他“毕竟是实际的改革者”。同时作为对比，他指出了托尔斯泰“想以模范的宗教改革社会”的“谬误”。^③实际上也就是批判了自己原来的错误认识。他召唤人们进行“慎

① 1920年1月21日《新社会》旬刊第9号。

② 见《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1页。

③ 《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1920年4月21日《新社会》旬刊第18号。

重的思考,讨论研究,试验,实行,传播”,去迎接“直接运动”的到来^①。

《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的发表,是瞿秋白的世界观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一个信号。他在这篇文章里表达的初步的社会主义信念,似破土而出的根芽,升火待发的航船,确定了他日后的前进道路。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之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感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造就了一代新人。如果没有“五四”,瞿秋白也许会埋入佛经、老庄而不能自拔,或者会永远摆脱不了“忏悔的贵族”的精神状态。“五四”如骀荡的东风,使中国获得了新生,也使瞿秋白获得了新生。在五四前后出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只要是勇于探索,坚持前进的人,都必然地、或迟或早地走上了共产主义者的道路,找到了革命的真理。他们就是当时被称为“过激派”的人们。瞿秋白正是“过激派”中一个比较年轻的代表。之后,他们又在自身成长的过程中,担负了进一步传播马列主义、推进共产主义运动的光荣任务。

“‘新时代’的活泼稚儿”

如果说,五四运动的时代风涛,在思想政治上给了瞿秋白以新的生命,推动他到达共产主义者的起点,那么,赴俄考察的革命实践,使他能以一个较快的速度,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一九二〇年十月至一九二三年初的两年多时间里,瞿秋白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赴俄采访。这虽然并非直接参加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但他的深入的实地考察活动,也是革

^① 《文化运动——新社会》,1920年3月21日《新社会》旬刊第15号。

命的社会实践的一种。自身的实践比时代的影响更有力。赴俄考察是瞿秋白比许多同时代人更快地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的重要原因。

真诚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则是瞿秋白赴俄考察的动力。他在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信仰后，就如饥似渴地钻研社会主义的理论。不久，他又不满足于书本上的求索，友朋间的探讨，他觉得这有如“隔着纱窗看晓雾”，模模糊糊，看不真切。在书房里，“你说我主张过激，我说你太不彻底，都是枉然的，……既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就得认个清楚”^①。而要认个清楚，他认为，就应当到“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②——苏维埃俄国去。

苏维埃俄国是当时许多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热烈向往的地方。不言而喻，到俄国去，比到法国、德国去，更能直接、切实地学到马克思主义，了解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毛泽东一九二〇年二、三月间致友人的信里，就一再说：“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③。但是，能够获得游俄机会的人很少。瞿秋白获得了这种机会。他是幸运的。不过要成行，需冒很大的风险，需有绝大的决心，真“差不多同‘出世’一样”。当时，苏俄战乱未息，缺衣少食，人称“饿乡”。并且往饿乡之路，有万里之遥，风雪迷漫，交通梗塞，要到达目的地，谈何容易。瞿秋白体弱多病，更多了一层困难。因而亲友中有人认为瞿秋白要到俄国去，无异“自趋绝地”^④，极力劝阻。在这重重阻力面前，瞿秋白没有任何动摇。他的心早已飞向那个新的世界，

①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4页。

②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7页。

③ 《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1页、65页。

④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5页。

这是旧家族的亲友们无法了解的。仿佛是回答亲友们的劝阻似的，他写下了一首新诗《无涯》，诗中说：

“我”无限。“人”无限。

笑怒哀乐未厌，

漫天痛苦谁念，

倒悬待解何年？

知否？知否？倒悬待解，

自解解人也；

激悟，激悟，饿乡去也，

饿乡将无涯。^①

急促的节奏，表现出他激愤的心情：广大人民“倒悬待解”，痛苦不堪，自己既已从厌世的恶梦中摆脱出来，就应为此而奔赴饿乡，为人民探求生路。他追求真理的心是清澈澄明的，他要去的饿乡是有无限远大的前途的。因此，他后来在风雪旅途上遇到种种困苦时，坚定地表示：“宁死亦当一行！”^②也正是出于这种心情，他到苏俄以后，给自己取了 Виктор Страхов 俄文姓名。他取 Страхов（斯特拉霍夫）为姓，是有着战胜恐惧、克服困难的意义的。瞿秋白赴俄这一行动本身，就反映出他当时信仰社会主义的热烈程度，显示出五四以后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崭新面貌。他就此割断了对“过去的留恋”，并且希望真正同“名士派”作风诀别了。

五四初期，瞿秋白曾经“希望中国少出几个名士英雄，多出

①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6—7页。

②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50页。

几个纯粹的学者”^①。这里所谓“名士英雄”，是那种惯于雾里看花，不求甚解，而又常常牢骚满腹的旧式“读书人”；这里的所谓“纯粹的学者”，则是指善于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社会问题的脚踏实地的革命家，亦即革命的学者。现在瞿秋白是身体力行自己的希望了。

真正的学者对真理的信仰与宗教迷信不同。瞿秋白是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研讨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他并不因为向往十月革命、信仰社会主义，而先入为主地观察和描绘苏俄新社会，把那里写成是一片光明的极乐世界，或者匆匆忙忙得出正面肯定的简单结论。他在考察过程中，立下了“密切依傍于‘实际’，由客观立论”的原则，对具体社会现象进行周密的调查和深入的思考，从而“确定”了他的“世间的唯物主义”^②。

实事求是的严肃科学态度，是为五四以后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是他们为了救国救民而自觉地拿起来的武器。中国许多旧式知识分子，包括那些官僚政客的处世态度，却正好相反。瞿秋白对此是深恶痛绝的。十分凑巧，瞿秋白从北京出发的时候，正好是北洋军阀政府驻莫斯科总领事一行“启节”之时，于是与之同车前往。瞿秋白与他们交谈，发现他们身负外交“重任”，却对于中俄外交茫无所知，而且也不想知之。问起他们来，所得到的“是‘纯粹的中国式答案’：一面说得太抽象的，无着落的结论——‘贪’‘廉’，‘爱国’‘卖国’，这公使是‘好人’‘坏人’；一面又说得太具体的，无原则的事实——‘俄国人不请吃饭，看不起他’，‘俄国不信他的话，什么什么事不和他表同意’”等等，而不能回答中俄外交上一系列实质性问题。实在可笑可叹！就从这一侧面，瞿秋白也深感和他们是属于“绝对两个世界

① 《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

②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44页。

的人”。^①是的，这种模糊、笼统、不得要领的官风官气，就让他留给旧世界的人们吧，真挚、热情地追求真理的青年必须带着严肃的科学态度，去考察革命的新天地。

严肃的科学态度促使他看到了严酷的实际生活，反过来，实际生活又帮助他确立了科学的哲学观点，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看到，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国家在前进，翻身作主的工农群众充满着革命的热情；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和内战造成的破坏带来了贫困甚至饥荒，有的知识分子在埋怨，部分农民有怀疑，资产阶级常常捣乱，新生政权内部也存在不少缺陷和弊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是曲折、艰苦的，呈现出书本上看不到的复杂现象。瞿秋白以愉快的心情，回顾自嘲说：“来俄之前，往往想：俄罗斯现在是‘共产主义的实验室’，仿佛是他们‘布尔塞维克的化学家’，依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公式’，用‘俄罗斯民族的原素’，在‘苏维埃的玻璃管里’，颠之倒之试验两下，就即刻可以显出‘社会主义的化合物’。西伯利亚旅行的教训，才使人知道大谬不然。”那么，正确的是什么呢？正确的是相反的认识论，瞿秋白接着郑重其事地写道：

只有实际生活中可以学习，只有实际生活能教训人，只有实际生活能产生出社会思想，——社会思想不过是副产物，……^②

这个结论，非常接近于列宁的著名教导：“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③它强调理论对于

①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68—69页。

②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79—80页。

③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2页。

实践的依赖关系，强调理论的基础是实践。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特点。瞿秋白也正是立足于实际生活，结合理论研究，（他在莫斯科期间，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和俄国革命文献，并且翻译了不少文章，编著了《俄罗斯革命论》。）逐渐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瞿秋白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赤都心史》中多有表露。例如，他既写到新经济政策实行之初，农民由于不了解而“反抗”的事，更注意到后来农民“思想上的改造”“大告成功”的事实^①。又如，他发现许多莫斯科市民“淡于五一节而热于复活祭”^②（按：一九二一年的五月一日正好也是复活节——引者），看到有的苏维埃国家机关中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但并不就事论事，迷乱惶惑，而从社会历史上追溯原因。他指出前者是旧俄这个“经济落后国家的守旧性，小资产阶级心理的反映”；后者是出于“封建遗毒”，“东方式专制政体，使官僚问题种得很深的根底”，革命的浪涛一时只能有所扫刷，不可能立即肃清，而现在“无产阶级新文学”和“共产党的报纸”正在“努力的攻击官僚主义”^③。可见这些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自身的痼疾，它们正在不断的改变和消除之中。这种分析和判断，就是瞿秋白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自然流露。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阶级矛盾尖锐、阶级斗争激烈进行的历史时期，是探求真理的人必不可少的思想武器。瞿秋白在当时，不仅是冒着自然界的万里风雪赴俄的，也是冒着国内外资产阶级散布的重重思想迷雾去考察的。那时，“西洋的‘评论家’笑骂共产党的主义：‘是马哈衣主义（马哈衣为俄工人运动史之一派，绝对反

^{①②}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17页、119页。

^③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31页。

对知识阶级),是新军国主义,是巴枯宁主义,是拿破仑主义,……”^①瞿秋白也亲耳听到对于布尔什维克的种种污蔑和怀疑。然而他注意到那些反对派和怀疑派,是一些资产阶级分子或其知识分子。瞿秋白以揶揄的笔调描绘他们一谈到新政府就开口“一塌糊涂”,闭口“可怕得很”,还说什么“只会杀人”等等,恐惧之状可掬,到头来却说不出什么具体事实,零星,含糊,不能“给我以一明晰的观念”。他于是评论道:“资产阶级的心理,生来如此”,“知识阶级式的武断的头脑”^②。瞿秋白在访问托尔斯泰的故居时,虽然对托尔斯泰满怀敬意,但托氏亲友对十月革命的反对论调和无聊的怀旧心理,使他深深感叹他们已经属于“旧时代的俄国”,只能重温“贵族的残梦”了^③。瞿秋白还发现,在东俄发生饥荒之际,“劳农政府设着种种方法力图救济”,“茹苦含辛派遣火车去办移民”;而莫斯科正在大赚其钱的新资产阶级却无动于衷,大大的商铺,只出极少一点钱以应付募捐队,因而痛斥这是“麻木的神经,暗黑的良心”!^④把握了阶级分析的方法,瞿秋白不断地拨开迷雾,看到真相,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当他一九二三年初回国时,他更纯熟地运用这一方法,从同一现象,揭示出不同的本质,发人深省。他在苏俄时,曾了解到布尔什维克镇压喀琅施塔得的反革命叛乱,现在一回国,则面对着帝国主义、北洋军阀镇压工人的事实。他看到,同是镇压,却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尖锐指出:在中国,是“狗彘食人”;在苏俄,则是“人食狗彘”^⑤!

显然,瞿秋白在思考和探索问题时,早先那种求助于佛经和老庄,冥想人生“奇秘”的浓重的唯心主义倾向已经不见了。在

① 《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第1卷 第193页。

②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61页、63页、77页。

③ 《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52页。

④ 《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32—133页。

⑤ 《赤俄之归途》，《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99页。

《饿乡纪程》的最初篇章中，他还感到“生命的大流”“只是蒙昧地‘动’”，变易无常；还认为客观现象是主观心理的表现（“心灵的动力不可见，有环境为其征象”），“不可认识”。^①到了《赤都心史》，这种思想痕迹已大为淡化。他基本把握了唯物主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这从一个重要方面，标志着瞿秋白世界观的转变。

与此同时，瞿秋白也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他逐渐坚信社会主义事业的正义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和必然胜利的前途。瞿秋白先是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看到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态度，而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正义性的。还是在哈尔滨、满洲里的一路上，他目睹那里的经济，处处受旧俄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节制”，痛心领受了“帝国主义的况味”；相反，当时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苏俄政府和远东共和国临时政府，则屡次声明要将中东铁路的路权归还中国，表示要与中国协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②。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对东方被压迫民族迥然不同的态度，使瞿秋白深受感动。后来，在莫斯科的日子里，瞿秋白更进一步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和领袖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他深感列宁的伟大，盛赞“共产党始终是真正为全体工人阶级奋斗的政党”^③，称颂无产阶级不仅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也担负起了发展人类文化的历史使命^④。他们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克服了“古今未有的困苦”，艰辛创业，到瞿秋白动身回国时，已迅速地恢复了工农业生产，改善了人民生活，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抚今追昔，他感到“真有些神妙”！因而，他确信社会主义革命有“不可阻的伟

①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1—12页。

②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35页、66页。

③ 《赤俄之归途》，《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01页。

④ 《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93—194页。

力”，是“二十世纪历史的事业之第一步”。^①他以满含诗意的语言，写出了革命的哲理和社会主义的颂歌：

灰色的短夜，星汉徐移，“沉闷”如飞云一般渐渐吹散，放出些早凉，凝凝的细露，淡淡的晓色，长林丰草间偶然一阵一阵清风，“夜”的威权慢慢地只剩得勉强支持的姿态。小鸟欣欣的相语，蛩虫矇矇的相投，一望远东，紫赤光焰，愈转愈明，炎炎的云苗，莽然由天际直射，烘烘烈烈，光轮轰旋，——呀！晓霞，晓霞！

此时此际，未见烈日，——也许乌云骤掩，光明候转凄黯，不然也只遥看先兆，离光华尚远；然而可以确信，神明的太阳，有赤色的晓霞为之先声，不久不久，光现宇宙，满于万壑。……^②

他把社会主义比作晓霞，把资本主义比作尚有威权的暗夜；晓霞取代暗夜有一个缓慢艰难的过程，然而总是愈转愈明，终将迎来光辉灿烂的红日，普照大地。在这幅艳丽、跃动的画图中，渗透着瞿秋白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特征的理解，和社会主义革命必胜的信念。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和社会革命论观点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构成了他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本，标志着他世界观的转变。

并且，瞿秋白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不仅仅有观念上的改变，还发生了感情的变化。他那段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讴歌中所流露的感情，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才有的感情。这种感情洋溢在几乎全

^① 《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03页、156页。

^② 《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78—179页。

部《赤都心史》的字里行间。例如对于列宁，他不是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来描写的。在他描绘的列宁与群众会见的热烈场面中，真切流露出他自己对于列宁的崇高敬意。他的感情，与他笔下的异国工农群众和革命者融汇一起，难分彼此。又如《心灵之感受》一节，深有会心地记述了一位当过红军的苏维埃干部娓娓而谈他的经历和感受，他的“‘为人服务，忘了这我’，‘我’却安逸，念念着‘我’，‘我’反受苦”^①的结语，显然也同时是作者的心声。如果说，瞿秋白在哈尔滨逗留时对苏维埃俄国是抱着一种亲切、友好态度的话，那么，在莫斯科住了两年之后，他对苏维埃的革命者们已经产生了同志式的感情了。当他踏上“赤俄之归途”，要离俄回国时，“真正有些低徊不舍的感慨，——那一种纯朴自然，新生的内力，活泼泼地向上的气象是有叫人留恋之处”^②。回顾两年多前去国赴俄时还“和旧时代的精神密切相关”，还有“过去的留恋”，相比之下，现在，他的感情有了多大的变化！

这就是说，在莫斯科期间，瞿秋白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感情上，都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他的世界观以至于整个人格都向着共产主义方向发展变化，真正从一个阶级走到了另一个阶级。因此，瞿秋白这时能够自信地说：

“我”不是旧时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③

所谓“旧时”，是指“一病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一病‘东方式’的死寂”^④的过去的时代；所谓“新时代”，就是十月革命开

①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36页。

② 《赤俄之归途》，《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08页。

③④ 《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65页。

创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确实，这时候，瞿秋白既憎恶唯钱是图的资产阶级，又决绝于僵化濒死的封建阶级，而参加到无产阶级的行列里来了。他正是在说这段话之前不久，一九二一年九月，经张太雷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①。也确实，这时候，他还不免幼稚，然而他是朝气蓬勃的，并且是坚定不移的。他从此以后，一直到生命的结束，都没有回头逡巡，也从未退出这个行列。

相反，当时却已有人面对苏俄的复杂现实，动摇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有的甚至最终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如张国焘，他曾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二年初，赴伊尔库次克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原定名为“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大会移到彼得堡进行时，瞿秋白也参加了这个大会^②），也有机会接触苏俄的革命现实。然而，他目睹革命中出现的许多复杂问题之后，感到“无法解释”，结果陷于“迷惘之中”。他说：“未到俄国以前，对俄国革命都有一种美妙的幻想，而实际观察之后，就都觉得事实远不如理想了。”^③张国焘此后也一直未曾真正接受共产主义思想。这一次即是实践对于他的初次检验。

这一鲜明的对比，又一次告诉我们，时代的影响，外部的作用，不是一个人世界观转变的决定因素。重要的是，要勇于否定旧我，正确对待自己。瞿秋白早在五四运动初期，就表现出改造自己的自觉性。他那时就比一般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高明。那时很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是以个性主义为武器来反对封建主义的，一味要求解放个性，尊重自我。这对于摆脱僵死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桎梏，是有革命意义的。但是他们也就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止步不前。他们从个性解放思想出发，都喜欢进行自

① 据《记忆中的日期》。

② 《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80页。

③ 《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版，第193页，205页。

我解剖。但他们的自我解剖，往往表现为自我肯定，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例如有人把“我要做的就是对的，凡经我做过的都是对的”，作为一种“格言”。只有少数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自我解剖，如鲁迅的自我解剖，才无情面地披露自己的弱点，不隐瞒身负的“古老的鬼魂”，“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①。瞿秋白和鲁迅相似。他在赞成个性解放的同时，明确主张应当改造自己，以适新时代的潮流，负起革命者的重任。他说，致力于社会革命运动的人，要“一方面自己解放，一方面自己改造”^②。因而，当他奋不顾身赴俄考察时，没有以光明的创造者自居，自命不凡；相反，清醒地觉察到自己的思想还“带有旧社会生活的痕迹”，热切地要求斩断与它的“万种‘尘缘’”^③。置身于赤都莫斯科之后，在革命现实前面，更使他严格地、深入地解剖自己，改造自己。

瞿秋白的自我改造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努力改变那种“时时想超越范围”（即脱离外界社会现实），在书斋里冥求人生意义的“浪漫派”作风（即唯心主义倾向），二是努力克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好习气和根性。瞿秋白出身于封建士大夫阶级的家庭，就其早年思想感情来说，则归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在旧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很大的革命性，但他们的生活条件、工作环境和思想方法，又与工农群众不同，存在颇大的距离，他们对社会实际生活也比较隔膜，因而在某些方面容易滋生个人主义的意识，例如在斗争方式上习惯于孤军作战，等等。瞿秋白五四前后有一种空虚感和孤独感，就是由此而来。这一病症，他现在清醒地觉察到了。他与接触到的工农劳动群众对比，赞扬他们坚毅的战斗精神和乐观爽朗的气概，说

① 鲁迅：《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5页、286页。

② 《社会运动的牺牲者》，1920年1月11日《新社会》旬刊第8号。

③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8页。

“可爱的‘俄国乡下人’百年奋斗争取自由”，而“我主观的人格抑郁到极处，应当豁然醒悟”^①。他尤其钦佩十月革命以后的困厄中，“俄国的劳动人民千辛万苦支持下来”的战斗精神。^②甚至日常与一些工人聊天时，也“暗暗的想，他们——非智力的劳动者，——即使有困难苦痛，大概永没有我这一种——‘烦闷’呵。”在他们中间，他觉得自己“性情怪僻”^③。后来，他进一步接触到问题的实质，说：“自己也曾以为不是寻常人，回头看一看，又有什么特异，可笑可笑”，而得出严肃的结论：“应当同于庸众”。^④这里的“庸众”，是普通劳动群众的意思。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克服内心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意识，培养革命的集体主义。即使到了一九二五年他紧张从事党的实际政治活动之时，也产生过这种心情，感到自己“可笑”，认为“贵在实练明察”，应当脚踏实地地到广大劳动大众中去多加锤炼^⑤。

勇于否定旧我，不惮暴露自己的弱点，时时除旧纳新，这是瞿秋白与其真诚地为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真挚地追求革命真理而毫不谋求私利的品质相联系的又一显著特点。这也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要品质。它既产生于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固有品格，同时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愈战愈强、永远进击的一个原因。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不文过饰非的。文过饰非必定出自对个人荣辱得失的权衡，只会加固与旧时代精神上的联系；对于为新时代而战、为人民解放而战的革命者来说，却无异于保留自己身上的锁链。瞿秋白真挚追求真理，立志献身人民，自然就急切地要挣脱维系着旧时代的精神锁链。因此，他才能以很快的速度，向前奋

①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79页。

②③ 《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00页、第140—141页。

④ 《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71页。

⑤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进。

一九二三年以后，瞿秋白就以一个并非成熟但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姿态，出现在国内剧烈的阶级斗争的战场上，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一起成长。

“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

吮吸了充分养料的树木，必定会茁壮生长，结出累累果实；经受了列宁故乡革命烈火陶冶的瞿秋白，于一九二三年初投入本国共产主义运动之后，共产主义世界观不断深化，成为党的卓越的宣传家和政治活动家，为革命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贡献。

在实际政治斗争中，瞿秋白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正确的策略，参与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同时有力揭破了西山会议派等国民党右派削弱、消灭共产党的阴谋。另一方面，他又在党内坚持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并于一九二七年主持“八·七”会议，为结束它在党内的统治、扭转党内的混乱状态，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成了党的著名领导人。在文化战线上，尤其是文学领域里，瞿秋白的贡献更令人瞩目。他最早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最早明确提出为人民大众服务是革命文学的中心问题，并倡导文艺大众化；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了鲁迅，并给以高度的评价，同时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实际领导工作，为左翼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外，他还是最早致力于用罗马字拼音来改革汉字的人之一。这种种，都是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和文学事业具有重大意义的开拓性工作，它们都将长垂史册，永不磨灭。

从瞿秋白后期的卓有成效的战斗里，可以看到他这个时期在

思想上达到的成就，看到他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进一步发展及其特点。瞿秋白的政治活动，大部分时间里是在于党的理论宣传和理论斗争方面。他撰写了大量政论著作，主编或参与编辑了多种党的报刊。在文学活动方面，则主要致力于文艺理论的著述和翻译。他在所有的理论研究中，都努力要求自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和学风，从而在不少问题上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相当高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准。其中一些观点，至今保持着理论上的新鲜感和说服力。

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知灼见，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即他刚刚回国接触国内阶级斗争实际时，就表现出来。当时，党领导下的第一次罢工高潮，尚在发展；广东、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刚刚兴起。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斗争，给予他深刻的启示。一月底，他在《向导》上发表了《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①一文，深入阐明了革命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关系。他说：工农群众是革命的主力军，革命知识分子应当依靠他们，并与他们结合起来。五四前后，中国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但他们对自己估计过高，没有意识到知识分子队伍的复杂状态，并忽视工农群众的力量。胡适曾说：“干预政治和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阶级的肩膀上”，这种笼统的提法，似是而非的偏见，影响了很多。瞿秋白在这篇文章里，针对胡适的提法，指出在知识分子里，一部分是绅士阶级的，另一部分如许多青年学生，则是新知识分子。他们属于不同的阶级，不能一概而论。他们自然是社会文化的代表，但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文化。新型的知识分子还应当知道，他们是“受用生产的剩余——劳动平民的血汗，方能有此‘知识’来代表文化，他应当对于劳动平民负何等重大的责

^① 1923年1月31日《向导》第18期。

任！”他们应当把自己的命运和工农群众连结在一起。接着，瞿秋白进一步明确地指出：“知识阶级只是社会的喉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革命的知识分子要当“平民的先锋”，必须依靠身后的主力军；而现在，“平民觉悟自己实力”的时候已经来到了。瞿秋白在工农群众革命运动兴起不久之时，就如此正确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关系，是十分可贵的。而且，当时“五四”已经退潮，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正彷徨于群众的斗争之外，因而这篇文章又是十分及时的，富有现实指导意义的。

同年十一月，瞿秋白在评论马克思主义敌人内部的“科学与玄学”之争时，更表现出他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把握。

“科学与玄学”之争，是唯心主义营垒里的一场混战。玄学派张君勱首先上阵，在清华大学发表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说。他宣扬一种极其神秘、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自由意志”论。他认为，人生观是科学所不能管的，完全由于人的“良心之所命”^①。“人生观的中心点，是曰我”，其特点是“主观的”、“起于直觉”的、“自由意志的”、“漫无是非真伪之标准”^②。岂止人生观，一切社会现象，包括社会革命，也毫无规律可寻，历史是由偶然性支配的一笔糊涂帐。他大放厥词道：“社会革命家告其同志曰，人事变迁，无所谓因果，视吾人之意志何如：意志力强，其环境可以冲破；反是者，人类为环境之奴隶。彼辈又以为理智之为用，长于思辨，短于实行，故与自由意志说相辅而行者，一则曰行动，再则曰直接行动。……俄之鲍尔雪维党（即布尔什维克——引者）亦然。究竟人事进化，有何公例耶？有何种因果耶？”^③张君勱主张

① 《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1923年4月29日《努力周报》第50期。

② 《人生观》，1923年5月1日《晨报副刊》。

③ 《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

唯心主义，反对历史唯物主义，是十分露骨的。随后，丁文江、胡适等人打着“科学”的幌子，表示反对玄学，提出人事变迁、社会演进是有原因的，可用科学方式来解释。但他们的“科学”理论，只注意现象不注意本质，又不承认科学法则有客观必然性，也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丁文江在《玄学与科学》^①中说：“觉官感触是我们晓得的物质的根本。……我们之所谓物质，大多数是许多记存的觉官感触，加了一点直接觉官感触。假使我们的觉官的组织是另外一个样子的，我们所谓物质一定也随之而变”。科学研究，不外乎由这种知觉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论。显然，丁文江同样否定了物质的客观性，否定物质现象是第一性的。他的所谓“科学”，只是研究感觉及所由生的知觉、概念和推论。因而，他认为感觉不到的外界物体是不可知的，可以存而不论，他称之为“存疑的唯心论”。从上述两派的主要论点可以看到，两者只是在枝节上纠缠，并无根本分歧，都是以主观唯心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只不过一个完全是赤裸裸的，一个则以“科学”的美名略加装扮而已。

对于丁文江、胡适的“理论”，陈独秀曾作了抵制，但又受其迷惑，将它与唯物史观并列，认为也是一种“社会科学”^②。瞿秋白则一眼看穿了两派共同的反动本质。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以高屋建瓴之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击中了他们的要害，指出：两派“所论的问题，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自由意志与否，别的都是枝节。”中心问题是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③。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感觉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客观事物不依赖于人的感觉而存在，并有其规律性。“自由

^① 1923年4月15日《势力周报》。

^② 《科学与人生观序》，1923年12月《新青年季刊》第2期。

^③ 《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1923年11月《新青年》季刊第2期。

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为一定的目的服务。”^① 瞿秋白正根据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驳斥了“自由意志”和“不可知”的谬论。他说,“‘自由’不在于想象里距离自然律而独立,却在于能探索这些公律,加以有规划的行动,而达某种目的”,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服从”,决非没有标准。瞿秋白还进而指出,社会现象、人的社会目的,“追寻他最后的原因,却在于经济的发展”,亦即人的思想动机后面有着物质的原因。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利于无产阶级,因而无产阶级的认识最接近于客观规律,无产阶级认识到“非解放人类直达社会主义不能解放自己”,它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完全合理的。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更成为了自觉的主人,“方开始从‘必然世界’进于‘自由世界’的伟业”^②。瞿秋白在这些评论中,正确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从哲学上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次年,他在上海大学编写的讲义《社会科学概论》^③,更全面地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这时候,瞿秋白不仅完全克服了早先的“生命的大流”“蒙昧地动”、不可认识的看法,而且加深了对于个性问题的认识。在《饿乡纪程》中,瞿秋白对于如何发展个性的问题,曾表现出困惑。张君勱是很好的反面教员。张君勱认为人生观之不可认识,是由于“人生观的中心是‘我’”,是个性;人人个性相异,天才更加特殊^④。瞿秋白于是分析了个性,指出马克思主义不否认个性,但个性是“受当时社会里阶级斗争的影响”的,随着“经济动象流变,故个性随此阶级分化而各易其趋向”,并非不可捉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153页。

② 《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

③ 上海书店1924年10月初版。

④ 《人生观》。

摸。而基于无产阶级阶级性的个性，是“利他”的，它与人类解放的历史趋向相一致，能够在斗争中获得充分的发展。

瞿秋白本人的个性和才能，就正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的阶级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中，闪现出灿烂光华的。他的理论斗争，始终没有脱离社会政治斗争的实际，而与之结合，有力地发挥了现实的战斗作用。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我们党历史上最早提出：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应当由无产阶级来担当。早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发表的《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①一文中，他根据现代阶级关系的变化，说明了“最易于组织的最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制度的运动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的规律。到本年十二月发表的《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②，又具体地指出，中国现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他说：“中国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地位，实在要求资产阶级式的革命”；而“独无产阶级能为直接行动，能彻底革命，扫除中国资本主义的两大障碍（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引者），就是以劳工阶级的方法来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领袖权。”在这以前，还没有人这样明确地阐明中国革命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一九二五年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在“五卅”高潮中，瞿秋白更撰写了多篇论文（包括《热血日报》的大部分社论）和精悍的短评，阐明了无产阶级怎样才能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激烈斗争和分化中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力量。他揭露大资产阶级的妥协和破坏，号召分清敌友，巩固统一战线，争取反帝斗争的彻底胜

① 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第1期。

② 1923年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2期。

利。他的《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等著名政论，猛烈抨击了西山会议派、国家主义派等的反共谬论，深刻揭露了他们的反革命本质。

正是因为深刻认识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他坚决地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他撰写了长篇论文《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〇国际？》，对陈独秀、彭述之的理论和路线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论文全面分析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和中国革命的现状，指出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①；农民“是最主要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具有两面性，“是不愿意资产阶级式的民权革命彻底胜利的，……他们只想和帝国主义及买办地主阶级妥协，而牺牲工人和农民等阶级的利益”^②。他指出陈独秀、彭述之等一贯放弃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严重任务，害怕农民运动的发展会破坏与资产阶级的联盟，结果在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前面步步退让。这篇论文，在四月召开的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印成小册子散发给代表们，给了右倾机会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不久，他就主持了党的“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方针，举起了鲜明的苏维埃旗帜（共产党的旗帜），扭转了党内的混乱状态，使中国革命得以继续向前发展。

瞿秋白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重要论著及其实际活动，证明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深入理解和牢固把握，也表明他有着一定的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才能。

瞿秋白是自觉地要将理论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的。他在《瞿

①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第二章附言，《六大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1942年10月初版，第698页。

②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第702页。

秋白论文集》的《自序》^①中，一开头就用一句话概括说：“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明白地说出了自己从事理论工作的原则。接着，瞿秋白纵观历史，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特有的原则；但要真正做到，获得成果，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他说：

中国的知识阶级，刚从宗法社会佛老孔朱的思想里出来，……老实说，这是无知的知识阶级，科学历史的常识都是浅薄得很。——中国无产阶级所涌出的思想代表，当然也不能自外于此。只是革命实践的需要，正在很急切地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之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这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形。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一九二三年回国之后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病倒为止，一直在……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不可一日或缓。

这里，瞿秋白分析了中国现代思想界的状况，同时也作了自我分析。他面对这样困难的任务，觉得虽然十分努力，也不敢自信。他担心“我这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理论里，可以有许多没有成熟的不甚正确的思想”；这和革命实际的需要相比，就象是狗耕田一样。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和心情，他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

“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并非自谦之辞。他说担心，也不是

^① 据手稿影印件。

故作姿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确实是不成熟的。“中国知识阶级”的弱点，在他身上就曾长期存在，一时当然不能克服。他缺乏对社会状况的深入了解，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在他走上党的主要领导岗位前后，未能达到自己的愿望，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很好结合起来，而在政治上陷入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瞿秋白虽然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正确有力地批判了陈独秀、彭述之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但是，也就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里反对陈独秀、彭述之“二次革命的理论”之时，没有得出革命阶段论的正确结论，而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判断。他说：“在世界无产阶级已经得胜利于邻近的俄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那末，中国的国民革命当然不仅得着世界革命的‘辅助’，并且自己也带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了。”他并由此提出了中国革命“应当从国民革命生而成社会革命——就是‘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①的主张。显然，瞿秋白在反对一个倾向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走到了另一个倾向。尔后，在“八·七”会议后担任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期间，发展了这一主张。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瞿秋白作《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②一文，一方面仍正确指出：“国民党是背叛革命，并未完成国民革命，……‘第一次’革命并没有完成而是中断，根本上无所谓‘第二次’的革命”，现在要进行“真正的国民革命”，“革国民党的命”，“这一革命的性质，由他的主要领导者来说，如今更显然是工人阶级（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由他的社会内容来说，却还首先是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但是，由于他把国民党蒋介石看成是民族资产

① 《六大以前》，第695页。

② 1927年11月21日《布尔塞维克》第5期，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

阶级的代表，^①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混淆起来，视为革命的对象，因而作出了错误的结论：中国革命“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这一错误认识，在同月他主持召开的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写入了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

“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②而这个提法，就是“左”倾盲动主义的理论基础。

对于革命的形势，瞿秋白也作了缺乏辩证法的分析，认为“中国革命是高涨而不是低落，中国革命的高涨而且是无间断的性质”，否认当时革命处于低潮，并且否认革命会有低潮。自然，这种估计也在上述决议案中反映出来^③。

这样，从十一月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就确定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发动“工农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这种冒险主义后来还引出了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于是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不顾革命失败的形势，“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因而使保留下来的革命力量继续受到不少的损失。”^④

然而，走着曲折道路的“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毕竟是马克思主义者。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并未掩盖他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这种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品格，无论在他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还是在担负党中央主要

① 在此以前，《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说：“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政策上的变节，以蒋介石在上海的屠杀而著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他如今和买办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大地主相象，将要成为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统治之支柱”。（《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第89页）这个文件虽是共产国际代表起草的，但作为主持“八七”会议的瞿秋白，自然也持这种看法。

②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第127页

③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第128页。

④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人民出版社1951年11月版，第27页。

负责人时期,以及受到王明集团打击之后,都闪现出夺目的光彩。他是冒着陈独秀封建家长制式统治的淫威,抱着“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①的决心,挺身而出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他推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主观上也是出于对敌人的愤慨和对革命的忠诚,而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相反,他在领导工作中,“一反陈独秀的作风,实行民主集中制,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尊重不同意见,讨论一致才作出决定。他光明磊落,勇于自我批评,勇于承担责任,不揽功诿过,不搞歪风邪气。”^②在遭受米夫、王明一伙无情打击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也没有改变他的革命初衷,消弭他的战斗意志,而自动地走上文学战线,自觉地“用文艺来帮助革命”^③,积极工作,热情洋溢,表现出“高度的党性,高贵的品质”^④。正因为他具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高贵品质,所以他虽然在思想理论上还不成熟,却仍能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

瞿秋白路线上的失误,在一九二八年党的六大以后,也逐渐克服过来。例如,众所周知,一九三〇年,他主持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此外,根据现在可以看到的材料,他在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三年底从事文学活动期间,还在实际工作中抛弃了过去的“左”倾盲动主义思想和策略。

瞿秋白一九三一年初参与左翼作家联盟实际领导工作时,左翼文艺运动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影响。左联初期实行关门主义,不争取作合法斗争,也不重视作家的创作活动,致使左翼文艺运动遭到很多损失。瞿秋白在实际工作中抵制了王明的“左”倾指导思想。茅盾(当时担任左联行政书记)回忆说:这年

① 《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第718页。

② 李维汉:《怀念秋白》,1980年7月14日《北京日报》。

③ 《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961页。

④ 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1955年6月30日《文艺报》第12期。

十一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瞿秋白为这个决议化了不少心血。这个决议，“一反过去忽视创作的倾向，强调了创作问题的重要性，就题材、方法、形式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它“在文学领域里的各种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从而使“左联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逐渐摆脱出来。”茅盾认为，“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并且，此后由于“鲁迅与瞿秋白的亲密合作，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占统治的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却高举了马列主义的旗帜，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① 在一些具体、实际活动中，瞿秋白也注意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利用公开的合法的条件。例如，一九三三年初开始，瞿秋白与鲁迅、茅盾一起，向《申报》投寄杂文，在其《自由谈》和《申报月刊》上发表。《申报》是历史颇长、发行量很大的日报，拥有广大读者，这就改变了过去左翼作家主要在左联刊物《萌芽月刊》、《北斗》，和秘密刊物《前哨》上发表文章的做法，使他们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更大的影响。此外，瞿秋白在一九三二年还让夏衍、阿英、郑伯奇组成党的电影小组，打入明星电影公司；同时使左翼电影评论力量几乎占领了上海报纸的全部阵地。他说：电影公司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不容易打进去，这方面我们的力量薄弱，而电影社会影响很大，既然请上门来（当初，明星公司老板有感于形势发展，觉得改变一下电影内容才能赚钱，决定请几个左翼作家来当编剧顾问），我们为什么不去，要利用一切条件开展工作，打基础^②。他还同意田汉的建议，让商人办的百代唱片

① 《左联前期》，1981年3月22日《新文学史料》第3期。

② 《阿英忆左联》，1980年2月22日《新文学史料》第1期；夏衍：《历史的回顾》（1979年《文艺研究》第4期）也有类似记述。

公司录制聂耳、冼星海、田汉、孙师毅等作曲作词的进步歌曲^①。对瞿秋白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活动，夏衍曾作了这样的回顾和评述：

“他对我们关门主义的错误以及我们对中间派文艺工作者的不适当的态度，进行了批评。他告诉我们，在目前情况下，在广大群众要求抗日的时候，我们必须把作家、艺术家组织起来，利用群众要求抗日的爱国心理来进行我们的文化工作。”“多亏有了秋白同志的一度领导，才改变了王明路线时期那一套关门主义作风，广泛地打入资产阶级和敌人的阵地，扩大了我们的影响，推进了我们的工作。这一点在我的印象中是永远不会忘记的。”^②可见，瞿秋白在这个时期，摒弃了“左”倾路线的策略思想，并和鲁迅一样，采用隐蔽自己的“壕堑战”，主张进行“韧”的战斗^③。

至于瞿秋白为什么会在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陷入“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这需要结合历史条件来进行分析。

瞿秋白的错误和曲折，是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相联系的，同党的幼年时期的状况相联系的。此外，也与瞿秋白的工作岗位和本身思想上的弱点有关。毛泽东在谈到历史上的路线错误时说：“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④。瞿秋白在《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中也说：“无产阶级之革命思想的指导，当然是集体的（Collective）工作；然而我确是这集体中的一个个体，整理我的思想，批评我的思想，亦许对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不为无益。”瞿秋白之所以会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判断失误，从客观上说，有种种原因。如当时党内和革命

①② 夏衍：《“左联”成立前后》，1980年3月《文学评论》第2期。

③ 在一九三三年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瞿秋白也将“韧的战斗”，视为鲁迅精神的特点之一，号召革命作家向他学习。

④ 《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版，第892页。

队伍内部，愤激于蒋介石的叛变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普遍存在着拚命主义和冒险主义情绪。如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他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从他主观上说，则对中国社会和革命的现状缺乏深入周密的了解，存在着机械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的弱点。我们在讨论瞿秋白思想发展的时候，不能回避他的这个错误，也无须加以回避。毛泽东说，这种状况，在党的幼年时期本是相当普遍的存在。“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即使到抗战前期，“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① 瞿秋白在理论工作中，虽然表现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才能和自觉性，但是，他的主要精力是从事繁重的、紧迫的理论宣传和理论斗争，并且很长时间在上层领导机构和国外工作，再加上原来的知识分子的积习一时未除，因而对各方面的情况缺乏深入周密的了解，尤其是较少深入到群众的实际斗争中去。瞿秋白自己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及同年十一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就说过：“我深感在第一线斗争的经验太少，”“我的毛病是与工农群众接触太少，没有第一线斗争经验”^②。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李维汉也有这样的感觉：“他的弱点是有点书生气，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较少。”^③ 这个弱点，应当说也是后期瞿秋白的特点之一

①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753页、754页。

②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③ 李维汉：《怀念秋白》。

吧。自然，这个弱点，决不是意味着他对于群众的冷漠。在主观上，他明确认识到与群众运动结合的重要，他为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斗争的胜利果实和英雄气概而自豪。在后来的文艺论著中，也将大众化视为革命文学运动的中心问题，而详加探讨。直到一九三三年九月的一篇言志的散文中，他仍以“生命溶化在大众里面”自勉，希望在“大众的事业”里，做“永久的青年”^①，永葆革命的青春。假若他不是过早地牺牲在敌人的枪弹之下，他一定会更多地经受群众斗争的锤炼，在政治上和思想理论上成熟起来。

关于《多余的话》

至此，就可以来谈一谈人们印象深刻、兴趣浓厚的《多余的话》了。

瞿秋白是在一九三五年二月被捕的，《多余的话》即写于本年五月长汀狱中。这是一个过去经历曲折、此时处境特殊、一贯忠于革命、又还存在弱点的革命者，以惊人的坦率所作的临终自白。它呈现出一个革命者彼时彼地内心深处的所思所感，是不能简单对待的。它真实可信地告诉我们，现实社会中的人，不可能是天纵之圣，不可能是童话世界里完美无暇的神灵。现实世界复杂多变，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比外部世界更要曲折幽深，端绪纷繁。而在那“世无前例”的时候，人们却习惯于以不是英雄就是叛徒的逻辑来裁决历史人物，习惯于划分几个框框来代替对具体事物的具

^① 《“儿时”》，《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441页。

体分析，结果就产生了种种的误解和歪曲。《多余的话》正得到了这样的待遇。因此本文也就不得不对瞿秋白这篇原本并不重要的文章，作较多的辨析。

瞿秋白于一九三五年五月身陷囹圄，自分必死之时，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一个革命者，这时只应当视死如归，慷慨就义，有什么必要进行一番表白，进行“自我分析”呢？对于这样的疑问，瞿秋白似乎早预料到会发生，因而题名为“多余的话”，并在正文之前，引了《诗经》中《黍离》的诗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加以提示。但“文化革命”中那些最最“革命”的造反者们，断然认为：瞿秋白的所求，是“宛转求生”，他的“心忧”，不过是“贪生怕死”，《多余的话》是一份“投降叛变”的铁证，别的无可解释。

诚然，革命者被捕之后，自分必死，就应当坚贞不屈，英勇就义。我们的许多先烈都是这样走上刑场的。但如果就此而言，瞿秋白何尝也不是这样的呢？他在写《多余的话》之前几日，就写过一篇长长的“供词”，^①热情宣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欣欣向荣的景象和人民群众的新生活，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攻击和诬蔑，谴责了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反革命“围剿”。在写《多余的话》后不久，他又唱着《国际歌》、《红军歌》，呼喊“为中国革命而牺牲，是人生最大的光荣”^②，面对敌人的枪弹，泰然自若，从容赴死。这都不是表现出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浩然正气和英雄气概吗？

但是，瞿秋白是一个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过来的革命者，他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爱作自我分析的积习。这在《饿乡纪

^① 见陈铁健：《最后的斗争——瞿秋白就义前后》的引文，1980年《近代史研究》第3期。

^② 肖三：《纪念瞿秋白同志殉难十一周年》，《人物与纪念》，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224页。

程》、《赤都心史》、《瞿秋白论文集·自序》和《“儿时”》等文中多次表现出来。现在，他面临生命的结束，当然更有这样的要求。他回顾往昔，思虑目前，既感到自己有负于革命事业，又忧虑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给党带来的危害，因而他不将这种心忧吐露出来，不能自安。这也就是所谓“书生气”的最后的表现吧。

首先，他对于自己曾经陷入“左”倾盲动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的经历，早就有一种负疚的心理。现在，他被捕了，“被拉出了队伍”，再也没有补救的可能，内心更感到痛苦，更深自谴责。在思索自己错误的根源时，他不便从共产国际方面去寻找，只是自我反省，把全部原因归结为自己未能克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他认为象他这样的原本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原没有条件担任党的领袖，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然而，他竟然担负了党的领导工作，这乃是“历史的误会”。他反复说：自己只“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一点皮毛”，“却由我来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势必“十分幼稚，错误百出”，势必在“我的幼稚的理论之中包含着怎样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后来，“这些机会主义的成份发展起来”，在“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地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对此，他认为“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不仅如此，他还深感继而发生的立三路线，也是他盲动主义的“逻辑的发展”，“我当然间接的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这种沉重的愧疚心情，和不能再有机会为革命贡献力量的惆怅交织在一起，使整篇《多余的话》流露出一种低沉、抑郁的调子。

这种愧疚、惆怅心情与他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从容就义是并不矛盾的，而是他高度革命责任感在特殊境遇下的显现。这对一个确实有过错误，但襟怀坦白、感情真挚、勇于承担责任、热望革命事业迅速前进的人来说，实在是十分自然的。不能把这曲

解为厌倦了革命，动摇了信念。这就是为什么瞿秋白在谴责自己的错误，谈论“历史的误会”的时候，又会明白无误地申明说：

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实际上，当瞿秋白尚在奋发战斗的时候，也时有愧疚心理发生，有“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的感喟。前引《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中的一段文字，即是一例。“没有牛迫得狗去耕田”，似乎消极，但只要我们读一读前后文，就会感到，那里其实是洋溢着多么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希望竭尽全力去担负难以胜任的繁重任务的革命精神。瞿秋白按生年属狗，少年时即自称“猎犬”为戏，因而后来每每以“狗”自比，对此不必称奇；这只是表达他虽觉力不从心，但仍勉为其难，服从革命需要的意思。在《自序》之前，他在《饿乡纪程》中，也有“无牛则赖犬耕”^①的话，而这显然与同时所说的“宁死亦当一行”的决心相一致。《自序》之后，与鲁迅并肩奋战于左翼文艺运动中时，又曾用“犬耕”^②、“何苦”^③的别名，这也决不是厌倦战斗的表示。因为他当时正不顾王明等人的打击和排斥，自动走上文学战线，忘我而愉快地工作着。所以，“犬耕”一类别名和言辞，并非“不好”；同样，《多余的话》的愧疚、惆怅心情后面，也隐藏着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低沉的调子里潜伏着革命感情的热流。

①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55页。

② 周建人：《学习鲁迅，认真读书》，《回忆鲁迅》，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9月版，第144页。

③ 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8月版，第130页。

其次，瞿秋白的“心忧”，又是激于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怀疑和愤懑，出于对党的前途的忧虑。这使他的“心忧”的内容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要说明这方面的内容，则需联系他最后几年的特殊处境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者们，仅仅将《多余的话》与瞿秋白的被捕相联系，从而寻找叛徒的“心曲”。他们避而不谈瞿秋白入狱之前的四年里，一直处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排斥、打击之下的事实，也仿佛不知道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给革命造成了多大的危难。

事实是，瞿秋白早在党的六大至一九三〇年夏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期间，就反对当时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米夫支持下的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与之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于是，“瞿秋白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在党内的主要打击对象”，^①被调回国内。不久，一九三一年一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进而在米夫支持下夺取了领导权，更给瞿秋白以无情打击。他们荒谬地认为“立三路线是右了而不是左了”^②，指责瞿秋白在处理立三路线的问题上犯了所谓“调和路线”的错误，把他开除出政治局。直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还“不让瞿秋白同志跟红军走”，使他只好“听任命运摆布”，^③以至终于被捕。如果说，在莫斯科期间，瞿秋白尚可以与形成不久的王明集团开展斗争，那么，在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夺得了领导权，打起了“国际路线的旗号”之后，再公开反对他们实际上已不可能，只得“暂时忍耐”了。现在，瞿秋白身陷狱中，并且没有重返队伍的希望，因而就在《多余的话》里，用“顺着中央，责备自己”^④的口气，亲吐露对于王明集团

①② 陆定一《〈忆秋白〉前言》，1980年6月17日《人民日报》。

③ 吴黎平：《在党的历史的紧要关头（关于遵义会议之前的片断回忆）》，1981年7月《学习与研究》创刊号。

④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1980年2月《文汇报增刊》第2期。

的怀疑和愤懑了。他这样叙述六届四中全会以后自己的精神状态：

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地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这里说“一九三一年初开始了”他政治上的消极时期，正是瞿秋白遭受王明排斥、打击的时期；“最坏的党员”、“值得开除”，都是按王明集团的标准来说的；“停止怀疑”、“不怀疑”，主要是为形势所迫，并非真的不怀疑。就在这段话之后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一节中，他就表露了他的怀疑，说：“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这就是说，打着正确的“国际路线”旗号的王明路线，究竟与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有什么不同呢？与自己早已认识其错误的“左”倾盲动主义有什么不同呢？

然而，自从一九三一年初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瞿秋白背上犯了“调和路线”错误、反对“国际路线”的罪名，遭受了巨大的压力，动辄得咎，只有不断“检查”自己的义务，而无公开怀疑王明路线的可能，否则他就无法留在党内。瞿秋白这样简括自己这四年中的处境：

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过几次政治问题

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

这里，同样不言而喻，所谓“老机会主义”，是与王明等人加给他的“调和路线”相应的帽子；“争辩起来太麻烦”，则说明他与王明集团有“不同政见”而无法争辩的状况。因而，在《多余的话》的最后一节里，瞿秋白流露了非常复杂的感情。他说：

一个平凡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枉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

在这最后的自责中，很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后来的祸害”，不仅包括立三路线造成的损失，更暗指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带来的灾难。因为王明路线的恶性发展，这场灾难终于使党和红军不得不撤离建立了多年的江西苏区，进行长征。

我们叙述了瞿秋白最后四年的处境，也就懂得了《多余的话》中不少段落的真意。瞿秋白一方面愤慨于王明集团，同时又把他们的祸害与自己过去的错误相联系。这就可以想见，可以体味，他的心情是何等沉重！何况这种心情，又不能在敌人狱中这样的环境里明白说出。何况他并不知道遵义会议已经结束了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这就是瞿秋白“心忧”的更深内容。

显然，瞿秋白的愧疚和“心忧”，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曲折

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于革命的忠诚，反映出他在特殊处境和环境中的一种特殊心境。他在临终之前把这种心情抒写出来，虽是“书生气”的表现，做法不无可议之处，但视其实质，实在是再一次体现了贯串其一生的那种真挚地追求真理的精神。

但是瞿秋白在剖析自己的错误和弱点的时候，包括谈论他无力与王明集团斗争的时候，在好多地方对自己作了过分的贬抑，太多的否定。这是不适当的。他说自己是“半吊子的‘文人’”，“虚负了”“领袖的名声十来年”，“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等等；其他有的自我谴责，说出了确有的弱点，但也带有夸大的成分。

这种过分的自我否定，倒是又一次在客观上暴露了他的一个真正的弱点，即认识上的片面性和感情上的偏激。这在他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也曾出现过。当时，他出于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愤慨，和由于对中国社会缺乏细密的分析，走到了另一个倾向，陷入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现在，在看待自己的问题上，则由于谴责自己过去的错误和对王明集团的愤懑，过分否定了自己，抹煞了自己政治上的功绩和主流。这也是走了一个极端。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表现出来的认识上的片面性，还在于对“文人”与政治家的矛盾的看法上。他在《多余的话》的第一部分中就说：“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十几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瞿秋白这里把“文人”和政治家截然对立起来了。他

认为自己的秉性只适宜于做一个“文人”，从事政治活动于自己痛苦，于革命无功。他似乎找到了自己一生的根本矛盾。因而他就更在政治上否定自己了。

诚然，“文人”和政治家涉足的领域是不同的，在气质上、兴趣上和某些思想方法上是存在差异的。这差异确实就是一种矛盾。瞿秋白从青年时代起，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舍弃文学爱好，从事政治斗争；并且在革命最困难的关头，毅然走上党的领导岗位；直到最后，还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竭尽全力。这是他革命精神的表现。但是，“文人”与政治家的矛盾，又不是绝对的。瞿秋白青年时代弃文从政，三十年代初又本着“用文艺帮助革命”的宗旨重返文学战线，恰恰说明两者可以在革命精神这一基础上统一的。因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革命性的强弱，才是决定他成败得失的根本。换言之，战斗岗位的不同，并不是他贡献大小的主要原因。周恩来在庆祝郭沫若五十生辰的讲话中曾指出：“有人说，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多表现在他的著作上，郭先生的战斗性，多表现在他的政治生活上，我想，这种分法，并不尽当的。因为一个人的战斗性是发源于他的思想性格和素养的，文字和行为，不过是他的表现的方面罢了，并不能说这是差别的所在。真正的差别是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较任何人都持久都有恒，这是连郭先生都会感到要加以发扬的。”^①周恩来说得很清楚，鲁迅比许多人要伟大，其原因，在于他思想性格和素养方面，具有特别韧长的战斗性。鲁迅可以说是一个“文人”，但他的革命精神不仅体现在著作里，也在实际政治活动中明显表现出来，是渗透于他的全人格的，而决不是在两个岗位上表现出双重人格。

^① 《我要说的话》，1941年1月16日《新华日报》

那么，瞿秋白“思想性格和素养”上究竟有些什么弱点呢？《多余的话》除了在客观上反映了他认识上的片面性之外，有没有正确意识到自己思想性格上的弱点呢？瞿秋白最后在难以说清“文人”与政治家的矛盾后，触及了实质性的问题，就是“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即“‘异己的’意识”，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他说，“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这最后的自评，如果除去其中过苛的自责和夸张，如“滑稽剧”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这种“绅士意识”和“情感”，主要表现在不深入到社会实际和工农群众的斗争中去，缺乏感性体验，“总是雾里看花”的习性，和由此产生的“苦闷、寂寞和孤独”之感。这是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前的“名士派”习性的残余表现。这种习性曾经随着世界观的转变，并在风起云涌、尖锐剧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很大程度地得到了克服；但在遭受打击之后，连客观上也不易接触工农群众实际斗争的情况下，尤其是被捕、“被拉出了队伍”之后，重又变得有点浓重起来。这就是我们在《多余的话》里感受的那种低沉的调子、灰暗的情绪所产生的更深的的原因。瞿秋白最后的关于自身弱点的自我鉴定，基本上是正确的，并得出了深刻的教训。他最后在认识自己的问题时，找到了一个真理。

简短的结语

瞿秋白是中国现代革命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由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刺激，十月革命的感召，马列主义的影响，和半

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异常剧烈的阶级斗争的推动，从没落的封建阶级中反叛出来，经由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走向了共产主义。他在曲折中坚持前进，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瞿秋白的道路和贡献，生动证明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毛泽东说过：辛亥革命以来的许多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①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是如此，马列主义本身的创立也是如此，列宁就曾指出：“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

“而社会主义学识则是由有产阶级中学识丰富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曾经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也是完全不依赖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从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中自然和必然地产生出来的。”^②这一切都说明，由其他阶级转变过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向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瞿秋白正是这种革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之一。

另一方面，也应当指出，瞿秋白直至他短暂一生结束的时候，还不是很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曲折前进的道路上，有过政治路线上的失误，思想认识上的偏颇，和感情上的波动。究其根源，在于他始终未能完全根除现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604页。

^②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42—243页。

点，未能长期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缺少实际斗争的锤炼。对此，他自己也是引以为憾的，认为是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教训。

瞿秋白的一生又证明，无保留地为革命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品格，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也最重要的特征，是人民群众衡量历史人物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标尺。瞿秋白虽然在政治上犯过错误，在思想上有着弱点，但纵观其一生，却有着一个最突出的东西，那就是真挚地追求革命真理、无私地为人民解放而奋斗的精神，那就是勇于自我批评、决不文过饰非、从不谋求个人名位的品格。这种精神品格，明如日月，行似江河，始终一贯，从无改变，即使在最后的《多余的话》里，也没有泯灭。唯其如此，他才能够为革命作出贡献；并且使他能够历久不衰地受到人民的爱戴。在人民心目中，他是一个真实的革命者。即使在被“口诛笔伐”、砸坟扬灰的“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形象，也没有在他们心目中倒坍下来。相反，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王明，高唱最最“革命”调子的林彪、“四人帮”，以及一切抱有个人野心或孜孜于谋求一己私利的人，总是为人民所厌恶，到头来也总为历史所抛弃。

人民是不能欺骗的，历史是公正的。

瞿秋白散文的創作个性

瞿秋白是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三年思想转变途中开始写作散文的。他的主要散文著作是《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这两本散文集子，被公认为我国新文学开创时期的优秀之作。但是，如果我们略略回顾一下，就会发现，不少评论者并不是真正把它们作为文学作品来对待的。他们在具体分析时，总是首先着眼于它们的政治作用和社会意义，这样的评论一般来说当然无可厚非，但由于离开了它们作为文学作品的特点，没有揭示出它们的文学价值，因而实际上未能圆满说明它们何以会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为了认识瞿秋白两本散文集子的文学价值，我们不妨先对照着看一看他在同一时期所写的通讯报道和理论著作。在通讯报道方面，仅据一九二一年六月至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的《晨报》，瞿秋白就写有三十五篇之多，共约十六万字。在这些文字里，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对苏维埃俄国的革命现实，进行了详细而正确的介绍和评论。在社会科学著作方面，瞿秋白于一九二二年秋，完成了一本《俄罗斯革命论》，这自然更是对俄国革命的历史、政事、制度进行认真调查和考察的成果。显然，如果只着眼于政治内容和社会意义，那些著述已经做到，瞿秋白就不必再来写这两本散文了。

为什么要在上述报道、论著之外，写这两本散文呢？他本人在《赤都心史》的《序》中这样说：“《赤都心史》将记我个人心理上之经过，在此赤色的莫斯科里，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于此时期，我任北京《晨报》通信记者的职务，所以一切赤国的时事自有继续的通信，一切赤国的制度另有系统的论述，不入《赤都心史》内。只有社会实际生活，参观游谈，读书心得，冥想感会，是我心理记录的底稿，我愿意读者得着较深切的感想，我愿意作者写出较实在的情事，不敢用枯燥的笔记游记的体裁。我愿意突出个性，印取自己的思潮”^①。在此前不久，他刚刚写完《饿乡纪程》，也在其后附笔说明，这主要是抒写自己“心程中的变迁起伏”的，与“政治史、社会思想史”不同，更不是“旅行指南”。当这两本集子先后刊行时，他又总结说：“两书均是著者幼稚的文学试作品”^②。这反复的表白，说明瞿秋白是十分重视这两本集子的文学性质的。而在他看来，它们作为文学作品，能够具有理论和报道所没有的特点：突出自己的个性。

瞿秋白的这个看法，实际上反映着五四新文学作家共同的文学主张。这是五四时期个性解放思想在文艺观上的表现。当时，新文学的作家们大都强调以是否表现了个性，作为衡量文学作品成败的标准。他们认为，许多封建的旧文学作品，只是些奉命而作的“赋得文学”，只是些“代圣立言”、载他人（孔孟）之道的滥调文章，人云亦云，千篇一律，毫无真情实感，因而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可言。他们宣言：新文学就要冲破那固定的硬壳，用自己的话写出自己的思想感情来！这个主张，首先在散文领域里得到广泛的实践，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因为散文本是便于直接抒发

① 《赤都心史·序》，《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0月版，第96页。

② 《赤都心史·引言》，《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97页。

作者感受的一种比较自由的文体。所以，郁达夫后来这样总结说：

“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的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①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的这种主张和实践，是值得珍视的，它不但有着反封建的革命意义，是对旧文学的示威，而且确实表明了“创作”这个称呼真正的含义。瞿秋白的散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它的文学价值。

心弦的乐谱

在散文的语言和形式的某些方面，五四时期的瞿秋白并不是佼佼者。瞿秋白不象其他一些新文学作家那样，能有很多时间和精力从事创作。因而他的作品，如他自己一再说过的，是“稚弱”的试作^②。确实，有的人，譬如与他差不多同时写作散文的冰心，她的白话是更经锤炼的文学语言，纯净、流利而凝炼。瞿秋白的语言则有时出现较明显的文言文句式的痕迹。在散文的艺术技巧上，冰心也更娴熟。然而十分明显的是，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真挚、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于社会生活、历史进程和各种具体社会现象的与众不同的理解、期望和感受；并且成功地运用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思路、格调和手法，即使在语言上也自有其特点，蕴含着战斗的诗情。从而，瞿秋白的这些散文，散发出自己的芬芳，显露了自我的特殊色彩，成为他“心弦上乐谱的记录”^③。这样，它们终究不失为文学作品，能够在新文

①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8月版，第5页。

② 《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作于1927年2月，据手稿影印件。

③ 《赤都心史·序》，《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96页。

学绚烂多采的百花园里占据一个地位。

瞿秋白散文的创作个性，究竟是怎样的呢？

首先，创作个性是与实际生活中作家本人的个性密切相关的。而作家的个性，首先根植于对社会现实一定的看法。社会观是作家创作个性的基本。在社会观上，五四时期的瞿秋白，就与当时绝大多数作家不同。当时绝大多数新文学作家，尚未脱离小资产阶级的范畴，都从一般的民主主义意识出发，要求冲破封建的思想牢笼，却并不明白出路在哪里，前途是什么。瞿秋白虽然思想上原本也属于这个范畴，甚至还带有封建士大夫阶级的印痕，但他勇于决裂，勤于探求，已粗具社会主义观点，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论的热烈信奉者了。这在那时，就显得是颇为独特的了。例如，《饿乡纪程》的《绪言》，就生动表现出他对于十月革命热情的向往，由衷的信仰。《绪言》一开头就写道：“阴沉沉，黑黢黢，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所在，我有生以来，没见一点半点阳光，……”这是一个多么可憎恶的鬼域世界啊！“我”不愿在这“黑甜乡”里摸索着吃喝了。“我”对旧中国的憎恶为什么如此强烈呢？因为他已望到了异国的光明。十月革命的光芒使他产生“奇异古怪的滋味”，特别深切地感受到周围的黑暗，产生一种不可抑制的渴望，万分迫切地希望那里的阳光照射进来，虽然那里现在是一个“饿乡”。他好象一个“疯子”似的，呼喊着：“一线的光明！一线的光明，血也似的红，就比一线便照遍了大千世界。遍地的红花染着战血，就放出晚霞朝雾似的红光，鲜艳艳的耀着。宇宙虽大，也快要被他笼罩遍了。”这个“疯子”，表面上，很象鲁迅的《狂人日记》中那个觉得自己多年没有看见月亮了的“狂人”，在黑暗中挣扎。但实际上，与“狂人”所象征的反封建战士很不相同。“狂人”对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的了解是极为深邃的，但始终满怀着“被吃掉”的恐惧，并且企图“劝转吃

人的人”，最后只能在孩子身上寄托自己渺茫的希望。而这《绪言》中的“我”，已经完全绝望于旧社会，已经望见生意蓬勃、希望无穷、灿烂庄严、光明鲜艳的阳光了，那就是实实在在的苏俄。并且，不仅如此而已，“我现在挣扎起来，我往饿乡去了！”去“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了！另一方面，这个“我”又与别的作品中的“社会主义”者相异，例如郭沫若《女神·序诗》中的“我”，宣称“我是一个无产阶级者”，“我愿意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但实际上，这只有字面上的浮浅意义，它的作者，当时“连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概念都还没有认识明白”^①，这一宣言是不免显得空洞的。而且《序诗》和其后《女神》中的诗篇的思想内容也缺乏内在的密切联系。相比之下，瞿秋白《绪言》里的“我”对于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观念和感情，要明确得多，切实得多，并且贯串在《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的全部篇什之中。

瞿秋白这种对社会主义的初步而由衷的信仰，和奋发向上、生气勃勃的革命精神状态，是构成他创作个性的主要因素。

同时，在作品里，这个主要因素又与瞿秋白在艺术上的独特表达方式水乳交融。他探求社会主义真理的不懈努力和全部热情，总是表现为带哲理性的思索和奔放的战斗的抒情，令人深思，令人感奋。这样一种对于社会现象的独特认识、态度、感受和独特的艺术表现的统一，就是瞿秋白散文的创作个性。

《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都是叙事作品。其中《饿乡纪程》带有五四初期常见的“随感录”色调，《赤都心史》更写得质朴，自然，舒展自如。它们都顺着时间的推移和感情的起伏，遇有可写，就随笔写去，时而直露，时而宛转，时而沉静，时而高昂。但无论是什么写法，都显露出紧张、严肃地思考的印记。作者似乎没

^① 郭沫若：《创造十年》，《沫若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8月版，第133页。

有那种专注地、尽情地记叙事件、描摹风景、勾画人物的余闲。他不象许多游记作者那样，喜欢描述一般的风土人情或奇闻趣事。他总是写那些能反映当地社会面貌的一些富有特征的事物情状。例如《饿乡纪程》第七、八节，就通过片断的场面，生动的对话，展现出当时哈尔滨日本帝国主义对旧俄侵略势力的取代，中国各阶层人或阔绰或勤俭或漠然停滞的生活状况，以及俄国的“新旧党争”等重大社会现象，从而清晰地再现了哈尔滨“中俄日三国的复彩版画”的特殊面貌。并且，他在记叙、描摹和勾画中，总在思考着什么，总想从中发现一些什么道理，总结一些什么教训，使自己的认识更接近于真理，于是常常随时发出割切的议论来。例如，他简洁地描绘俄国亡命者的白党、资本家、将军“高楼大厦地住着，肚子吃得饱饱的，和日本人鬼鬼祟祟串些新鲜把戏”，又谈到中东路工人联合会及哈尔滨城市工人联合会为中俄工人“举办好些事业”之后，精辟议论道：“中俄两国民族的接近，确比日本人及其他欧洲人鞭辟入里得多。中国苦力心目中的俄国人决不是上海黄包车夫心目中的‘洋鬼子’。下级人民互相间的融洽比高谈华法，华美文化协会的有意思——他们大家本不懂得‘文化’这样抽象的名词，然而却有中俄文化融会的实效。”这段即兴式的议论中，关于“文化”的见解，关于文化交流的看法，在今天看来，还是一种真知灼见。有时候，议论不是在记叙、描摹之后，而自然地融汇在记叙、描摹之中，甚至在留连自然风物的时候，也是如此。如他泛舟松花江时，开头写道：“蔚蓝的天色，白云和堆锦一般拥着，冷悄悄江风，映着清澄的寒浪。松花江畔的景色，着实叫人留恋。”这是多么清新优美的描写，满含着诗情画意。但他没有象一般诗人墨客那样沉醉其中；当他远远望见江上的中东路铁桥，不禁联翩不绝地想到中东路的历史和现状，哈尔滨的殖民地化，北方生活的污糟等等。于是，松花江

上的风景，变成了：“帝国主义的血浪，殖民政策的汗波，激扬震荡，挟着红胡子似的腥秽的风暴，丘八爷似的严酷的冰雪，飞吼怒号”。到此，实际上已不是景物描写，而是感情强烈的带形象性的议论了。可见，在《饿乡纪程》中，在这虽是记叙性的散文中，理，也是他注意的中心。这位游记作者，始终是社会、人生问题的严肃的思考者。

到了《赤都心史》，记叙的调子比较舒缓，思索的印记好象淡化一些，不那么急切，其实却是更为深沉，也更简洁精到了。它每一节，几乎都是一事一议，连续不断地记录着自己思想上的收获，迫切地要把他的发现和信念，奉献给读者。读者呢，也确实会情不自禁地随着文章的进展，和作者作同样的思考。

《赤都心史》中较多刻画人物。他的刻画人物，同他的叙事、写景一样，大多不作精雕细琢，没有多少具体细节。他也许对人们琐屑的心理和言行不感兴趣，也许并非不感兴趣而顾不上多花笔墨。他喜欢简洁勾勒富有阶级特征的行为和心理，同时略为点染富有时代特点的环境气氛，以反映他们内在的精神面貌，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见解。例如他这样描写革命后的一个地主被没收土地后的可笑可悲的神情、行为：这个被剥夺了土地的地主始终不明白是发生了革命，到处申诉：“我没有犯罪，为什么没收财产？”他自言自语：“什么！什么！……啊！……不是地主了？没收？房子，田地？……呀！什么！……什么！”他是处于一种癫狂状态中了。“小村落的尽头，一间木屋外，残枝堕叶，雪影稀微之处，常常可以看见一人，有时背着手，有时杈着腰，独行踽踽，来去踟蹰，不时指手划脚，呢喃自语：‘呀！什么！’”^①这一幅剪影，清晰鲜明，十月革命后俄罗斯地主的惶遽可笑之态，跃然纸上，是

^① 《“什么！”》，《赤都心史》中之一节。

相当典型化的。在这幅剪影背后，透露出十月革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动。至于描写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的那一节，更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常常为人称道。而作者不过是写了寥寥几笔。他先是略略介绍列宁的才学、谈吐、风度：“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继而浮雕式地描绘他登台演说时出现的庄严、热烈的场面：“安德莱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删节号原有——引者）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这么短短一段文字，就把一位深受群众爱戴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伟大形象，生动地显现出来了。在这里，作者无论进行概括性的介绍，还是形象的描绘，都渗透着自己对于革命导师的崇敬，饱和着热烈昂扬的情绪。他是要把自己对于列宁的伟大印象传达给中国读者，而不只为了作客观的描述。还有一些人物刻划，则是围绕着一个重要思想来展开的。如《心灵之感受》，通篇引录一个苏维埃职员自述革命斗争的经历和感受。作者虽然没有直接发一句议论，实际上所录的全部“自述”，都突出地归结于他的一个闪耀真理光辉的体会：“‘为人服务’，忘了这‘我’，‘我’却安逸，念念着‘我’，‘我’反受苦。”而显然地，这正是作者想要让读者记取的至理名言。

这种严肃、紧张地思索的印记，在其他五四散文中是不多见的。当时许多作家从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出发，接受了各种外来思想的影响。但除了科学社会主义，许多外来思想脱离中国社会现实，显得空泛，本来就没有多少值得认真思考的材料。有的呢，

除了感染了个性主义的气氛，要求自由抒发自己的感情之外，并没有接受什么理论。譬如冰心，象茅盾所评论：“也许我们觉得奇怪，为什么风靡‘五四’时期的什么实验主义，什么科学方法，好象对冰心女士全没影响似的”，她只是“处处以‘自我’为起点去解释人生”。而她的解释，只是一种飘忽不定的思绪和徒然的好心肠，最后都归于没有实际社会内容的神秘主义的“爱”的哲学，因而其实是什么也没有解释。^①周作人的小品文，则只醉心于知识和趣味，或到清泉绿茶、草木虫鱼中去寻觅恬静闲适，更谈不上有什么严肃的思考。如他的《北京的茶食》，从北京的茶点今不如昔，谈到中国生活“极端的干燥粗鄙，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吃到好点心。”其间，他神往于“义和团以前的老店”，发出“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的感慨^②。文章里流露出对于现实些微的、平和的不满，但不满不是把他引向未来，而是使他怀古，使他去追寻一种士大夫式的生活情调。瞿秋白的散文，可能没有他们那种细腻、雅致，却以他严肃的、深切的对于社会人生的思考，表现出作者视野的开阔，眼光的深邃，和特有的掌握现实的方式，展现了新的文学天地。

但这并不是说瞿秋白的散文富于理智，缺乏感情，更不是说他缺乏文学素养。其实，瞿秋白是富有诗人气质的。我们只谈谈他的语言吧。他的深刻的哲理，常常用浓郁的诗情语言表达出来。他的语言，虽带有文言的痕迹，但借助于自幼的古典文学的熏陶，适应着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激情，精炼、优雅，而色彩浓重、气势奔放。如《赤都心史》中的《黎明》，抒发对于苏维埃社会和文化的观感时，这样写道：

^① 《冰心论》，1934年8月《文学》第3卷第2号。

^② 见《雨天的书》，北新书局1931年9月版，第67—69页。

黎明来临，预兆早见，然而近晓的天色几微，鱼肚惨色渐转赤黑愁黯的霞影时，反不如就近黄昏的夕阳！游荡狂筵的市侩乐，殊不愿对于清明健爽的劳作之歌让步。何况夜色的威权仍旧拥着漫天掩地的巨力，现时天机才转，微露晨意，未见晨光，所显现的只是黎明的先兆，还不是黎明呢。鱼肚之光，黑霞之色，本来是“夜余”而又是“晨初”呵。①

用“黄昏的夕阳”、“夜色的威权”，比喻资本主义文明及其由盛转衰的状态，以“近晓的霞影”、“清明健爽的劳作之歌”，象征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方兴未艾的特点，是何等恰到好处，而又寓意丰富，诗意盎然。它们浑然一体地融汇着哲理和诗情。较后的一节《晓霞》，可称《黎明》的姊妹篇，也以瑰丽的想象，磅礴的气势，抒发出一种昂扬的气概和必胜的信念。这种哲理和诗情的融合，在瞿秋白散文中一直保持着，直到后期也是如此。他写于一九三三年的《“儿时”》②，回顾逝去的青春，感喟中年以后的“衰退”，却仍然希望在持续的战斗中，在大众的事业里，领略到“永久的青年”，也是一篇非“心粗气浮”所能为的优美而“含有芒刺”的散文③。

瞿秋白散文的个性特点之所以鲜明、凸现，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他在作品里常常作深切的自我解剖。应当说五四新文学作家们，为要表露真情实感，突出个性，大多是爱在作品里进行自我解剖的。他们自由抒发自己的感受，坦露内心的奥秘，剖析、审视自己的言行和心理，表现自我。声称作品就是作家的自叙传

①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98页。

② 《见瞿秋白文集》第2卷。

③ 《鲁迅书信集·致黎烈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夜）》

的郁达夫，就明确地说，他的散文，“多是解剖自己，阐明苦闷心理的记载”。^①别的作家，如冰心，虽没有明确表白，但其散文实际上也多是自我解剖，只不过比郁达夫要委婉含蓄并且侧面不同罢了。但是，同是自我解剖，在深刻性上与瞿秋白的有很大区别。他们作为崇奉个性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往往在自我解剖中寻求知音，或者孤芳自赏，都不外是自我肯定。有的好象自责，其实仍是对自己的欣赏和肯定。如冰心在《寄小读者》里向孩子们诉说，有一天晚上，一只小小的鼠子无猜地爬到她的桌子上，她没有及时保护好它，结果被家里叫做“虎儿”的猫咬吃了。于是她的“心上蹙的着了一箭”，久久排遣不开，“有时读书至深夜，再看见有鼠子出来，我总觉得忧愧，几乎要避开，我总想是那只小鼠的母亲，含着伤心之泪，夜夜出来找他，要带他回去”。作家就是由于这件事，向“纯洁的”小朋友深深“忏悔”说：“我堕落了！我堕落了！”^②郁达夫的自我解剖，则不时对自己的病态心理作自我暴露，充满着忧郁、伤感的情调。而瞿秋白因为一心追求真理和人民利益，强烈希望摒弃自己的旧意识，所以他的自我解剖，常常导致自我否定。同样是身处异国而思念家庭、父母、亲友，冰心总沉浸在甜密的回忆里，反复咏叹母爱的崇高，亲人的温情而惆怅莫名，忘怀现实。瞿秋白对那一切不无留恋，他对往昔的生活是写得很动人的：“我幼时虽有慈母的扶育怜爱；虽有江南风物，清山秀水，松江的鲈鱼，西乡的菘菜，为我营养；虽有豆棚瓜架草虫的天籁，晓风残月诗人的新意，怡悦我的性情；虽有耳鬓厮磨啾啾情话，亦即亦离的恋爱，安慰我的心灵；良朋密友，有情意的亲戚，温情厚意的抚恤，——现在都成一梦了。”然而他紧接着惊悟，“惨酷的社会”容不得他这种生活和情趣。为了前

① 郁达夫：《奇零集·日记文学》，开明书店1928年3月1日版。

② 《寄小读者》，北新书局1928年初版，1935年第21版，第5—8页。

进，他断然地说：“‘过去的留恋’呵，你究竟和我的将来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是万缘俱寂，一心另有归向了。一挥手，决然就走！”过去旧家族中那种“悱恻缠绵”的情绪和“安闲的乐趣”，那种“即使一片云影，几朵落花，也能震动我的心神”的精神状态，在别人可能是颇为珍惜、借以自我陶醉的东西，他却以为“和旧时代的精神密切相关，是旧社会生活的遗迹”，需要改变^①。总之，他倾心于新时代的潮声，一切与旧社会相联系的精神状态，他都觉得是不和谐的，因而时时不满自己，否定自己，鞭策自己。这种深切的自我否定式的自我解剖是催人进步的，同时也更真实更清晰地表现出他的真诚的革命者的个性，和这种个性不断由革命民主主义的基地向共产主义方向转变的历程。

所有这一切的统一，亦即他的独特的社会见解、人生态度和他的独特的掌握现实、反映现实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构成了两本散文集子深沉、雄浑、激越的基调。这种基调，最后使瞿秋白的散文与上述诸作家的作品明显地区别开来。它完全不同于冰心的“满含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欲语又停留”^②的哀而不伤的调子，不同于周作人的淡泊与平和，也不同于郁达夫的颓丧和偏激。它是时代的最强音，是与当时社会前进的步调相一致的。

社会的画稿

瞿秋白十分重视在文学作品里表现个性，但又不象五四时期许多个性主义者那样，把个性和社会，个人和群众对立起来。他反复强调：“个性的突变没有不受社会环境的反映的”^③，“个性的

①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4页，第18—19页。

② 见冰心：《寄小读者》，北新书局1935年第21版，第203页。这原是作者《诗的女神》里的诗句，不过她说她的散文也是这样的。

③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0页。

生活在社会中，好比鱼在水里，时时要求相适应。”^①因而他希望既保持自己的个性，又使之与时代的步调相适应，相和谐。他希望在自己的作品里突出自己的个性，印取自己的思潮，同时“且要试摹‘社会的画稿’”^②。瞿秋白的个性，从五四以后，不断向着社会主义者的方向发展，就必然地顺应时代潮流，具有很大的社会性。他的作品《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也就必然成为有力地介绍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的优秀文学作品，与一代新人的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相通，产生强烈的社会影响，在文学史上和思想史上都获得了较高的评价。

当然，凡有创作个性的作品，都是宝贵的，都优胜于平板的、人云亦云的仿制品，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增添文学宝库的财富，因而都有一定的社会性。但是，过分狭隘的个人情绪和感受，远离时代精神和时代审美要求的个性及其表现，其社会性却受到很大局限。而瞿秋白，由于坚持社会主义见解并不断深化，他的眼光就总投向广阔的社会现实，注视重大的变革和工农群众的意向，让自己的感情融汇在千百万劳动群众之中，因此，瞿秋白的个性表现得愈充分，它的社会性也愈明显。在他笔下，不断出现一个个重大社会事件，如五四运动的狂涛骇浪，日本与旧俄对中东路的争夺，哈尔滨新旧势力的较量，五一节莫斯科红场上的盛典，布尔什维克平定喀琅施塔得的反革命叛乱，反对官僚主义和救济饥民等等。它们各自展示出社会的某一侧面。在他笔下，又出现众多的、各方面的人物：革命领袖、机关职员、工人农民、妇女儿童、没落贵族、反动地主资本家、吝啬的小商人、武断的或明达的知识分子等等；并且如前所述，他总是着意刻划他们富有社会意义的心理、行为。这一切，

^① 《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70页。

^② 《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96页。

都通过瞿秋白个人的感受反映出来。这样，读者，尤其是中国的进步读者，不但由此知道了苏俄的革命现实，而且体会到这种现实如何感动、说服了自己的同胞，因而更饶有兴味，更觉亲切、可信。歌德说过：“要是他只能表达他自己的那一点主观情绪，他还算不上什么；但是一旦能掌握住世界而且能把它表达出来，他就是一个诗人了。”^①《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表明，瞿秋白正是这样的“诗人”。

瞿秋白写入书中的那些似属个人的东西，也大多具有明显的社会意义。如《饿乡纪程》的四、五部分，叙述自己少年时期目睹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心境、进入俄文专修馆时的抱负、五四运动发生前后与郑振铎等创办《新社会》、《人道》等刊物的经过，在社会主义思想感召下离京赴俄的动机等等，虽然都写的是个人的经历和情绪，却包含丰富的社会内容，成为历史的旁证。这就无怪乎现在有一些现代革命史方面的资料书，往往将这两部分收入，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五四时期思想状况的一种根据。这两本散文集子里的其他一些篇章里，还有不少极富他个人特点的体验和感受，与许多重大社会事件和现象联系着，同样是既属于个人、又属于社会的东西。

不仅如此。他的这两本书的整个主题、基调，都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并且历久弥新。因为它们生动表现了有志的青年对社会解放之路的勇敢探索和向旧事物告别的精神面貌，而这种精神是永远宝贵的。它们也确实是在越过了六十年的光阴之后，还能继续激励我们。我们可以相信，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它们仍然将激励我们为真理而斗争。

^① 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6页。

瞿秋白杂文的战斗风格

一个作家的创作个性，既经形成，就具有某种稳定性。岁月的推移，体裁的改换，都不会使它失去本来的面貌。瞿秋白在叙事散文中孕育的创作个性，也在他后来的杂文中表现出来。

杂文是不同于叙事、抒情散文的特殊体裁，它介于文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是一种文艺性的社会论文，特别利于战斗。尤其是现代杂文，原本萌芽于“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它们篇幅短小，生动形象，锋芒毕露，能够适应急速变化、剧烈展开的斗争情势，直接面对社会现实，迅速作出反响和评价。五四以来大量涌现的杂文，都有着这一显著的特征。瞿秋白转而写作杂文之后，《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里那种哲学的沉思，内心的独白，细微的感触，自然已不复出现。但是他并没有失去自己。现代杂文的共性，还是通过他固有的创作个性，而形成他特有的观察的角度、评价的方式和语言表达的方法，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他的杂文风格，仍然根植于由衷的共产主义信念，高昂的革命热情，紧张的哲理性的思考习惯和真率而浓厚的诗人气质，因此与其他战斗的杂文作者迥异。它们不是深邃冷峻的，不是从容舒展的，不是潇洒明丽的。它们明白晓畅，痛快淋漓，峻急明快，热情奔放；虽含蓄不多而富于鼓动性和号召力，并且带有战斗的诗情，有一种清新的色调，一股逼人的气势。读瞿秋白的杂文，宛

如面临一泓清澄明澈的池水，一道湍急奔泻的山涧，令人深省，令人奋发。

由于瞿秋白的杂文具有这种独特的战斗风格，因而它们拥有众多的读者，尤其是在那个长夜漫漫的年代，尤其是在那些立志反抗、渴望光明的人们中间。

明白晓畅的文艺性政论

在那个黑暗年代，通过阶级斗争推翻反动统治，是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所在，是他们最强烈的愿望。而这正是瞿秋白杂文的主要题材。瞿秋白的杂文，大多是文艺性的政论。

一九二三年一月，瞿秋白从“赤都”归来才三天，就写了《最低问题——狗彘食人之中国》一文，迫不及待地来“对中国说几句‘逆耳之言’”^①，猛烈地抨击了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率兽食人，纵容帝国主义分子屠杀劳动群众的罪行，发表在《晨报副刊》的《杂感》专栏上。这就是一篇典型的政论性杂文，也是瞿秋白杂文写作的真正起点。

此后不久，瞿秋白参加了党的活动，以党的理论宣传家的姿态出现在政治战线上。编辑党的报刊，撰写政论文章，成了他的本职和急务。这就进一步规定了他的杂文的政论性质。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他断断续续，长长短短，写了四十余篇政论性杂文，和他的大量的、大块的政策文章并见于他编辑和主编的《向导》、《前锋》和《热血日报》上（其中大部分归入《寸铁》、《小言》一类杂感专栏）。这些杂文，或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或批判租界里的“民主”，或指出劳资调和论的危害，或嘲笑立宪派的懵懂，

^① 《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0月版，第197页。

或斥责基督徒的伪善，或声讨军阀们的罪恶，或描画半殖民地中国的缩影，……都幽默、形象，富有文学意味，却又是他的政治观点的巧妙发挥，可看作他的政论的组成部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瞿秋白先后担负了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和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重任，没有余暇写作杂文，留下了一段空白。直到三十年代初被迫离开党的领导机构后，才重新写起杂文来。他的后期杂文，仍然是政治性的。其中有的篇章，虽然谈论文学（文学书评、作家论和对一些文艺观点的批评），但除一、二篇外，也都重在揭示它（他）们的政治倾向和阶级属性，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同时，由于精力比较集中，篇幅和篇数远胜于早期，主题也随之有所扩展，有所加深。他不仅仅是触及眼前的具体政治事件，而且时时回顾过往的阶级斗争历史，瞻望未来的革命前景了。

瞿秋白固有的坦率、热切的性情，正与政论性杂文的特点相合。一般地说，作为政论性的文章，进行政治宣传，提出政治主张，不宜迂回曲折，委婉含蓄，而须旗帜鲜明，通俗易懂。特别是当年的阶级对立和斗争，非常尖锐，人们对政治形势的变化，十分敏感。这就要求政论性杂文的作者在表达自己强烈主观情绪和运用艺术方法的时候，要注意将善恶是非一一判明，要防止发生误解，去追求明白晓畅的风格。

瞿秋白最常用的手法，是类比和对照。他在“五卅”惨案后写的不少杂文里，就一再运用类比。如有一篇《贼的伎俩》^①，只有这么短短几句：“贼在戏院里偷东西，被人捉住了，贼党忽生急智，狂叫：‘火着了，火着了！’于是大家哄哄的乱跑，拥挤之中，那贼就逃跑了。英国、日本、美国人杀了人，大叫‘赤化’‘过激’，也算得个聪明贼。”这是将日常生活中贼喊捉贼这人所共愤的丑

① 1925年6月12日《热血日报》第9期。

行，来比附敌人卑劣的政治行径，一下子就暴露了他们的本相。另一种类比，是比较敌人在不同时间里的所作所为，找出其共同点，来擦亮群众的眼睛。如《更可怕的十秒钟》^①写道：“五卅”后，段祺瑞政府的官员与买办资产阶级控制的上海总商会，在一次宴会上合谋，减低了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三条要求；宴会结束时，段祺瑞政府派往上海“调查”五卅惨案的“督办”蔡廷干，在拍照的当儿，得意洋洋地说：“愿诸君永远勿忘此十秒钟！”似乎完成了一件大好事。但实际上，他们的这次合谋，与“五卅”那天“西捕在南京路开枪前十秒钟曾经下过一次警告”，其结果相同。前次“十秒钟”之后，是“同胞流血”；这次“十秒钟”之后，则将使中国人民的抗议消于无形，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宰割，是更可怕的。与类比相近的方法，是对照。即把同一个人互相矛盾的言论放在一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让其自我暴露。这可以《可爱的梁启超》^②为例。梁启超在五卅后在中文报纸上刊出宣言，声称要“与强敌相持”，实行“战争状态”。然而就在此前不久，他曾发表过一个英文宣言，哀求帝国主义讲“公道”，“人道”，表示“我们”并不反对他们。对前一个英文宣言，一般人未必注意，现在瞿秋白把它拈出，拿来对照，于是立宪派梁启超既想讨好人民，又欲向外人献媚取宠的丑态，就昭然若揭了。瞿秋白的类比和对照，有如使两石相撞，生成火焰，发出光亮，使其隐藏的本质明明白白地显现出来。

为了使本质暴露得更充分，给读者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瞿秋白还着力于抓住事物的主要特征，加以夸张。这种手法，多出现在后期杂文里。例如他在《世纪末的悲哀》一文中，指出行将没落的反动统治者，因畏惧人民反抗而患上一种“怕血症”。而这种

①② 1925年6月14日《热血日报》第11期。

“怕血症”，会转而变成拚命屠杀人民的“渴血症”。这样的渴血症患者是非常疯狂的。他描写道：“他们张大了吃人的血口，他们实在口渴得很，他们专门要吃奴隶牛马的血，他们想把黄河扬子江似的血都喝干净。”^①这是一幅多么可怖的图景啊！真象要把中国推向末日。这样的吃人者是谁也没有见过的，但正与当时的中国反动统治者神似。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豪绅、买办资本家及其爪牙们，不是在疯狂地镇压人民，“围剿”苏区，不是从无厌足地在榨取人民的血汗吗？张大血口的渴血者形象，正是旧中国统治者们的综合和廓大。瞿秋白还有一些夸张，则不是形象的廓大，而是进行漫画化的勾勒，使其特征凸现出来。如当时一些“自由知识阶级”，宣扬超阶级的人道主义，看似被压迫者的朋友，其实阻碍压迫者的战斗。瞿秋白按其特点，画了一个“外面的皮是红的，里面的肉是白的”红萝卜，为他们造象。^②再如，为要说明小资产阶级者以至一些工人农民的精神面貌，由于受到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和毒害，变得如何复杂、畸形，瞿秋白描述了奇特的“奴隶的心”的形成及其形象：“财神（指剥削阶级——引者）的神通，财神的政治法律宗教教育风俗……（删节号原有）以至于文艺的法宝，把穷人的心拗过来，弯过去，扯得长，拉得紧，四方八面戳了许许多多的洞，真正是‘千锤百炼’，弄得个奇形怪状。”^③这种种漫画式、脸谱式的夸张，虽然不免简单，却有明朗显豁的优点，有使读者一目了然的效果。

有时候，瞿秋白所论的对象，不是具体的人和事，而是复杂而抽象的整体概念，如一个时代，一个社会，这样，单幅的、简

① 《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0月版，第256页。

② 《红萝卜》，《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300页。

③ 《“忏悔”》，《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302页。

括的漫画就不能胜任了。这时，他采取的是一连串的象征。象征是概括性的暗喻，将一连串的象征，加以有机的组织安排，可将思想简洁、生动而又深刻地表达出来。《一种云》是最好的例子。《一种云》先生动描绘阴云遮蔽下的人间；再写天际刚刚出现的虹，开始响起来的雷电；最后预示必将有惊天动地的霹雳，来冲破层层乌云，拨开愁云惨雾，迎来灿烂阳光。^①全文似乎都是描绘自然景象，但几乎所有的景象，都各各是某一种社会力量的象征。不仅乌云象征笼罩全社会的黑暗势力，雷电象征人民群众的斗争，而且形成乌云的东西，即太平洋、大西洋的狂飙、淌着模糊血肉的榨床的蒸气、符篆的呼召、田地土蜘蛛的排泄、烟囱冒出的黑烟，都各各象征着帝国主义、封建军阀、高利贷者、地主豪绅和资产阶级的罪孽。至于虹，则是建立了红色政权的苏区，霹雳是革命的爆发和胜利。由于运用了这一连串的象征，因此这篇杂文虽只有短短六百余字，却高度概括地、鲜明地暴露了旧中国的无比黑暗及其根源，显现了复杂的阶级关系，揭示了唯有以人民的革命暴力才能改造中国的真理。此外，《暴风雨之前》的全文，《民族的灵魂》的开头，也都是用象征手法写成的。

最后，瞿秋白的杂文在语言上，总是直言不讳，言必尽意。这在早期和后期杂文里，都是如此，尤其是在作结论的时候。如他作于一九二三年的《乐志华案是一幅中国的缩影》^②一文的结尾，针对帝国主义分子“欲我离去上海乎！？撤销治外法权乎！？第一步将如何！？”的狂妄叫嚣，这样写道：“万恶的帝国主义者，等我告诉你：这‘第一步’就是：‘无钱’的人——中国一切劳动平民的联合团结。假使愿意听，我再告诉你‘末一步’：中国劳动平民联

① 《瞿秋白文集》第二卷，第261—262页。

② 1923年5月2日《向导》周报第23期。

合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殖民地的平民大团结，赶得你无国可归，看你还要治外法权不要！”这是何等痛快淋漓！后期杂文，由于文网严密，有时略有含蓄，但结论处大多还是相当明白地提出自己的正面看法，革命主张。

瞿秋白杂文的上述种种手法，有其相通之处，即都是简捷明快地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类比、对照，是依据事物间相似的特征而进行的；夸张、象征，更是抓住事物的特征而形成的。它们都删除细枝末节，不作精细刻划，而取其一点，加以凸现。这种方法，很多作家是不采用的，在一般的文学作品中，确实也不宜采用。不必说小说一类的文学作品里，即使一些表现曲折微妙的世态人情，或针砭人民内部的缺点弊病的杂文，也不很适合，因为它会失之粗疏，或会发生误伤。但是，瞿秋白所写的政论性杂文，议论的是当时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大善大恶，并且他确能把握事物的主要特征和要害，因而上述手法，是合适的，获得了一针见血的效果，形成了明白晓畅的风格。同样，语言表达上的有言必尽也是如此，虽然不免直露，缺乏回味，却自有一种旗帜鲜明的革命正气和直透人心的艺术力量。

不过，这并不是说，在瞿秋白杂文里，只有大刀阔斧，只有粗线条勾勒。他在进行铺垫的时候，描述是十分细致入微，具有一般散文的特点的。如《暴风雨之前》，主要采用象征手法，但在具体表现风（风在本文象征革命力量的兴起）的强劲时，这样描写道：“山上的岩石渐渐的蒙上一层面罩，沙滩上的沙泥簌簌的响着。远远近近的树林呼啸着，一忽儿低些，一忽儿高些，互相唱和着，呼啦呼啦……噉噉啾啾……——宇宙的呼吸都急促起来了。”^①这里，未着一“风”字，而风态风声跃然纸上。读着这样

^① 《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288页。

的文字，不禁使我们想起，瞿秋白原是一个优秀的散文作家。他不仅有洞察事物本质的本领，也有细致观察和描摹的才能。只不过是政论性杂文的特点和任务，促使他更多地发挥前一种本领，以求达到明白晓畅罢了。

与鲁迅杂文的异同

明白晓畅，原是鲁迅对瞿秋白杂文的评论。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对于秋白同志的杂文，在谈话中我曾听到鲁迅先生有过这样的评论：尖锐，明白，‘真有才华’。但他也表示过秋白同志的杂文深刻性不够、少含蓄、第二遍读起来就有‘一览无余’的感觉，等等的意见。这一层，秋白同志自己也承认，……可是，我又觉得鲁迅先生却也并不以他在跟我闲谈时表示的意见，是秋白同志的杂文以及一般杂文的缺点，因为他更着重文字的明白畅晓；他就曾经几次谈到秋白同志这一方面的优点，说道：‘何苦（瞿秋白的别名之一——引者按）的文章，明白畅晓，是真可佩服的！’”^①鲁迅的这一段评论很值得注意。他以密友的坦率，要言不烦地说出了自己与瞿秋白杂文的不同（深刻、含蓄，实际上是鲁迅的自我评论）。对这一评论，瞿秋白也是首肯的，他还由衷地赞叹过：

“鲁迅看问题实在深刻”^②。显然，鲁迅和瞿秋白杂文的高下深浅，是这两位亲密战友自己早有定评的。同时很清楚，作为一种风格，鲁迅又对瞿秋白的明白晓畅表示肯定，并没有作绝对化的判断。在他看来，明白晓畅会带来“一览无余”的缺点，但有时候，又未始不是一种优点，值得赞赏。鲁迅以前也曾说过：“其实畅达也有畅达的好处，正不必故意减缩（但繁冗则自应删削）。例如玄同

^① 《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8月版，第130页。

^② 《回忆鲁迅》，第134页。

(即钱玄同——引者)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我的东西却常招误解,有时竟大出于意料之外,可见意在简炼,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①。因此,我们现在分析瞿秋白杂文时,没有必要回避鲁迅的这一段评论,没有必要回避瞿秋白与鲁迅杂文的相异之处。

而我们过去的不少评论者,却常常是回避了的。他们由于看到瞿秋白和鲁迅的杂文曾在一起完成过极为迫切的战斗任务,又出于对革命先烈的推崇,总将两人的杂文相提并论,或称颂是“两个难以逾越的高峰”,或并誉为“双璧”,或认为在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可以互相媲美”,“都是匕首和投枪”。在具体分析时,也将两者混同起来,几乎令人觉得可以相互替代。实际上,这种只论其同,不辨其异的评论,未必能够符合评论者们的愿望,相反,倒恰恰会取消了瞿秋白杂文独立存在的价值,因为他们抹煞了瞿秋白杂文风格上的独特性。

鲁迅和瞿秋白杂文的相异之处究竟表现在那里,这只要对照着读一、二篇文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战争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借口什么“长期抵抗”、“心理抵抗”,继续实行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罪恶政策。对此,鲁迅和瞿秋白写了不少杂文予以抨击。其中,鲁迅的《航空救国三愿》和瞿秋白的《拉块司令》,背景、主题和矛头所向都非常类似,但他们的揭露方法和语言表达,却大不相同。

在《航空救国三愿》中,鲁迅先从“一·二八”后各色的人们大喊“救国”的现象说起,如银行家说储蓄救国,卖稿子的说文学救国,画画儿的说艺术救国,爱跳舞的说寓爱国于娱乐之中,

^① 《两地书·一二(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四日)》,《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页。

烟草公司还说，吸吸马占山牌香烟，也是救国之一道，等等，然后说到其中最别致的，是“航空救国”。接下去，他集中在“航空救国”上，说这原已实行过：一是“一·二八”时上海报上曾经说苏州有一队飞机要来上海打仗，但后来据说中途“迷失”了。二是当时广州也有一队飞机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象至今还没有到。”于是，作者陈明两个愿望：一，路要认清；二，飞得快些。这些，鲁迅都是用幽默的语调，具体生动地说出来的，给读者以滑稽有趣之感，甚至有的读者还以为他是在讲笑话呢。而不料最后，文章异峰突起，这样写道：

还有更要紧的一层，是我们正由“不抵抗”以至“长期抵抗”而入于“心理抵抗”的时候，实际上恐怕一时未必和外国打仗，那时战士技痒了，而又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知道会不会炸弹倒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来的？

所以还得战战兢兢的陈明一种愿望，是——
三，莫杀人民！^①

这篇文章，大半是形象地叙述和描写许多具体的事实，有的似乎还近于琐屑。人们平时对这些是见怪不怪的，现在一经鲁迅写出，就显得可笑，起了暴露的作用，也引起了读者的兴趣。鲁迅的杂文，大多是这样从有力而有趣的事实出发立论，靠许多有力而有趣的事实说话，十分讲究具体性和生动性。那许多事实，是根据既定的目的，循着一定的逻辑线索，连缀起来的。文章一

^① 见《伪自由书》，《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

开始不说出本意，而以较长的篇幅，铺排事实，闲闲道来，自然而然地引出两个“愿望”，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借口，堵住了他们的嘴巴，使敌人没有退路，然后用极精粹的文字，出其不意地揭出要害，置之死地。因此，文章的叙述和描写的过程，同时就是议论的过程；他的叙述的方法，同时也就是揭露的方法。这就是鲁迅所擅长的“曲笔”的一种。这种“曲笔”，形成了特有的含蓄，使鲁迅杂文具有非同一般的深刻性：它不仅深刻揭露了事物的要害，而且细致入微地显示出具体事物的发展过程和特殊表现形式。这就使得鲁迅杂文的全部含义，要在读完文章之后，再咀嚼一番，才能真正领悟。在语言上，与这种揭露方法相适应，则多无明确的褒贬，而亦正亦反，亦庄亦谐，曲折多变，奇趣横生，时而引起我们的厌恶和嘲笑，时而激发我们的愤慨和仇恨。

自然，这篇文章也有简捷明快的地方。文章最后揭出要害的时候，“莫杀人民”四个字，如嘻笑之后的一声怒骂，如潜伏已久的愤火的喷发，一语中的，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不过结论上的这种明快，并不打破含蓄的美，只是使得一时尚未能领悟全部含义的读者，也能由此窥见它的主旨。

瞿秋白的文章则不同。《拉块司令》一开头就以“一·二八”战争时上海闸北出现的“江北司令部”为例，指出了汉奸的来源和阶级属性。他清清楚楚地说：“上海闸北地方，自从日本资本家的军队占领之后，招了一批江北人，替他们当汉奸。当然，一般的江北苦力和工人一定是不会去的，因为干这一类的把戏，先要有点儿流氓的线索和手段”，他语含讥刺地称这些应运而生的人物为“新英雄”。然后，笔锋一转，指出这些不过是“小汉奸”，还“太不老练”，最凶恶狡猾的汉奸还是“阿拉司令”，还是那些“大人物”，即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最后，他概括国民党反动派各种遮遮掩掩、自相矛盾的言论，一一列举道：他们说要长期

抵抗，然后又说并非不愿派兵来上海，实在是因为交通不便；他们说要“讨伐伪国”，然后又说派兵到山海关去那是表示不爱和平；他们说要恢复中俄邦交，然后又来否认；他们说要对外一致努力御侮，然后立即又说绥靖剿匪是肃清后方！^①从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真面目。

显然，瞿秋白也摆事实，但不象鲁迅那样具体描写，娓娓而谈。他不是具体的描述中表现自己的主张和爱憎，而是略加勾勒，急切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发出内心的斥责。他的揭露方法，是单刀直入，条分缕析，痛快淋漓的。当然，他旨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却先举出“江北司令部”作为衬托，行文也有婉曲之处，但比鲁迅，是直截了当得多了。这有“尖锐、明白”的优点，同时也产生一览无余，不耐咀嚼的欠缺。至于在揭露事物本质的深刻性上，更显得是逊鲁迅一筹了。最后，在语言格调上，瞿秋白虽不乏幽默感，但更突出的是明快直露，感情洋溢。如在说到国民党反动派无意抵御日寇而有意残杀人民时，这样写道：“一切动员的军队和运输的军火，都是去‘剿匪’的，并没有半个兵半颗子弹是真正用来‘御侮’的”，他们“不管民众的愤慨，不管战争的失败，而特别命令退兵……”这些文字，和《航空救国三愿》结尾中国国民党军队“未必和外国打仗”、“战士技痒”、“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会不会炸弹倒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来的”等等说法，意思颇为一致，风格上却是大异其趣的。

另外，我们将同样揭露蒋介石国民党假抗日真投降的《“有名无实”的反驳》^②（鲁迅）和《“不可多得之将才”》^③（瞿秋白）相比较，将同样批评动摇不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人的《论“第

① 《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313—314页。

② 见《伪自由书》，《鲁迅全集》第5卷。

③ 见《瞿秋白文集》第2卷。

三种人”》^①和《红萝卜》相比较，都可以发现上述那种区别。即使拿风格基本相同的著名的《“友邦惊诧”论》^②和瞿秋白的《流氓尼德》^③来比照着读一读，也会看到鲁迅的明白晓畅，仍不同于瞿秋白的明白晓畅。《“友邦惊诧”论》针对国民党南京政府血腥镇压要求抗日的爱国学生，却发出电文反诬学生请愿破坏社会秩序，惊呼“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一事，给予迎头痛击。鲁迅怀着强烈的愤慨，指出学生请愿的原因，是因为对国民党政府一再卖国忍无可忍；用具体事实，驳斥“友邦惊诧”、“国将不国”的谬论；以关于学生死伤的确数和国民党要员并未受伤的报道，揭穿所谓学生“破坏社会秩序”的谎言。从而使国民党反动派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行径，和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阴谋，以及这主奴之间的勾结，暴露无遗。整篇文章，气势磅礴，很少曲折；大声疾呼，明白如话。但是它在批判方法上，仍是小处着眼，仍是运用具体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来展开全文，在语言上，仍然是显隐扶微，简洁传神。瞿秋白的《流氓尼德》，也明快地揭露国民党政府口称“救国”而镇压爱国人民、恭请“国联”瓜分中国的“流氓把戏”。然而，《流氓尼德》并不专注一事，而洋洋洒洒，从外国资本主义一手拿算盘、一手拿宝剑的海盗式的掠夺谈起，揭到现代帝国主义的本质，揭到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他们的主奴关系及其特有的流氓性，并历数其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种种表现。在这样阐明历史渊源和阶级本性的基础上，才声讨当前国民党反动派对外不抵抗对内杀人民的罪行。可见，两篇文章同是明白晓畅，仍旧判然有别：一是针锋相对，剔肌析骨，细微传神，讽刺挖苦；一是正面阐述，大处落墨，以论

① 见《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见《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

③ 见《瞿秋白文集》第2卷。

带“史”，有言必尽。

由上观之，我们确可以说，鲁迅的杂文，是匕首和投枪，因为它们锋利无比地刺向敌人的心窝，深入事物的底蕴。而瞿秋白的杂文与其说是匕首和投枪，还不如说是照见魔怪的明镜，因为它的主要功效在于清晰显现了敌人的面目。这就是瞿秋白杂文与鲁迅杂文的一个重要区别。而其间是有深浅之分的。

瞿秋白还有许多杂文，则是鼓舞群众前进的战鼓。那就是他的歌颂性杂文。歌颂性杂文，在鲁迅那里，所占的比例却很小。在瞿秋白后期写作杂文时间里，即从一九三一年八月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鲁迅写有二百多篇杂文，绝大部分是揭露性的，很难找到直接歌颂革命力量的篇章。仅有《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及《祝中俄文字之交》^①，是根据书籍文献，赞美十月革命和当时社会主义的苏联的。鲁迅比较专注于暴露。当然，他在一九三四年以后，还有《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②和《“题未定”草（九）》^③等，深刻指出古今都有为国家为民族前仆后继地战斗的人，都有明黑白，辨是非，坚持真理的人，他们是黑暗世界里不绝的火种。不过他的歌颂，都立足于暴露，是为了加强批判的火力而写的。因此他的歌颂，还是比较含蓄，曲折。而瞿秋白在上述期间写了六十多篇杂文，其中直接、正面歌颂党和红军以及革命工农群众的，就有六篇，占了全数的十分之一。他显然时时想擂响鼓舞群众前进的战鼓，吹奏振奋人心的号角。这类文章，更具有他那种明白晓畅的风格。例如他的《“匪徒”》，可说是一篇“红军颂”，它明白无误地颂扬“为着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而打仗的“拿着了武器的工农”：“他们虽然用着最旧式的武器，甚至于没有武器，他们虽然

① 见《南腔北调集》。

② 见《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冻着饿着，他们虽然‘没有教育’——然而他们学会了新兴阶级的战斗的精神，他们学会了组织和团结，有规划的整顿自己的队伍，有系统的进行自己的战斗”^①。他的《反财神》，更以高亢的音调，发出对于革命力量的赞美和对于革命前途的呼唤：“地底下放射出来的光明，暂时虽然还很微弱，然而它的来源是没有穷尽的，它的将来是要完全改变地面上的景象的。这种光芒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②另外，还有一篇《沉默》，则是以歌颂为主的歌颂和暴露的统一。文中歌颂革命力量的态度之明朗，感情之热烈，在当时很为罕见。

《沉默》从反动统治者“故意淹没”人民的反抗呼声、制造“沉默”的假象入手，暴露敌人的虚弱，并借以说明人民力量的强大和不可战胜，表现出革命乐观主义的豪情壮志。文章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消息的做法只略加讽刺性的评点，很快完成揭露的任务，而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到敌人故意制造的“沉默”的背后，那就是实际上并未沉默的人民。这时，文章的笔调也发生变化，慷慨激昂地写道：

那些吼着的反抗的声音，虽然已经震动着山谷，然而绅商只要还有一分的力量，他们也必定竭力去淹没的。至于对付将要吼起来的声音，那就有一切种种的武器，可以用来堵住民众的嘴和鼻子，割断那些会吼的喉管。于是乎对人说：这些小百姓沉默了！

但是，总有那一天——这些不中听的声音终究要淹没不住的。^③

① 《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322页。

② 《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305页。

③ 《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287页。

这里，写敌人扼杀、镇压人民的卑劣形相和气急败坏的丑态，是为着反衬人民力量的强大；那人民的反抗声音，是“怒吼”，是“已经震动着山谷”，“终究要淹没不住”。寥寥几笔，有千钧之力，令人奋发，令人神旺。作者的必胜信念和对敌人的极端蔑视溢于言表，和人民的反抗呼声一样，是气壮山河的。文章最后，瞿秋白又进一步归结了“沉默”的深长意义，预示了革命的胜利景象，说：这种“沉默”，是“暴风雨之前”的“静止”，“这种静止和沉默之后，跟着就要有真正震动世界的霹雳！”^①

在这些歌颂性杂文里，那种明朗、热烈的态度，激越、高亢的音调，完全是瞿秋白式的。它象插响的战鼓那样，激起被压迫人民对于战斗的渴望，对于胜利的信心。而这在鲁迅那里很难见到。这是瞿秋白杂文与鲁迅杂文的又一区别。

本文开头，我们曾经将瞿秋白的杂文喻为清澄明澈的池水，湍急奔泻的山涧，这主要就是与鲁迅杂文相比较而得来的感受。鲁迅的杂文，如果也从自然界取譬，则象高山大海。这座高山，真是危乎高哉，但并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悬崖峭壁，也不是怪石嶙峋的荒山野岭。它乔木参天，奇葩遍地，幽林碧草，处处胜境。我们在攀登途中，只感到目不暇接，采撷无从，每到一处，都不愿遽然离去，而深深感叹于它的丰富。所以有时候，我们又会联想起汪洋浩瀚的大海。因为它有大海般的博大，深沉，雄浑，不可穷尽。这就是瞿秋白与鲁迅杂文总体上的不同。这之间无疑有高下深浅之分，但同时也各有所长。

瞿秋白和鲁迅杂文的战斗风格之所以相异，归根结蒂，是因为他们创作个性的不同。笔者在《瞿秋白散文的创作个性》一文中已经说过，创作个性，首先根植于对社会生活的一定看法。但是，

^① 《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288页。

创作个性又并不就是一般的社会观、世界观的反映。在某种一定的世界观如共产主义世界观之下，不同的人由于经历不同，素养不同，环境不同，其具体见解还是千差万别的，更不必说他们的心理特点、习惯爱好，以及观察事物的方法等等方面的差异了。鲁迅比瞿秋白要年长十八岁。鲁迅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比较晚，思想上经历了比较曲折的道路。但他是总结了无数历史教训和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而接受的，他的社会阅历更深，斗争经验更多。瞿秋白曾经指出，象鲁迅这样一辈的革命知识分子，保持着“黎明期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也可以说是老实的农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①，其中鲁迅尤其是这样。此外，鲁迅对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化也有精深的研究。凡此种种，都使鲁迅观察透辟，分析细密，感情深沉；热烈包藏在冷峻之中，含而不露。另一方面，他和瞿秋白相比，较少从事实政治斗争，他主要战斗在文学战线上，更多文学家的气质。他自谦“不在革命的漩涡中心”^②，“不大懂政治”^③，是很有几分真实的。了解鲁迅的这种个性，就能解释他的杂文的许多特点。譬如鲁迅的特别注重事实，就首先与他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特别强盛有关，而不能仅仅归结为一种写作手法。当然，写作手法，也是构成作家创作个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创作个性是作家的独特的社会见解、生活态度、兴味习惯等等和对社会生活的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的统一。鲁迅在杂文中运用的艺术表现形式，既和他作为实际生活中的人的个性相关，又是他在一九一八年以来长期的杂文写作实践中形成的，是他在平素的文学修养如对魏晋文章的爱好中形成的。例如关于他的“曲

①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2月版，第995页。

② 鲁迅：《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③ 冯雪峰：《回忆鲁迅》，第163页。

笔”，人们往往只说是险恶的环境使然，其实，除此以外，更重要的是为他的创作个性所决定，想改也不易。据冯雪峰回忆，鲁迅曾“几次谈到他在文字上以后将尽可能避免用‘曲笔’。这是他过去也说过，但这时我觉得他更注意到这一层”^①。可是我们看到，此后鲁迅的“曲笔”并没有显著改变，并没有消失。

同样，瞿秋白的创作个性也是无法轻易改变的。瞿秋白首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他虽然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爱好，但就杂文写作而言，在一九二三年写了几篇后，一搁笔就是八年，当他一九三一年回到文学岗位时，已感到“田园将芜”^②了。而且他生性敏于感受，急于倾吐。再加上他直到那些年头也不过三十二、三岁，阅历之深，不及鲁迅。至于他常常忍不住要正面歌颂革命力量，那是与他长期从事党的政治领导工作，对他们更有亲切之感的缘故。除了这些社会经历上的因素以外，瞿秋白在他过去的文学活动中，也形成了他固有的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俄罗斯作家们惯有的紧张、严肃的思索，高尔基散文的战斗的、诗意的抒情，都曾影响过他，并在他早期散文中表露出来。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就使他的杂文较少含蓄，缺乏历史的深度，而富于鼓动性和号召力，好作理论分析而较少解剖具体事实，语言风格则峻急明快并且热情奔放。鲁迅曾说，“弄政治宣传，我到底是不行的，但写点杂文，我比较顺手”^③；相反，瞿秋白写杂文，恰恰带有他过去曾大量撰写过的政治论文的格调。总之，经历（包括文学活动的经历）不同，创作个性不同，文章的许多方面也就不会相同，即使在写同类的杂文时也是一样。

① 《回忆鲁迅》第185页。

② 丁玲：《我对〈多余的话〉的理解》，1980年3月21日《光明日报》。

③ 冯雪峰：《党给鲁迅以力量》，《论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248页。

如果对此还有疑问，那么不妨再揣摩一下瞿秋白模仿鲁迅笔法写的那十二篇杂文^①。瞿秋白能够模仿，当然说明他们的创作个性有相近的地方，但真和鲁迅的作品比较，终还是可以看出来有“曲”“直”之分，深沉和明快之分，冷峻和热烈之分。就是具体而微的遣词造句习惯，也不能相强。这十二篇杂文，都是经过鲁迅修改的。其中有的只是为了说得更准确，不少却也表露了他们的不同个性特点，值得玩味。如《曲的解放》原文中有：“（旦^②抱丑介白）我的儿呀，你怎么心慌！你应当在前面多挡这末几挡，让我们好慢慢收拾”，鲁迅把最后一句改作“好让我们收拾收拾”；再如《出卖灵魂的秘诀》，原文中有：“胡博士（指胡适——引者）对症下药——预备日本帝国主义上条陈”，鲁迅将“日本帝国主义”改成“日本朋友”；又如《真假董吉诃德》，原文中有“清末的复兴海军捐变成了颐和园，……现在这套把戏实在太欠新鲜，谁不知道”，鲁迅把后一句删去。还有，《人才易得》一文，鲁迅改题为《大观园的人才》，使其寓有国民党政府如同戏台之意，又删去原文中“是美人儿^③多年阅历的结果，练出了这一套拿手好戏？”中的“练出了……”这后半句；最后，他还以原文的“老旦进场，玩笑旦出场，大观园的人才着实不少！”一句为结尾，而删掉了原来结尾的“呜呼，以天下与人虽然大不易，而为天下得人，却似乎不难”的那一段。鲁迅作这些改动，大约是希望少“露”一点，多一点幽默感，尽可能接近自己的调子、风格吧。这反过来，也说明瞿秋白自己的创作个性，难以掩盖，他努力要模仿鲁迅说话，却处处免不了要发出自己特有的声音来。

辨析了瞿秋白和鲁迅杂文的异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瞿

① 均见《瞿秋白文集》第2卷。

② 指汪精卫之流的汉奸。

③ 指当时奉行不抵抗主义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

秋白杂文明白晓畅的风格特点,并且可以启示今天的作者,在博采众长的同时,去努力找出自己,发展自己,根据自己的创作个性,以培育出与众不同的艳丽花朵,丰富新文学的园地。

瞿秋白文艺思想再评价

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勃兴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个运动，在三十年代初期，成了粉碎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主力。因此，鲁迅曾自豪地把传播马克思文艺理论的工作，比作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窃得火来，照亮人间，比作造反的战士从国外运进军火，武装奴隶。在这个窃取天火、偷运军火的行列里，鲁迅本人，和他的亲密战友瞿秋白，正是最杰出的代表。瞿秋白直接地、比较系统地翻译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艺论著，并且译笔明畅，阐述详尽，无疑是提供了最锐利的武器。与此同时，他也和鲁迅一起，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具体的、科学的文艺批评，给予了革命文学以实际的指导。由于他的这种理论和实践活动，因而他后来被公认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开拓者之一，深受赞誉。

窃火者首先照亮了自己，造反者首先武装了自己。瞿秋白的文艺思想，就是在率先战斗的过程中，相当稳固地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形成起来的。

当然，肯定瞿秋白文艺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并不是说它是尽善尽美的，也不是说形成了博大、完整的体系。他的文论存在着一些弱点，有的地方显得比较简单粗疏，或带有片面性。这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有了很大发展的今天，已不难觉察。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开拓者。任何人都不能不受历史的局限。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三十年代初期还处于相当幼稚的阶段，那时常见的弱点不可能不在他的文论中反映出来。“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回避或者看不到这一点，一概加以推崇，这种偏向应当改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近年来，又产生了另一种偏向，即忽视了瞿秋白文艺思想的核心和灵魂，低估了它的历史作用和至今尚存的现实意义。这是更需要加以辨正的。其中，有的同志在总体上对瞿秋白文艺思想的正确性和价值，发生怀疑，过多否定，是因为联系到他曾在政治上陷入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但实际上，瞿秋白的文艺思想是在三十年代初期才形成的。而这个时期，如笔者在《瞿秋白的思想发展及其特点》一文所述，他的“左”倾的思想观点已经基本克服，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策略思想已大为提高。一九三〇年，他主持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立三路线；一九三一年，他因为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而遭受错误的打击，他正是因此而重返文学岗位，进行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的。一个人的政治思想确实与文艺思想相联系。而在三十年代的瞿秋白身上，这种联系恰恰只能有助于他的文艺思想趋向正确的方向。因此，不应当否定瞿秋白文艺思想的基本方面。

上述两种偏向的存在，就产生了重新评价瞿秋白文艺思想的必要。

那么，瞿秋白文艺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核心是什么呢？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为经济基础所决定，它反映社会生活，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生活，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是瞿秋白文论的基础。他由此出发，论述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人民的关系，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文艺理论的重要问

题；并在论述中显示出了这些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这些内容，规定了瞿秋白文艺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性质，而且比之于其他左翼理论家，还有着相当严整的系统性。同时，瞿秋白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又刚刚来自革命漩涡的中心，刚刚还在从事党的实际政治活动，因而有着特别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战斗的紧迫感。他是高度自觉地以无产阶级战士的态度和目标来对待文学事业的。这就使他的文论，始终侧重于对革命文学的性质、任务的探讨。革命文学应当服从革命的需要，用作阶级斗争的利器，为人民解放事业服务，成了他全部文论的核心和灵魂。它没有脱离唯物主义基础，而统制着、照耀着瞿秋白的一切具体论述。这是瞿秋白文论最明显的特点，即使在今天也有其价值。当然，今天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革命任务已经改变，社会生活给革命作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人民向文学提出了更多样的精神需求，研究者们也更注重文学的内部规律的探讨。但是，文学是上层建筑这一点是没有改变的。社会主义的文学总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要反映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们的思想感情，要培养读者共产主义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能力，要帮助他们消除和摆脱剥削阶级残余思想的影响和一切陈腐落后的精神锁链的束缚。在这个总目标上，社会主义文艺仍然与过去的革命文学存在着一致性，仍然是朝着无产阶级革命目标前进的。因此，瞿秋白的一些基本文艺观点，还没有过时，还值得进行认真的研究。

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三十年代初期是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时期。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疯狂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使

现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笼罩着整个社会。人民则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殊死的斗争，渴望推翻他们的罪恶统治。这就是当时最大的政治。“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①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是活生生的现实。因此，瞿秋白论述中的“政治”的含义，就是阶级斗争；他所论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就是文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他的主要论点，就是文学可以用作阶级斗争的工具，革命文学应当成为革命斗争的利器。

这种看法，在一般意义上来说，是左翼作家们共同的想法。鲁迅就一再说，左翼作家和一切进步作家，与人民大众遭受着同样的压迫和摧残，“和革命共同着生命”^②，“作一样的战斗”^③。他还说：“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④。这段话虽然主要是说明他为什么要写作杂文，实际上，也表达了左翼作家共同的使命感。他们激于三十年代严酷的阶级斗争情势，都要求将文学与革命最密切地结合起来。

这种使命感和紧迫感，在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时候，已经产生。随后，梁实秋宣扬超阶级的人性论，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使他们这种感受更加强烈。到了左联初期，左翼作家们就几乎一致强调文学在阶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7页。

②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0页。

③ 《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全集》第4卷，第283页。

④ 《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级斗争中的作用，一致主张革命文学应当成为革命斗争的工具和武器。左联执委会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五日通过的《告无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中，甚至将作家的笔，同工人们红军们真正的武器相提并论，它号召说：我们的“斗争不但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一切派别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阀党国的压迫和剥削，还要反对这些家伙对于民众的思想影响”，“无产阶级作家和革命作家，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你们的笔锋，应当同着工人的盒子炮和红军的梭标枪炮，奋勇的前进！”鲁迅虽然在具体认识文艺的武器作用的问题上，同创造社、太阳社有过分歧和争论，在左联成立以前曾指出他们有简单化的“招牌”口号式的弊病，认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而不要“忙于挂招牌”。但他也确认：文艺可以“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①在左联成立以后，他一方面反对左联初期忽视文学特性，反对“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的忽略创作的倾向，但同时又明确指出：“那病根并不在‘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强调“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②。他还举出高尔基，说高尔基是“用了别一种兵器”，“他的武器”就是“艺术的言语”^③。并且希望小资产阶级青年作家成为“战斗的无产者”，因为“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④。他自己在这时期的创作，不仅把旨在“为现在抗争”的杂文作为主要体裁，而且“怒向刀丛觅小诗”^⑤，立志以笔来对付敌人的手枪。可见，在主张革命文学可以用作革命斗争的武器这一基本观点上，鲁迅并不例外，在他看来，

① 《三闲集·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第4卷，第84页。

②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第207页、208页。

③ 《集外集拾遗·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第395页。

④ 《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67页。

⑤ 《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全集》第4卷，第487页。

强调文艺的武器作用，与肯定文艺的特性和艺术价值并不矛盾。

三十年代初期社会上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存在，和左翼作家共同的战斗意向，就是瞿秋白的“工具”论的现实基础。

不过，对于文学为什么可以用作阶级斗争的武器，鲁迅并没有作系统的论述。这个主张在理论上究竟是否正确，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所以到了一九三二年，“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种人”苏汶提出了种种责难。瞿秋白重返文学岗位不久，正值胡秋原、苏汶提出驳难之时。瞿秋白首先起来应战，写了《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这篇文章，鲁迅很推崇，他说：“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①在这篇文章里，如下一段话，就比较完整地解释了文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文学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为“工具”论提供了理论依据。文章说：

一切阶级的文艺却不但反映着生活，并且还在影响着生活；文艺现象是和一切社会现象联系着的，它虽然是所谓意识形态的表现，是上层建筑之中最高的一层，它虽然不能够决定社会制度的变更，它虽然结算起来始终也是被生产力的状态和阶级关系所规定的，——可是，艺术能够回转去影响社会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之内促进或者阻碍阶级斗争的发展，稍微变动这种斗争的形势，加强或者削弱某一阶级的力量。^②

瞿秋白在这里指出，文艺是上层建筑，反映着经济基础和整个社会生活，与一切社会现象相联系；它又必然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生

^① 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131页。

^② 《瞿秋白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2月版，第954—955页。

活。而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特别是在当时，阶级斗争波及非常广泛的范围，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而他在“艺术能够回转去影响社会生活”之后，紧接着说它会“促进或者阻碍阶级斗争的发展”。同时，由于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并为经济基础所决定，所以文艺的这种政治功能，有一定的限度，“不能够决定社会制度的变更”，而是在“相当的程度之内”影响阶级斗争的发展，稍微变动阶级斗争的形势。即如鲁迅所说过的，并无扭转乾坤的方量。显然，瞿秋白关于文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的解释，是以文学反映经济基础、反映社会生活为前提的，是符合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的。

另一方面，又十分清楚，瞿秋白虽然没有夸大文艺影响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文艺具有这种政治功能，却正是他最注重的地方。所以，他在本文及其他许多场合，都着重阐述文艺的政治功能，说明文艺的阶级性，指出文艺可以作为革命斗争的工具。他阐述说，历来的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就是常常以文艺作为“奴隶教育的一种工具”^①，只不过它并不公开承认；其他阶级的不少作家，也通过文艺来宣扬本阶级的思想感情，只不过有的是“有意的”，有的是“无意的”^②。既然文艺从来就有影响阶级斗争的功能，既然别的阶级都在利用，那么，新兴的无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可以用它来为自己的革命事业服务，当作革命斗争的工具和武器。并且，无产阶级还是最富于革命性的阶级，是自觉地“为着解放劳动者的广大群众而斗争”的阶级，因而它更应当自觉地利用。瞿秋白明确地指出：“新兴阶级要革命，——同时也就

① 《“我们”是谁？》，《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278页。

② 《非政治主义》，《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0月版，第397页。

用文艺来帮助革命”，“要用文艺来做改造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武器”^①，这就是瞿秋白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基本观点。

瞿秋白的这个基本观点，不仅有其现实基础和正确的理论依据，而且是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思考过程的。早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瞿秋白与耿济之等一起，就十分重视并且着手研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学，指出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有着积极的认识作用和改革社会的功能。他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的序言中说，当时俄罗斯文学的研究之所以极一时之盛，是因为由此可以了解俄国社会，了解十月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社会原因，以从中得到启示。他说：“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这证明文学和文学家，是“社会的反映”，“社会的喉舌”。然后，他一方面指出“断不敢说，模仿着去制造新文学就可以达到我们改革社会的目的”，另一方面，又认为“俄国的国情，很有与中国相似的地方”，所以还是应当介绍来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借鉴，以利于对中国社会的改造。^②他在论到具体的俄国作家作品时，也持这样的观点。如写于同年的《仆御室》译者志中，他赞赏果戈理的作品“能现出下流社会（指下层社会——引者）的真相”，认为这种写实派的文学能“以文学的艺术的方法变更人生观，打破社会习惯”，“现在中国实在很需要这一种文学。”^③反之，中国的一些旧文学，如香奁体诗词，是宣扬男女不平等观念的、在精神上束缚妇女的“利器”。新文学家有责任“创造新的美术的生活”，来为“妇女解放”服

① 《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961页。

② 《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543—544页。《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中的作品，系与耿济之合译。

③ 《瞿秋白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1月版，第1304—1305页。

务。^①与此同时，瞿秋白就怀着帮助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参与了文学研究会的创建，^②并进行新诗和散文的创作。而对于自己以前所作的排遣个人忧闷的旧体诗词，已“视如敝屣”^③了。

一九二四年，瞿秋白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更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文艺产生的社会原因、文艺的阶级性和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他在用作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讲稿的《社会科学概论》第九章《艺术》中，说：“一切社会的心理，都是经济发展之结果，然而既已形成之后，又做经济发展之助缘，艺术亦是如此”。在原始社会，“它们产生于生产过程并随之发展，反之使共同劳动的人群互相适合”；到了阶级社会，封建统治者曾将戏剧文艺与它的“屠杀功绩相结合”，资产阶级则“自觉其身份，而且进而求颠覆贵族”。^④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上，他也开始注重文艺的阶级性，指出当时“文艺上的一切‘贫民同情’派实际上仍不失其为资产阶级的‘诗境’，不过站在上流社会的观点上说句公平话罢了”^⑤。他对

① 《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1920年1月《新社会》旬刊第7号。

② 关于瞿秋白参与发起文学研究会的回忆很多。如：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1949年7月18日《文汇报》）中说：“我们组织了一个研究文学的团体，名为‘文学研究会’，我们五个人（引者按：该文所说另三人为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都是发起人。”胡愈之《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模范》（1949年6月《光明日报》）中也说到他在郑振铎家中和瞿秋白见过面，“主要是商谈文学研究会的事情”。后冯雪峰《回忆鲁迅》明确说：“他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鲁迅先生也当然知道的。”（见该书第129页）最近，耿济之《耿济之的青少年时代》（1982年8月《新文学史料》第3期）一文，也提到瞿秋白与耿济之等组织了“文学研究会”，常与郑振铎、许地山、瞿世英、王统照等到他们家开会。此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的作家小传里，也说瞿秋白是“文学研究会的干部”。

③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0月版，第15页。

④ 《社会科学概论》，上海书店1924年10月版，第67页。

⑤ 《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550—551页。

自己过去曾赞同的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主张已感到空泛，不能满足，进而要求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进行创作和评论。同年，他主编《新青年》季刊时，在该刊创刊号发表了署名“工人某”的一首歌谣：“军阀手中铁，工人颈上血；颈可断，肢可裂，奋斗精神不可灭！劳苦群众们，快起来团结！”不久还撰文肯定“劳工的诗人”，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受尽了各方面的压迫”，他们并不如一些诗人所认为的“哪里谈得起文化”，“‘颈可断，肢可裂’，——又何尝不是诗呢？”^①这首早期革命文学的宝贵作品，由于《新青年》季刊的刊登，后来以《颈上血》为题载入了史册。这首诗，在那时，宣传了“二七”惨案中工人群众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的确“帮助”了革命，起了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作用。

总之，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在阶级社会里，文学一定会反映出阶级斗争的内容，具有阶级性；因此，文学必然要对阶级斗争发生影响，可以用作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就是瞿秋白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基本观点。这个基本观点，在实践上是三十年代初期社会上、文坛上阶级斗争的产物，符合众多革命作家的意向；在理论上，符合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并且，是经过他一个长时期的思考过程的，是他自五四以来的一贯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所以这个观点，应当说具有基本的合理性。

但是，瞿秋白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当强调文艺的阶级性的时候，曾有简单化的表述，容易招致人们的误解。他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中有这样一段话：“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问题是在于做那一个阶级的‘留声机’。

^① 《荒漠里》，原载1924年《新青年》季刊第2期，又见《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0月版，第233页。

并且做得巧妙不巧妙。”^① 这里，“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的说法，使人觉得好象政治是文艺的本原，决定着文艺的内容和发展，好象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而且由于这个说法运用了形象的比喻，给人印象很深。因此，近年来有同志据此而认为瞿秋白陷入了唯心论，提出了责难。

确实，“留声机”的说法，本来带有唯心论的色彩。这个说法，最早见于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期间郭沫若的文章。这年一月，郭沫若在《英雄树》中提出：作家应当“当一个留声机”^②。不久，他又发表《留声机的迴音——文学青年应取的态度之考察》，具体解释如何当一个留声机，那就是要“当 Marx Engels（马克思、恩格斯——引者）的留声机”。要去“接近那种声音”，“摄取他们的精神”。他还认为这种说法是“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因为“留声机的声音是从客观来的”，意即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他以此来否定自己一九二三年《文艺论集》中关于“赤子的简单的一啼一号都是他自己的心声，不是如象留声机一样替别人唱高调”的主张^③。实际上，郭沫若虽然否定了原来的崇尚自我表现的唯心论倾向，却走向了另一种唯心论观点，他不把文艺看作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而视为是对阶级意识甚至政治学识的宣传，将同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当作了文艺表现的对象。这种认为文艺的本质不是反映生活而是宣传思想的观点，在革命文学倡导期间是普遍存在的。现在瞿秋白沿用了“留声机”的比喻，就好象也是一个唯心论者了。

我们应当承认这是瞿秋白的失误，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判断说他是唯心论者。我们可以说瞿秋白是“工具”论者，却不能说他

① 《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963页。

② 1928年1月《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

③ 1928年3月《文化批判》第3号。

是“从属”论者。联系他的基本出发点和全部论述，可以看到他是在反映生活的前提下来打这个比喻的。他的“文艺是政治的留声机”这句话，并不等同于郭沫若所说的作家要当马克思恩格斯的留声机。瞿秋白并不认为文艺是一种思想意识的传声筒，而认为是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生活的反映。文艺在反映社会阶级斗争现实的时候，必然表现出某一阶级的思想，必然具有阶级性；对于作家来说也一样，他总是本阶级的忠实代言人。简言之，他的“文艺是政治留声机”的说法，本意在于强调，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性是作家和文学作品的固有属性。这个说法有简单化的弊病，它会引起误解，却没有真正陷入唯心论的错误。

为了进一步说明瞿秋白的“留声机”说的精神实质，还需要了解它在当时的具体针对性，弄清它的对立论点。瞿秋白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是针对胡秋原、苏汶的文艺自由论而作的，尤其是针对着胡秋原的《阿狗文艺论》的。胡秋原在《阿狗文艺论》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文艺观。胡秋原首先提出，文艺的目的是表现生活，为了人生；接着说，“急进的社会主义者与极端反动主义者都要求功利的艺术”，例如“苏俄的无产者文学与意大利棒喝主义文学”（后者与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相似），不是反映生活，为了人生，算不得文学。然后他归结说：“文学的最高目的，即在消灭人类间的一切阶级隔阂”，也就是说文学应当体现超阶级的“人道主义”，“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在作这一归结时，他显然针对着左翼文坛，激烈声称：“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也决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艺术虽然不是神圣，然而也决不是叭儿狗。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姦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的不可恕的冒渎。”^①瞿秋白的文章中，语气强烈地肯定“文

^①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现代书局1933年3月版，第5—7页。

艺是政治的留声机”，正是对他最后一段话的直接反击。

胡秋原的观点对不对呢？他一开始提出艺术的目的是反映生活，已包含着错误，“为了人生”，也很空洞，不过还是从反映论出发的。然而在推论中，在涉及“生活”、“人生”的具体内容时，他明显地从反映论滑向了超阶级的人性论，滑向了历史唯心论。他将具有阶级内容的东西，一概排除在生活、人生之外，将无产阶级文学与反动阶级文艺相提并论，同斥为“堕落”，从而主张文艺只能体现超阶级的所谓“消除阶级隔阂”的“人道主义”，这就是完全错误的了。胡秋原最后激烈表示反对文艺作政治的留声机，也就是断然反对阶级文艺的意思。后来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提出“文学是个纯洁的处女”^①，也表示了类似的想法。瞿秋白的文章，开头与胡秋原的阐述有相同之处，也主张文艺是生活的反映；他之强调文艺是政治的留声机，不是否定这个原理，而完全是为了批判胡秋原、苏汶对文艺阶级性的否定。就因为这个缘故，瞿秋白在下文，着重地反复地论述了文学和作家必然具有阶级性的道理。他说：“文学并不是卖淫妇。文学是附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许多阶级各有各的文学，根本用不着你抢我夺。只是这些文学之间发展着剧烈的斗争；新兴的阶级，从前没有文学的，现在正在创造着自己的文学；而旧有的阶级，从前就有文学的，现在是在包围剿灭新兴阶级的文学。”他又说：“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②这两段话，就是对他的“留声机”说的含义的明确解释，是对胡秋原、苏汶的抽象人性论的更具体的批判。

① 《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文艺自由论辩集》，第73页。

② 《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965页、966页。

瞿秋白关于文学和作家的阶级性的论述，在今天看来，没有涉及阶级性的种种复杂表现，比较简单，比较绝对，但并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肯定意识形态和人的阶级性。同时，他的论述也符合新文学运动的实际状况。在那个阶级斗争异常尖锐激烈的时代，文学和作家的阶级性确实表现得比较明显。例如五四新文学，就是在与封建主义文学的对立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次论辩前不久才隐没的民族主义文学，更与左翼文艺运动壁垒分明。即使胡秋原、苏汶本人，虽然一个要当超阶级的“自由人”，一个幻想保持真正的中立而做“第三种人”，实际上他们的观点，还是分别表现出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小资产阶级害怕斗争的特性。他们并不是超阶级的作家，他们的文艺理论也不是超阶级的理论，这种理论正有害于当时需要斗争的无产阶级及其文学运动。因此瞿秋白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论断是基本正确的。而如前所述，这正是他认为文学可以作为阶级斗争工具这一主张的重要论据。

瞿秋白既以文艺反映生活的原理为前提，又以文学和作家的阶级性的正确判断为主要依据，因而他关于“工具”的主张应当说是合理的。

在瞿秋白文章发表之后，胡秋原对瞿秋白所说“用文学帮助革命”，做“改造群众宇宙观人生观的武器”，大加嘲笑，表示不可理解。他说：瞿秋白“大谈其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肯定‘文艺影响生活’”，却“因此要‘用文艺来帮助革命’，做‘改造群众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武器’。易嘉先生（瞿秋白的这篇文章署名易嘉——引者）的理论未免飞跃太快了。”^①显然，胡秋原也并非认为瞿秋白违背了反映论，他主要是否认“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否认“生活”中阶级斗争内容的客观存在，否认阶级性是文学和

^① 《浪费的论争》，《文艺自由论辩集》，第212页。

作家的固有属性，是从历史唯心主义观念出发来反对瞿秋白的主张的。这样，他恰恰从反面证明了瞿秋白主张的正确性。

瞿秋白和胡秋原、苏汶的理论之所以对立，更深的原因还在于阶级立场的不同。瞿秋白主张的正确，归根结蒂是他正确的阶级立场决定的。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一样，不能不受到作者的阶级立场的制约和影响。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时代都是如此。胡秋原、苏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使他们既厌恶法西斯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又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抱有反感。当后者兴盛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反感更日益强烈起来，极力地要否定文学在阶级斗争中的武器作用。而瞿秋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他的心目里，没有比人民解放斗争的利益更崇高的目标了。他的理论主张，自然就适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

以上我们说明了瞿秋白关于文艺可以当作阶级斗争工具这一主张的基本合理性。下面，再来看一看他关于文艺的武器作用如何发挥的论述。在这方面，瞿秋白说得不多。这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曾长期从事政治活动的革命家，对于文艺特性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也是因为是否承认文艺具有阶级性和武器作用，是那次论战的中心，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过，他决非文艺的门外汉，他的许多优美的、动人心弦的散文、诗、画，就是证明，因而他在论述文艺如何发挥武器作用时，还是注意到文艺的基本特点的，并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他指出，文艺作为武器，并非作用于阶级斗争的一切范围，而是用来“改造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对人的精神世界发生影响。也就是说，革命文艺的作用，在于改造群众，造就新人。

瞿秋白的这一看法，是对过去革命文学倡导者们的错误的纠正。过去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认为文艺的武器作用，在于“组织生活”。他们说，“最要紧的，在于如何应用文学的武器，组织大众的

意识和生活推进社会的潮流”^①；“文学的社会任务，在它的组织能力”，“文学，有它的组织机能”；^②甚至宣言文学“还要创造生活”^③。这种看法，显然受了苏联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关于“艺术是经验的组织”的观点的影响，而且作了更错误的引申。瞿秋白明确指出，“认为文艺可以组织社会生活，意识可以组织实质”，这是“唯心论的错误”^④。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只能对人的精神面貌发生影响；它的用“武”之地，并非阶级斗争的一切范围。基于这个基本看法，瞿秋白对革命文学提出了如下一些具体意见。

首先，文学不是宣传理论概念和政治学说的，而应当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形象描写和活生生的人物塑造，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人生理想，改变群众的心理和情绪。千百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就是“用奴才主义的内容放进平民艺术里去，帮助束缚平民”^⑤，它日积月累地，潜移默化地“束缚”群众的意识，“无形之中对于革命的阶级意识的生长，发生极顽固的抵抗力”^⑥。无产阶级的文学，则须反其道而行之，“深入群众的心理和情绪，企图改造他们的民族固有道德，摧残安分守己的人性”，^⑦“尤其要在情绪上去统一团结阶级斗争的队伍，在意识上在思想上，在所谓人生观上去武装群众”^⑧。胡秋原、苏汶硬说用文艺为武器，就

① 克辛：《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评茅盾君底〈从牯岭到东京〉》，1928年12月10日《创造月刊》第2卷第5期。

②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1928年2月15日《文化批判》第2号。

③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1928年《太阳》月刊3月号。

④ 《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955页。

⑤ 《乱弹（代序）》，《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254页。

⑥ 《大众文艺的问题》，《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885页。

⑦ 《学阀万岁！》，《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614页。

⑧ 《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864页。

是要让某种具体的“政见”去与“文艺结婚”^①，就是要作家“根据极精细的政治观点来决定创作的途径”^②。这是曲解。

其次，在题材问题上，瞿秋白也并不如苏汶所指摘，“只看目前的需要，是一种目前主义”^③。瞿秋白要求题材广泛，尤其要写长远意义的题材。他把革命文学作品的题材分做三类：为紧张斗争所急需的“鼓动作品”，反映一般阶级斗争的作品和“为着阶级制度底下的人生而写的作品”。他说明，第一种不能避免有“急就章”，“艺术上的价值也许较低”；第二种是描写工人、贫民、农民和士兵的生活，暴露反动阶级的丑恶和崩溃，其中包括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第三种作品，则为了使劳动群众“从无产阶级的观点去了解”“人生”，去“表现民众和私人生活的故事，恋爱的故事，宗法社会的牺牲，成家立业幻想的破产”等等，以克服“宗法主义和市侩主义”（即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引者）对他们的影响，这是瞿秋白最强调的作了最详细解释的一种。

在具体阐述上，瞿秋白更进一步表明了对改造劳动群众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视。他指出，配合一个短时期的阶级斗争的中心任务的作品是要写的，但重要的还是第二三种，尤其是第三种，即用无产阶级的观点表现人生。瞿秋白自从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一向反对抽象地谈论人生，反对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看作普遍的人性，反对那种把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来反映人生、解释人生的作品视为真正的文学的偏见；但长期以来，一些未有阶级觉悟的劳动者，正不自觉地用剥削阶级的眼光看待人生、理解人生。他曾多次指出这种状况的严重性。

① 胡秋原：《勿侵略文艺》，《文艺自由论辩集》，第11页。

② 苏汶：《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文艺自由论辩集》，第186页。

③ 《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文艺自由论辩集》，第67页。

现在，他更不无愤慨地说：“所谓‘人生’，难道只有‘高尚的’知识分子才了解？难道只能够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去了解？”^①无产阶级有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人生观，那是反动统治阶级和不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不了解的。因此，革命文学应当十分重视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反映广泛的生活领域，帮助劳动群众认识自己的处境，发现长期以来受到的蒙骗和麻醉，看到自己的人性美和潜在的革命力量，以使他们摆脱剥削阶级思想感情的影响，感奋起来，萌发革命的意志和理想，成为新人。

革命文学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改造群众，造就新人；而这种新人，将是推动革命事业前进的动力。文学作品就是通过他们去影响实际的阶级斗争的。这就是革命文学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作用所在，这就是瞿秋白的“工具论”的基本含义。

文学是人学，文学作品是生活的教科书。瞿秋白关于革命文学如何发挥武器作用的论述，符合文学的这个根本特征。注意到文学的这个特征，也才帮助瞿秋白在开头概括论述文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时，能恰当估计文艺作为武器的力量，而没有重陷革命文学倡导者们的“组织生活”、“创造生活”的错误。后来，苏汶却引录了瞿秋白的这段论述，讥讽说：“左翼文坛是在用尽平生之力只举起了一个空心的纸灯笼！”^②曲解文艺的武器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完全无用的，从而再一次否定文艺的武器作用的存在。对此，冯雪峰说得好：“这是不对的。文艺自然只能够或一程度（相当程度）地影响生活，影响现实，帮助生活的现实的变革。如此，已够是伟大的武器了。”^③

① 《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866页。

② 《“第三种人”的出路》，《文艺自由论辩集》，第116页。

③ 《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文艺自由论辩集》第278页。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普遍存在。历史在前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随着在发展。瞿秋白关于文学与阶级斗争关系的论述，有时好象已是历史的陈迹，使许多人感到隔膜。这是难免的。确实，瞿秋白的一些论点，尤其是关于“工具”的一些具体说法，已经不适用了。如果照搬，必将脱离今天的现实。但是，瞿秋白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根据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来进行论述的，他强调革命文学应当用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其精神实质乃在于要求文学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因为在当时，进行阶级斗争以推翻反动统治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最大的利益所在。今天推翻反动统治的任务已经完成，但为人民利益服务仍应该是社会主义文学至高无上的目标。瞿秋白关于文学和作家的阶级性的论述，更有比较长远的意义，因为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文学和作家还是具有阶级性的。如果忘记了社会主义文学的阶级性和崇高职责，将表现超阶级的人道主义作为创作目标，或者将反映生活视为目的本身，那也是错误的，其危害将与当年胡秋原、苏汶对左翼文学运动的危害相同，阻碍社会主义文学的健康发展。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有时回顾一下过去的历程，前人的教导，还是很有益处的。

关于文学与人民的关系

瞿秋白在论述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同时，还以极大的热情，研究了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他在这个问题上付出的精力，撰写的文章，比之其他文学问题都要多得多。并且，比之其他左翼作家，他的论述，也最有条理，最为深刻。在现代文学史上，正是瞿秋白，第一次明确提出：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是

“无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①。他还初步阐明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向工农大众学习，转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他承前启后，既坚持和深化了早期共产党人关于革命文学的主张，又为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工农兵方向的提出，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

在瞿秋白看来，文学之所以必须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是革命文学的根本任务决定的。这个思想，在他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中已有所反映。当时，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左翼作家与胡秋原、苏汶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论辩，原与左翼内部大规模的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交织在一起。这两个问题，也确实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们的交叉点，就是革命文学的根本任务。承认文学的阶级性，必然要求革命文学为在精神上“解放劳动者的广大群众而斗争”，为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消除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改造群众而斗争。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使革命文学大众化，必须让文学为大众所懂得，所接受，所爱好，真正深入到他们中间去，与他们相结合。否则，实现革命文学的根本任务就将成为一句空话。瞿秋白关于革命文学中心问题的提法，又一次表现了他的革命家的立场和热忱。

而且瞿秋白不仅是革命家，不仅是如苏汶所说的只懂得现实的革命政治的需要。瞿秋白还是一个牢固把握了唯物史观并颇具文学史知识的文艺理论家。他纵观历史，看到文学原来就是属于劳动人民的，只是由于剥削阶级的长期统治他们才丧失了享用的权利。因此把工农大众作为文学的主要的服务对象，让文学重新属于人民，是历史的必然，是革命文学运动应当负起的历史使命。一九

^① 《欧化文艺》，《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880页。

三一年九月，瞿秋白写了一篇表达自己的文学史观点的杂文《乱弹》^①，就由小见大，揭示出文学艺术当初来自劳动人民，其后为少数统治者占有，而最后必将重新属于人民的规律。文章说，古代的诗古文词，后来的昆曲以至乱弹一类艺术，原本是从平民的歌曲发展出来的；结果总被“贵族绅士霸占了去，成了绅士等级的艺术”，与平民绝了缘。在这中间，农民革命的鞞鼓曾经震动过封建文艺的一统天下，某些民间艺术一度抬头；然而到头来还是被统治阶级利用了去，走上“雅化”的道路，被注入了奴化教育的内容，成为了愚民政策的工具。现在，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劳动民众一定要、也一定能建设自己的文艺，来和剥削者抗争了。^②翌年，瞿秋白又有一封致鲁迅的长信，专谈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整理问题，也反映出类似的观点。他在信中肯定了“口头文学”、“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上的开辟作用，分析了统治阶级对平民文学的影响和占有的一般过程^③。这些意见，由于是信笔写出，史料不足；有的分析，如关于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的区分，也欠精当，但基本观点是可取的。这两篇文章，为他的“中心问题”观找到了历史依据，并且符合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化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从而加强了左翼作家实现文艺大众化的决心和信心。

至于瞿秋白有关论述的不足和粗疏，不久是由他的战友鲁迅弥补了的。据冯雪峰回忆，对于瞿秋白的有关见解，“在基本精

① 一九三一年左右，茅盾曾建议瞿秋白编写一部系统、简明的中国文学史，因为他认为就瞿秋白的理论修养和才识来说，很为合适。瞿也颇有一试之意，但苦于缺乏时间和安定的生活条件，未能如愿。不过他还是出于这一动机写了这篇杂文。（参阅茅盾：《瞿秋白在文学上的贡献》，1949年6月18日《人民日报》。）

② 《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252—255页。

③ 《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973—975页。

神和主要点上，鲁迅先生是同意的”，“他的主张还影响了鲁迅先生，使鲁迅先生也写了不少文章，为文艺大众化而奋斗。”^①按冯雪峰提示，我们可以读一读鲁迅写于一九三四年的《门外文谈》^②。《门外文谈》引用大量史实，经过细密的分析，深刻论证了文字和文学“在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的历史过程。他的结论，是与瞿秋白相同的：现在有觉悟的知识者，必须和人民站在一起，“作大众中的一个人”，为大众设想，将文字和文学“交给大众”。鲁迅的科学论述，证明了瞿秋白的依据的正确性。

但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包括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却没有重视文学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没有让文学与劳动大众结合起来。历史的需要和现实状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一九三〇年左联成立后第一次关于大众化的讨论中，已有人感觉到了。例如夏衍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乃至艺术——本质上，就是非为大众而存在不可的东西。假使说，普罗文学应该‘大众化’，那么，我们对于未曾大众化的文学，难道也承认它是普罗文学的一种吗？”^③潘汉年也说：提倡大众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工农大众是我们革命的主力军，我们普罗文学运动的任务，假如不能争取与鼓动他们中间的识字分子，这是多么错误！”^④现在，瞿秋白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中更尖锐地指出：“普洛文艺一般都应当是大众的，难道有‘非大众的普洛文艺’？然而不然！居然有”。这是与革命文学极不相称的。他因而称本文“普洛大众文艺”这个标题，按说是个“怪题目”！^⑤

① 《回忆鲁迅》，第56页，第132—133页。

② 见《且介亭杂文》。

③ 《所谓“大众化”问题》，1930年3月1日《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

④ 《我希望于大众文艺的》，1930年5月1日《大众文艺》第2卷第4期。

⑤ 《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855页。

瞿秋白从题材、内容和语言诸方面，剖析了新文学和革命文学与广大劳动群众严重隔离的状态。

他认为，在题材和内容上，新文学一直囿于知识分子的圈子，未能有明显的突破。“他的题材是狭小的”，“只是描写他们自己，只是提出他们自己的‘社会问题’，例如失恋呀，家庭冲突呀，三角恋爱呀，稿费太少呀，养不活妻儿男女呀……上海的亭子间生活呀，北京的小公寓生活呀等等。至于当时的大时代：乡下佬‘上城’的问题，穷人想赖债的问题，丘八想回家的问题”之类，则很少涉及。总之，“只是限于知识阶级的自我描写”^①；“只在知识分子的‘心灵’里兜圈子”，革命文学运动也沿袭这个圈子，“很久的和广大的群众隔离着”；^②而他们的“民众文学”，在他看来，也不过是“洋车夫文学和老妈子文学”，只用“浅薄的人道主义”“来可怜洋车夫老妈子，以至于工人，农民”^③。

瞿秋白的这种不满，由来已久。早在一九二〇年前后，他就与郑振铎争论过“文学为谁的人生”的问题。他说：说老实话，我们这些人有多少人生？我们的人生浮浅得很，劳动平民才有丰富的人生，我们本身受到一些痛苦算得了什么？劳动平民所受的压迫剥削才是真正的痛苦。他主张文学青年应当去了解劳动人民的人生，了解他们的痛苦和要求，以使用文学去为他们的人生服务。当时这些看法，虽然只是出于直感，却已触及了新文学的要害，比一般人对新文学的方向和服务对象的认识，要高出一筹。当然此后十年间，新文学作家们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实践，不断有所发展。文学研究会提出“要爱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不仅抒发下层小资产阶级的忧患，而且时时将视线转向劳动者的苦难。后期

① 《学网万岁！》，《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610—611页。

② 《欧化文艺》，《瞿秋白文集》第5卷，第880页。

③ 《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869页。

创造社以及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后，它们的一些作品虽然仍满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但毕竟接近了劳动大众。至于鲁迅，在五四初期，已十分重视农村题材，刻划了各种农民典型形象，他不是以浅薄的同情对待农民，而是深刻揭示出他们痛苦的根源，发掘出他们某种程度的反抗意识和革命的可能性。然而，从大多数作家来说，他们确实没有自觉地把劳动大众当作自己主要的描写对象，没有把了解他们、为他们服务作为自己的急务和方向。他们的进展是缓慢的，知识分子的自我表现倾向，始终没有根本扭转过来。

在语言方面，虽然五四文学革命一开始就提倡白话，反对文言，使白话成了文学语言的正宗，比之文言接近了人民大众的口语，但并不是大众化的。语言是文学的要素，是构成文学作品的最基本的材料，也是读者阅读文学作品首先接触的思想媒介。不实现语言的大众化，新文学作品就不能真正走向大众。瞿秋白在一九二三年写过一篇《荒漠里》。这是他自苏联回国以后直至一九三一年重返文学战线以前唯一专谈文学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就主要是提出“‘文学的白话，白话的文学’都还没有着落”、“中国的现代文还没有成就”的问题。文章认为新文学作品的语言念起来不能顺口，看上去有如翻译，结果无由进入“群众的‘读者社会’”，在云端飘浮，使群众的精神生活陷在荒凉的沙漠里^①。时隔八年，到一九三一年上半年，他作《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和《学阀万岁！》等长篇论文，还是保持原来的看法，而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和概括。他承认五四文学革命后，文学作品的语言比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改良运动（他称之为“第一次文学革命”）的“旧式白话”有了进展，是“新式白话”；也反复说明少数优秀作

^① 《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230页。

家已在运用真正的白话进行写作^①。但他认为，大多数作品使用的仍不是真正的白话，而是“种种式式文言白话混合的不成话的文腔”^②。当年，胡适主张的“文学的国语”，就不是真正的现代白话。胡适把《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小说的语言看作“模范的白话”，还说须“用文言来补助”^③它才行。这种主张当然使文学作品的语言更远离口语，有的实际上还是文言，只不过“换了几个虚字眼，不用‘之乎者也’，而用‘的吗了呢’”；有的则是“囫圇吞枣”的欧化，“所容纳的外国字眼和外国文法并没有消化”，读出来是听不懂的^④。他讥刺说：“例如当代诗人有这么一句：‘美人螭首变成狞猛的骷髅’。读者听着，这是：‘美人遵守变成柠檬的猪猡’！”^⑤对于这样的半文不白的和欧化的语言，瞿秋白赐以“非驴非马”的“骡子话”的称号^⑥，为之痛心疾首。他认为这“实在亦只有新式的知识阶级来读它”，走不出知识分子的营垒之外。因而，他提出要创造“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甚至说要为此而进行第三次文学革命^⑦！

瞿秋白对新文学与人民大众隔离的状况的估计，大体上是对的，但一些地方显然说得过于严重，对它取得的成就，评价过低，失之偏激。究其原因，是在于瞿秋白长时期离开了文学领域，对十年间新文学的发展了解不多。另一方面，也有他的苦心。茅盾回忆说：“记得《学阅万岁！》初稿，有几个朋友认为不能

① 参见《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644页、第700页（原注四三）、第858页、第887页、第905页。

②⑦ 《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620页第631页、634页。

③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存》第1卷，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版，第83页、79页。

④ 《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859页。

⑤ 《新鲜活死人的诗》，《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232页。

⑥ 《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860页。

发表，退还了秋白^①；后来经过他自己稍稍修改，这才发表了出来……。有一天，在某处遇到他，我就问他：难道你真正认为‘五四’以后十年间的新文学一无可取么？他回答说：不用猛烈的泻药，大众化这口号就喊不响呀！那么，他自己未尝不觉得‘五四’以后十二年间新文学不应估计太低，不过为了要给大众化这口号打出一条路来，就不惜矫枉过正。但隔了一年，在论‘大众文艺问题’时，他的主张就平稳得多了。”^②他的矫枉过正，实在是出于要实现大众化的强烈愿望。

一年以后的《大众文艺的问题》，以及《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我们”是谁？》等一组文章，持论确实平稳得多了，也深刻得多了。他不但比较客观地指出了五四新文学思想内容上缺乏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指导和现实主义精神，而且从根本上揭示了新文学脱离劳动大众的关键所在。

关键在哪里呢？当时，何大白（郑伯奇）发表了《大众化的核心》一文，认为大众化的“第一重困难在大众自己，就是大众对于我们的理解没有相当的准备”，“第二重的困难”才在于“我们作者”。何大白这一看法有很大的代表性和很深的历史渊源。二十年代初不少新文学作家提倡“到民间去”时，就偏重于讨论如何“提高”民众的水平，有的还认为要艺术“低就民众”，“不啻是艺术的自灭”^③。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虽然提出要接近工农大众的生活和用语，但总是以革命的化身自居，声言“自身就是革命”^④。一九三〇年左翼作家关于大众化的讨论，则主要局限于语言和形式的通俗化，而没有觉察到作家自身思想

① 茅盾后来说到，是冯乃超将稿子退还给瞿秋白的。

② 《瞿秋白在文学上的贡献》，1949年6月18日《人民日报》。

③ 威仿吾：《民众艺术》，1924年4月《创造周报》第47号。

④ 蒋光慈：《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1928年1月1日《太阳月刊》1月号。

上存在什么障碍。如郭沫若说：“我所希望的新的大众文艺，就是无产阶级的通俗化文艺！”认为文艺作家“要去教导大众，老实不客气的是教导大众，教导他怎样去履行未来社会的主人的使命”，这是“教导大众的文艺！你是先生，你是导师，这层责任你要认清！”^①现在何大白的文章，更说明这种看法在小资产阶级革命作家中是何等根深蒂固。因而瞿秋白专门为此写了《“我们”是谁？》一文，尖锐指出，小资产阶级作家蔑视大众，好为人师，是新文学不能实现大众化的主要原因。他说：

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普洛文学运动还没有跳出知识分子的“研究会”的阶段，还只是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而不是群众的运动。这些革命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决心走进工人阶级的队伍，还自己以为是大众的教师，而根本不肯“向大众去学习”。因此，他们口头上赞成“大众化”，而事实上反对“大众化”，抵制“大众化”。何大白的这篇文章就暴露出这一类的知识分子的态度，这使我们发现“大众化”的更深刻的障碍。——这就是革命的文学家和“文学青年”大半还站在大众之外，企图站在大众之上去教训大众。^②

瞿秋白由于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因而写作此文时，还特地约见郑伯奇，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③。

瞿秋白确实抓住了文艺大众化的主要障碍。也因此，他找到了实现文艺大众化的根本途径。他一再大声疾呼：“革命的文艺，

① 《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1930年3月1日《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

② 《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875页。

③ 见郑伯奇：《回忆瞿秋白烈士》，1952年6月18日《群众日报》。

必须‘向着大众’！”“革命的文艺，向着大众去！”^①而要向着大众去，就必须“向群众去学习”，“到群众中去学习”，这是“‘怎样把新式白话文艺变成民众的’问题的总答覆。”^②他指出必须向大众学习的重要理由是：“也许群众比作者更加理解革命得多，群众自己在那里干着革命的斗争。”^③他指出向群众学习的方法是：深入到他们进行文艺活动的场所去，“去观察，了解，体验那工人和贫民的生活和斗争，真正能够同着他们一块儿感觉到另外一个新天地。要知道：单是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是不够的，还要会象无产阶级一样去感觉。”^④这种不但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而且要有无产阶级的感情和感受方式的见解，是十分深刻的。它既指明了左翼作家获得真正的革命立场的标准，并且切合文学创作的特点。作家的创作，不是抽象的思想观点的演绎或图解，不是纯粹的理性活动，而总离不开对于实际生活中具体事物的真情实感，总伴随着强烈的感情活动。否则，写出的作品就无法打动群众，引起共鸣。这一见解，比过去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只强调把握无产阶级的目的意识，是前进了一大步。

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明确地指出：作家在思想感情上与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与工农兵相结合，是实现工农兵方向的关键。瞿秋白的见解，以及以前的早期共产党人、革命文学家关于文学的阶级性、文学大众化的论述和实践，为《讲话》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反过来说，瞿秋白此时的见解，尚没有达到《讲话》的深刻性和系统性。他所说的“到群众中去”，主要还不是指直接到群众的广泛的生活和斗争实践中去，而是指到群

① 《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914页、915页。

②③ 《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855页、873页。

④ 《“我们”是谁？》，《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877—878页。

众的“街头文学运动”、“大众文艺产生的地方”去，是通过深入大众的文艺生活，来学习、体验大众的思想感情。瞿秋白的要求显然狭隘得多。与此相联系，瞿秋白也没有充分意识到向群众学习、与群众结合有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甚至要经过“痛苦的磨炼”。瞿秋白见解的这些局限，是历史条件造成的。当时的左翼作家没有后来革命根据地作家那种深入工农的机会，自然也没有提供出深入群众问题上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不能苛求于他的。就他所处的历史条件来说，他的见解已经是相当深刻，难能可贵的了。

除此以外，瞿秋白认为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无过于语言的大众化了。这是“先决问题”^①。

瞿秋白着眼于广大识字不多的工农群众，提出要建立“现代普通话”、“真正的白话”。这种大众化的语言，是“整理好的嘴里讲的言语”^②。其大众化的标准，是“读出来可以听得懂”^③。它的语音，“大致和所谓北京官话的说法相同”^④；在用词上，尽可能使用“白话里原有的字眼”（如写“跟”、“和”而不写“及”、“与”，写“呆笨”而不写“痴愚”，写“不做声”而不写“缄默”等等）；在句法上，不排斥欧化成分而要“合于中国言语自己的规律”（如在副词形容词后不都加“的”、“地”，以致造出“幽默的地”一类怪写法，不在主语前面加上层层迭迭修饰或限制成分而形成拗口的长句子，等等）^⑤。瞿秋白还认为，这种现代普通话，可以说是“无产阶级的话”^⑥。它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已开始产生。他把现代普通话称作“无产阶级的话”，是意在说明现代普通话是一种能够容纳各种地方土语、消磨各种土语的偏僻性质、能适当吸收外国字眼和句法的语言。并且他认为，这样的现代普通话，将足

①③ 《大众文艺的问题》，《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887页、889页。

②④ 《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646页。

⑤ 《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647—648页。

⑥ 《大众文艺的问题》，《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889页。

以表情达意，演说故事，撰写文章。瞿秋白的现代普通话的提倡，使文学大众化在一个方面具体化了，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受到了许多人的注意，还成了一九三四年“大众语”讨论的前奏。

不过，现代普通话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究竟是否存在，能否运用来进行创作，当时是有不同意见的。止敬（茅盾）写了《问题中的大众文艺》^①，就认为现代普通话并不如瞿秋白所说的已经产生。他说，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各省工人在语言交流中产生的“普通话”仍是一个地方的“普通话”。如在上海，“他们‘通用语’的趋势却是‘上海土白化’”，所造成的是一种以上海白话为本位的南方话腔调的“普通话”而并非全国性的“真正现代中国话”。因此，茅盾认为现代还只能采用瞿秋白所非议的现行的白话话，只能是努力肃清欧化句法，和不见于口头的名词和文言词语，尽量做到读出来可以听得懂。茅盾的不同意见，促使瞿秋白作了更深入的探讨^②。他承认的确不能说“全国范围的口音完全统一的中国话已经产生”，但是一个地方的普通话既可形成，发展下去，也可以形成全国范围的普通话，尤其是书面语言，可以相当一致。所以革命文学运动，还是应当负起责任，来发起一个社会的运动。瞿秋白重申，他的“现代普通话”的主张，是针对一般作家（并不包括“一些先进作家”）不肯在语言大众化上下功夫而提出的，重要的是不能因为存在困难而放弃努力，止步不前。

瞿秋白和茅盾的分歧，主要是在于把语言大众化放在什么地位的问题上。瞿秋白认为“语言是先决条件，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余的努力大半要枉费”；茅盾则提出“技术是主、文字是末”的主张。他认为，大众文艺的“主要条件”是努力去学习运用《水

① 载1932年7月10日《文学月报》第2号。

② 瞿秋白在茅盾《问题中的大众文艺》发表后，除写了《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见于《瞿秋白文集》第3卷外，还有五篇书信形式的手稿，继续谈论大众语言问题。

浒》等古典旧小说的艺术方法和描写方法，如动作多，抽象叙述少，处处以人物行动来刻划人物性格，不用联想、暗示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大众的读者感动；而读得出听得懂，只是“起码条件”，仅做到这一点不能算是大众文艺。瞿秋白表示不同意这种“主要条件”的说法。他申明他并非忽视描写技巧，但是古典白话小说的技巧一时是不易掌握的，工人自己的作家以至于青年新进作家都会觉得难以下手。从读者方面说，根据他对工人读者的调查和观察，半文不白地描写景緻，或新小说那种悬空的对话，一开始就使他们如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这样，再好的描写手法，也对他们不起作用。因此如果把描写技巧作为主要条件，大众文艺就很难迈出第一步，就将仍在少数人中间进行。后来，茅盾谈到了他们的分歧所在，说：“我发现我与秋白是从不同的前提来争论的”：“文艺大众化主要是指作家们要努力使用大众的语言创作人民大众看得懂，听得懂，能够接受的，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这里包括通俗文艺读物，也包括名著）呢？还是主要是指由大众自己来写文艺作品？我以为应该是前者，而秋白似乎侧重于后者。”^①茅盾说的有一定道理，瞿秋白确实希望在大众中产生作家，这是有点急于事功的。他的许多论文的中心思想是要求文艺大众化有更大的群众性，更大的普及性，能形成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茅盾则更多地是从作家创作的角度，注意于大众化作品的艺术性，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目的也在于使大众化的口号变成现实。

瞿秋白和茅盾为了实现文学大众化而认真研究、追求真理的态度，都是令人钦敬的。他们在一些基本点上也是一致的，如都主张从群众的口语中汲取、提炼文学语言，都重视对旧形式的学习、利用和改造。其侧重有所不同，则反映了当时存在的各方面

^① 《文艺大众的讨论及其他——回忆录十五》，1982年5月《新文学史料》第2期。

的具体问题，有益于人们作更深入的思考。

瞿秋白在理论上探讨文学大众化的同时，还身体力行，进行了大众化作品的写作尝试。他在一九三一年住南市紫霞路期间，曾到住处不远的老城隍庙观听民间说唱，很欣赏卖梨膏糖老人“小热昏”之类的演唱^①。他动手写了不少通俗歌谣和故事，如有《东洋人出兵》、《上海打仗景緻》、《十月革命调》、《苏维埃歌》、《可恶的日本》、《五更调》、《工人要求新唱春》、《国民会议新唱春》、《五月调》（有照五更调唱及新新莲花落两种）、《苏维埃新山歌》、一首歌咏一年十二月大政治事件的无题歌谣（以上歌谣）；《英雄巧计献上海》、《江北人拆饼头》（以上故事）；《工人格福气》（说书）等^②。这些作品，与瞿秋白的早期新诗和同时期的小说《“矛盾”的继续》迥然不同。它们完全采用群众的口语，尽量揉入方言俗语，后者还模仿说书人的腔调以及“浅近的叙述方法”，是十分通俗易懂的^③。

① 参见丁景唐：《瞿秋白同志住在上海紫霞路的时候》，《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9月新2版，第4页。

② 其中《东洋人出兵》，最初载于1931年9月28日《文学导报》第5期，后印成小册子；《英雄巧计献上海》、《江北人拆饼头》，载于上海霞社1940年1月版《街头集》。其余各篇现都存有作者手稿。

③ 茅盾在《五卅运动与商务印书馆罢工》（载1980年5月《新文学史料》第2期）一文中说：“瞿秋白还用民歌的形式写了《救国十二月花名》（孟姜女调）和《大流血》（泗州调）等说唱小调”，发表在《热血日报》，“此种新形式也是秋白对文艺大众化的初次探索”。就是说，瞿秋白在一九二五年就开始大众化作品的写作了。这是与事实不符的。笔者查阅了《热血日报》上发表的全部歌谣，共有六首。其中有茅盾提到的两首，署“平民导社编”；此外尚有四首：《平民歌》、《五卅纪念曲》、《国民团结歌》、《罢市五更调》，三篇不署名，一篇署名丹人。随后，笔者分别访问了当年参与《热血日报》编辑工作的郑超麟和何公超。他们都认为茅盾所说不确。郑超麟说：那个时期，瞿秋白尚未写民歌形式的作品，还主张用词的语言写新诗；《热血日报》上的民歌是何公超（当时叫何味辛）写的。何公超说：《热血日报》有关稿件是由他编辑的，所载民歌，有的是工会方面提供的，有的是他本人写的，现已不能确指，但可肯定都不是瞿秋白所作。瞿当时忙于写社论等文章，无暇顾及。至于“平民导社”，是何公超编辑时假托的机构。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左翼作家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和实践，尽管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形成广泛、切实的运动，但提高了人们的认识，促进了新文学与人民大众结合的进程。瞿秋白在其中的贡献，自然是值得重视的。此后，随着抗战的爆发，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新文学与人民大众的结合，日益形成明显的趋势。语言的大众化问题，随之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注意，理论上的探讨不断深入，并有了不少具体的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历史是公正的评判者。瞿秋白当年关于语言大众化的意见和初步的、零星的尝试，被证明是抓住要领的，是有实践意义的。如一九四〇年前后，文艺界围绕着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展开了关于民族化的讨论。这次讨论推动作家们有意识地通过学习民族形式以实现大众化，而其中他们就特别注意语言的方面，特别注意向群众的语言学习。一九四二年的《讲话》，更强调了学习群众语言的重要性：“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①在阐明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时，又这样指出了大众化的一般步骤：“在目前的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因为“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的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但是“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版，第808页。

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①《讲话》中这些段落，与瞿秋白关于语言大众化是文学大众化的先决条件的意见是十分接近的。我们现在不知道毛泽东对瞿秋白关于大众化的意见如何评价，但从点滴间接材料，可以知道他在讲话前思考文艺问题时，曾经提到瞿秋白。据李又然回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毛主席曾满怀忧虑地深思过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在沉思中，他说：“怎末有一个人，又懂政治，又懂文艺！”“要是瞿秋白同志还在就好了！”并且，在《讲话》文本发表前的半年中，他阅读了《海上述林》等等书籍。^②《讲话》对大众化问题的论述，不必说，比瞿秋白所论的深刻、全面，也更稳妥、切实。再加上根据地良好的客观条件，《讲话》的精神很快转化为卓有成效的广泛实践。赵树理等根据地的众多作家和广大群众的创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和语言，出色地实行了大众化，形成了广泛的群众运动。新文学与人民群众真正结合的时代，终于来到了。

瞿秋白由于极为重视语言的大众化，希望尽快形成和使用“现代普通话”，还越出文学的领域，倡导“文字革命”即汉字改革。他认为“汉字存在一天，真正的‘人话文’——现代中国文（就是完全用白话的中国文字）就一天不能够彻底的建立起来。”^③他坚定地主张从根本上废除象形的方块汉字，代之以拉丁化（或称罗马化）的拼音文字，以便于记录大众的口语，形成言文一致的现代普通话，扫除一般劳动大众阅读作品的第一层困难，并可大大缩短人们学习识字所花费的时间。为此，他亲自研究和拟订汉字拉丁化

① 《毛泽东选集》，第818—819页、第816页。

② 见《毛主席——回忆录之一》，1982年5月22日《新文学史料》第2期。此外，萧三《忆秋白》（1980年6月16日《人民日报》）一文中回忆说，一九三九年他和毛主席在延安谈到瞿秋白时，毛主席说：“是啊！假如他活着，现在领导边区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言之不胜惋惜。

③ 《学网万岁！》，《瞿白秋文集》第3卷，第597页。

的方案。他早在一九二一年就关心汉字拼音化；一九二七年则开始着手研究；一九二九年拟订出《中国拉丁化的字母方案》；最后，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讨论文学大众化时，写成了专著《新中国文案》。吴玉章、黎锦熙说：“一九二六年产生了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制定的‘国语罗马字’，……一九三一年产生了由瞿秋白、吴玉章等制订的‘拉丁化新字母’。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是中国人民自己创造的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大大超越了它们之前的各种同类方案。”^①茅盾还指出，瞿秋白的方案，与过去“为了统一所谓国语”而提出的方案不同，“是在提倡大众语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一提出来就得到各方面的赞同。”^②瞿秋白为了文学大众化和文化的普及而提倡汉字拼音化和制定方案，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他的彻底的革命者的态度，他的全心全意为普通劳动大众着想的精神，是令人难忘的，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文学应当属于人民，原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文学的最高理想。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理想已经成为现实。在这个理想化为现实的漫长过程中，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作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三十年代提出的文学大众化，四十年代提出的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和今天提出的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标志着它的发展过程。其间，瞿秋白的一份贡献，自然应当得到充分的评价。他是解决新文学与人民大众结合问题的开拓者之一。他提出的有一些看法，如革命的进步的作家不能沉溺于自我表现，不能高踞于群众之上，而要站在人民之中，把自己的

① 吴玉章、黎锦熙：《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字拼音的总结》，《文字改革集》（吴玉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版，第139页。

② 《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及其他》。

命运和感情与人民群众连结在一起，把为人民服务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是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的。如果背弃了这个原则，作家将最终丧失自己的艺术生命。

最后，对于瞿秋白在这方面论述的缺点及其原因，还须作一简略的总结和辨析。瞿秋白论述中的缺点，主要是对五四新文学在解决与人民关系上的成绩估计过低。应当说，新文学一开始虽然较多局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但已呈现出走向人民的趋向，并不断有所发展。瞿秋白对此肯定太少，是不恰当的。其原因，除了长期脱离文学领域，对具体情况不甚了解和采取了矫枉过正的做法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在于他对新文学的性质的理解带有片面性。他认为一九二八年以前的新文学运动，“完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运动，所以这种文艺革命运动是不彻底的，妥协的”^①。这种看法，在一九四〇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以前，在进步文化界里普遍存在。许多人对五四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缺乏真知，没有看到无产阶级思想对广大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有力影响和推动。瞿秋白未能突破当时的偏见。但是，谈到这里，也应当指出，瞿秋白在具体分析新文学性质和命运的过程中，也有一个很深刻的见解，值得肯定。他指出，新文学包含着买办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多种成分。前三者，都脱离群众，而且其中有的还企图蒙蔽群众，争夺群众，以“垄断文艺”。所以，无产阶级更需要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只有如此，才“能够保证无产阶级在文艺战线上的领导权”；反过来，“也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能够保证新的文艺革命的胜利”^②。瞿秋白没有看到一九二八年以前无产阶级已在发挥领

① 《欧化文艺》，《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880页。

② 《欧化文艺》，《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881页。

导作用，固然错误，但他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保证文学革命的胜利，又只有开展文艺大众化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则是正确的。而这个看法，也正是瞿秋白把文艺大众化视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心问题的更深刻的原因。

关于现实主义

在关于瞿秋白文艺思想的研究中，有一个方面曾长期受到忽视，这就是关于他的现实主义的观念。实际上，在中国，正是他较早也较系统有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实主义的精辟论述。其中，恩格斯致哈克奈斯的那封著名的信，还是他最早译介到国内来的。一九三二年，苏联“公谟学院”在《文学遗产》上首次将这封信刊行于世；同年，瞿秋白就将它译成中文，并根据《文学遗产》上的有关材料以及自己的理解，详加阐发，编在《“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里^①。在此前后，瞿秋白也在具体的文学批评文字中，多次表达了他对于现实主义的见解。他坚持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基本观点，坚持无产阶级改造世界、造就新人的革命目标，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他既反对脱离现实生活的空想和矫揉造作，又否定没有理想、没有热情的“庸俗现实主义”，而要求真实性和革命倾向性的结合。他的这个思想，不仅在三十年代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起过积极作用，而且在今天也没有失去生命力和新鲜感。

瞿秋白首先认为，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最重要的特征，最基本的原则。他早在一九二四年的《社会

^① 见《瞿秋白文集》第4卷。原编入《海上述林》上卷，1936年5月版。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署名静华，最早刊载于1933年4月1日《现代》第2卷第6期。

科学概论》等著作中，已运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来阐述文学的起源和历史，因而他这时在理解恩格斯致哈克奈斯的信时，一开始就准确地把握了它的要义，注意到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的强调。他解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是非常之看重的”，他们“反对那种曲解事实而强姦逻辑的‘私心’。这种虚浮的‘有倾向的’，‘有私心的’作品，他们说它是‘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文学’。他们所赞成的是‘客观的现实主义的文学’。”^①瞿秋白显然是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哲学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联系起来理解的。他所说的“私心”，是指席勒式的“主观主义的理想化”，他所说的“客观的现实主义”，就是指恩格斯以巴尔扎克为例而阐明的那种“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的现实主义。恩格斯指出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但是他在自己的小说里违背了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嘲讽了贵族，显示了他们必然没落的命运，“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②。瞿秋白突出地引证了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虽然接下来，他对于巴尔扎克世界观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矛盾的解释不够完满，但对于巴尔扎克“不把自己小说里的‘英雄’，变做‘时代精神’的号筒”，而“写出社会的实际生活”的创作方法的特点，作了明确的肯定。为了说明现实主义的真实的客观性，瞿秋白还同时引用了马克思对狄更斯、萨克雷的肯定：这些现实主义的作家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瞿秋白文集》第4卷，第1015—1016页。

②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62—463页。

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①。（瞿秋白的译文不同，略。）总之，瞿秋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赞扬巴尔扎克等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因为他们要求作家服从和把握生活的客观逻辑，从客观现实出发进行创作，是因为他们把真实性作为现实主义作品最基本的、第一位的东西。瞿秋白虽然把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称为“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文学”^②，表现出保留的态度，但他认为它们有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描写”，显示出“巨大的认识能力”。而“真实描写”的特征和对于社会历史的认识价值，是无论哪个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品都应当具备的。他明白无误地指出：“无产阶级作家应当采取巴勒扎克等等资产阶级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创作方法的‘精神’。”^③

注重真实地再现现实，确实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精神”。后来我们许多同志对恩格斯致哈克奈斯的信进行了更多的、更细致的研究，有的地方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是在研讨真实性与典型性的关系时，却对现实主义的基本含义产生了偏差。他们没有全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述，而将这封信里的一句话“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视为现实主义的定义，结果走向了狭隘。这种理解，脱离了现实主义整个创作的实际，不仅不能解释非叙事性如抒情诗一类的现实主义作品，而且把许多没有达到“再现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高度的一般现实主义叙事作品排斥在外。这偏离了恩格斯的本意，模糊了现实主义文学真实地描写生活这一基

① 《英国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4月版，第68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瞿秋白文集》第4卷，第101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瞿秋白文集》第4卷，第1029页。

本含义。瞿秋白也是引录了恩格斯的这一句话的。但他是把它置于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下来阐释的。他把它看作小说创作达到高度真实的途径，即不但描写事实，而且“发露原因”、“揭开内幕”，而不是把它看作普遍性的定义。瞿秋白没有对小说等叙事作品如何通过典型人物和事件达到本质真实这一具体课题作精细的研究，在今天来看不能令人满意，然而他牢牢掌握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并加以强调，却是应当肯定的。因为在三十年代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中，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强调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原则，正有着极为迫切的意义。

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尚在幼稚阶段。不少革命文学家热切地要表现出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感情，但常常从概念出发，凭空构想，生硬编造，将一些革命道理硬塞给读者。这实际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创作倾向。用瞿秋白的话来说，他们是“用一些慷慨激昂淋漓尽致的空谈，来掩盖自己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糊涂观念”，使“正眼观看现实的真正勇气，被虚伪的空喊的‘英勇’所代替”^①。因此对于他们，从根本上强调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指出真实是现实主义的基础，提倡从生活出发进行创作，非常必要。

当然，瞿秋白并不是反对左翼作家表现自己的革命意图，并不是忽视文学作品的革命教育意义。恰恰相反，他正是为此，才高度重视文学的真实性。他指出，如果不是从生活实际出发，不是从具体的实际生活中提炼出事件和情节来，按实际生活的规律写出人物性格的必然逻辑来，文学就不能反过来影响生活。以主观意念代替真实描写的作品没有真正的生命，用抽象的说教不能打动人心。瞿秋白对于《三人行》的批评就是如此。他肯定《三人

^① 《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1007页。

行》的作者有革命的政治立场，但是“仅仅有革命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它所写的事件“脱离着现实的事变”，人物的“生长和转变”也“都是没有恰切现实生活的发展过程的”，“结果是‘三人行，而无我师焉’。”^①茅盾后来首肯了瞿秋白的这个意见，他说：

“这一作品的故事不现实，人物概念化”，“徒有革命的立场而缺乏斗争生活，不能有成功的作品：这一个道理，在《三人行》的失败的教训中，我算是初步的体会到了。”^②而好象要进行对比、当作示范似的，瞿秋白在评《三人行》之前不久，这样称赞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道：“事实的本身是最有力量的宣传。任何故意宣传鼓动的小说诗歌，都没有这种真实的和平心静气的记事本末来得响亮，来得雄壮，——这是革命的凯旋歌。绥拉菲摩维支只不过说：哪！我们是怎么奋斗过来的。这就够了——这就可以了解，历史往哪一方面走着”^③。以上例子表明，瞿秋白不仅在理论上把真实性当作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而且在文学作品的具体评论中，也将真实性作为首要的衡量标准。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左翼作家的作品真正发生革命的教育作用。这些文学批评，切中时弊，十分有益于左翼艺术的成长发展。即使到今天，仍有一读的价值。

瞿秋白也以“真实”为标准来评论作家的全人。众所周知，瞿秋白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鲁迅作了崇高评价的人。他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把鲁迅的精神归纳为四点。他首先推崇鲁迅的一条，就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最后作为归结的一条，则是“反虚伪的精神”，并且指出：“他的现实主义，他的打硬仗，他的反中庸的主张，都是用这种真实，这种反虚伪做基础。”

① 《谈谈〈三人行〉》，《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335页、339—340页。

② 《茅盾选集·白序》，《茅盾选集》，开明书店1952年版。

③ 《〈铁流〉在巴黎》，《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333页。

当然，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真实”，主要指鲁迅坚决反对“瞒和骗”的最热烈最严正的人生态度，并非美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但两者的精神是相通的。它既与瞒和骗的人生态度相对立，也用以扫荡“瞒和骗的文艺”。正是这种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造就了伟大的鲁迅，造就了“鲁迅在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①，使他对中国革命作出巨大的贡献。

瞿秋白关于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的论述，不仅针对着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上的弊病，同时也以此批判了胡秋原等人散布的抽象的人性论。他在阐明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观之后，有力驳斥了胡秋原那种“一切伟大的文学都有高尚的情思，都永久是自由的，民主的，向着光明，人道主义的”一类错误观点。他说，如果伟大的文学作品是在于表现永久不变的“高尚的情思”，那么，恩格斯推崇的深切反映了法国社会历史的巴尔扎克的小说，也并不伟大、并无价值了。^②恩格斯并没有赞扬巴尔扎克的“高尚的情思”，倒是指出他作为正统派表现出对于“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的“同情”。恩格斯是由于他真实描写了法国社会的现实关系及其演变，而赞扬他的！胡秋原所谓要表现永久不变的“高尚的情思”，同一些左翼作家慷慨激昂的空谈一样，也是创作上唯心论倾向的反映，而且更为严重。这种超阶级的人性论观念，根本否定社会上实际存在的阶级、阶级斗争及其发展和变化，因而势必离开现实的社会关系和具体的历史环境，产生虚假的作品。譬如近几年来，有的反映解放战争时期的作品，专写处于生死搏斗之中的敌对分子之间的恋情，虚构一种凌驾于国共两党斗争之上的人类之爱，就完全失去了历史的真实。还有一些作品，也离开生活实际，一味描绘性格分裂式的“复杂”人物或追

①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1001—10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瞿秋白文集》第4卷，第1030—1031页。

求抽象的“人情”。这些作品，与一些早已令人厌憎的标语口号式的、简单化的“假大空”作品，殊途同归，陷入了概念化、公式化，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原则。

在肯定无产阶级作家要学习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精神”之后，瞿秋白又认为无产阶级文学的现实主义应当达到更高的阶段。它更讲求真实。“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最先进的阶级，他不需要虚伪，不需要任何理想化，不需要任何的自欺欺人的幻想。‘现实’用历史的必然性替无产阶级开辟最后胜利的道路。”^①这就是说，无产阶级的前进方向符合历史的必然，因而作品愈是表现出客观真实，就愈能起到宣传革命、培育新人的作用。大概正因为瞿秋白把反映客观现实视为革命文学首要的原则的缘故吧，所以他把所编译的一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冠以一个总标题，叫做：“现实”。

那么，究竟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客观现实呢？

如前所述，瞿秋白首先在最基本的意义上要求面向生活，描写事实本身。但是，瞿秋白又从来不简单地把实际存在的生活现象和一般的事实当成真实。艺术的真实，应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而本质，就是社会发展的内部矛盾。如果只有现象的真实而无本质的真实，那是庸俗的现实主义。瞿秋白说，巴尔扎克自称为“法国社会的秘书”（现通译为“书记”——引者），但并不是“只记录一些事实”，“巴勒扎克在事实之外，在所谓‘到处都发生着的事情’之外，还能够揭开内幕，暴露社会生活的机械体”^②。“揭开内幕”，即是从生活现象的表面深入下去；“暴露社会生活的机械体”，即是反映出社会的内部矛盾。这才是艺术的真实，这才是作家作为

① 《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87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瞿秋白文集》第4卷，第1025页。

社会“秘书”的职责。社会的“秘书”决不同于只记录事实的秘书。这个意思，瞿秋白还常常用“揭穿一切种种假面具”一语来表达。“揭穿一切种种假面具”，原是列宁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对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的评论（见瞿秋白的译文：“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揭穿一切种种的假面具”^①）。后来苏联的“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也引用这句话作为他们的创作口号。但是“拉普”派错误地、机械地把它运用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把揭穿资本主义制度的伪装与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缺点相混同。瞿秋白引用这句话，则清楚说明这是过去批判现实主义所具有的暴露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这一“优点”。我们要学习这个优点，同时要超越它，即不止于“暴露社会发展的内部矛盾”，还要“最深刻的、最切实的了解到社会发展的遥远的前途”“更加彻底的，更加深刻的了解社会发展的内部矛盾”^②。他理解的假面具，实际上指一切掩盖着本质的表面现象和假象。他相信无产阶级的文学将是更真实的、也更有力量的文学。

不过，应当说瞿秋白所称的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与“拉普”派关于创作方法的提法是存在某种联系的。瞿秋白在不少文章里，把“更高阶段”的现实主义，有时称作“新现实主义”，有时称作“普洛现实主义”，有时称作“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其中，“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这一用语，就是“拉普”派在一九二八年提出来的。“拉普”成立于一九二五年，它的文艺思想，在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中曾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思潮。“拉普”错误地把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认识现实的一般科学方法和形象反映

① 《列甫·托尔斯泰象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瞿秋白文集》第4卷，第1219页。这篇译文最早发表于1934年9月25日《文学新地》创刊号，署名商廷发。后于1936年由鲁迅收入《海上述林》上卷。

② 《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瞿秋白文集》第4卷，第1030页。

现实的艺术方法混淆起来，认为应当先学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然后按照辩证法的“公式”进行创作。它不要求作家深入生活，而把生活作为作家可以随心所欲地用来图解公式的材料。它还由此提出了“打倒席勒”、反对浪漫主义的口号；甚至后来连现实主义的概念也加以回避，加以否定。结果，抽象的公式和教条代替了对生活的真实描写，“本质”成了孤立的、赤裸裸的东西。直到一九三二年四月，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解散了“拉普”，才批判了这种主张。瞿秋白的有关文章，都写在这以前，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这是瞿秋白文论的历史局限性的表现之一，过去有些同志已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不过，有的同志把瞿秋白的主张，简单地与“拉普”的主张等量齐观，又是缺乏具体分析的。

瞿秋白一九三二年为重版的华汉的小说《地泉》所作的序文《革命的浪漫谛克》^①，是他受“拉普”影响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这篇文章，开头就以“拉普”成员法捷耶夫写于一九二九年的《打倒席勒》中的一段话作为引子，作为依据。当时，法捷耶夫把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解释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并且误认为马克思反对席勒的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是对席勒的全盘否定，又认为“做‘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是“浪漫谛克路线”；所以，应当打倒席勒，应当摒弃浪漫主义。瞿秋白受此影响，由此出发来批评《地泉》，得出了“浪漫主义是新兴文学的障碍”、“我们应当走上唯物辩证法的现实主义的路线”的结论。此外，他在同年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述时，也将“浪漫主义”说成是“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文学”^②。显然，瞿秋白

① 载华汉：《地泉》，上海潮风书局1932年7月重版。又载《乱弹及其他》，上海霞社1938年5月版，第319—32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瞿秋白文集》第4卷，第1016页。

当时未能对浪漫主义这个复杂问题作全面、深入的考察，没有看到它虽然侧重抒发主观感情，虽然不着力于描写客观外界，但并不等同于唯心主义，也并非一定建筑在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如高尔基后来所说的积极浪漫主义，同样是基于现实，同样是具有真实性的。因此他就很容易受“拉普”派观点的影响，造成了一个理论上的失误。

但是，瞿秋白并不是完全接受了“拉普”派的观点。他曾从事过多年的文艺写作，是懂得文艺的；他又主要是根据当时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实际来谈论创作问题的。他在理论上否定浪漫主义虽然错误，但对《地泉》的“革命的浪漫谛克”的具体针砭却基本上是正确的。他所说的《地泉》的“革命的浪漫谛克”，是作品中确实存在的对现实的空想和革命的狂热。他指出《地泉》充满着“最肤浅最浮面的描写”，“一切人物都是理想化的，没有真实生命的”，对现实社会关系（如雇主和雇工的关系）的反映也不真实。这是击中要害的。他的失误在于把这种“革命的浪漫谛克”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混淆起来了。至于对“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这个用语，他的实际理解与“拉普”也不相同，并没有以此来取代现实主义的概念，对现实主义加以否定。他在使用这个名词时，是意在强调文学作品应当反映出社会的内部矛盾和方向，而没有象“拉普”那样无视艺术的特殊规律。当时，“拉普”派的领导人宣称“作家的艺术方法完全从属于他的思想立场”^①，“拉普”派的整个理论也表现出为了政治而舍弃艺术的倾向。瞿秋白却相反，曾指出作家仅有革命立场是不够的，始终如一地反对一些左翼作家作品中存在的标语口号倾向。还明确提出必须通过

^① 阿维尔巴赫：《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道路》，原载1927年5月《在文学岗位上》；转引自（美）赫尔曼·叶尔莫拉耶夫：《“拉普”——从兴起到解散》（张秋华译），见《拉普资料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9月版，第382页。

具体感性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来反映本质。他说：“文艺的作品应当经过具体的形象，——个别的人物和群众，个别的事变，个别的场合，个别的一定地方的一定时间的社会关系，用‘描写’‘表现’的方法，而不是用‘推论’‘归纳’的方法，去显露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历史的必然和发展。这就须要深切的对于现实生活的了解。”^①这里相当明确地提出了文艺从个别表现一般的规律。他注意到这个基本规律，因而也重视细节的真实。例如茅盾的《子夜》原稿上写吴荪甫坐的轿车是福特牌，因为当时上海通行福特；瞿秋白读后认为象吴荪甫这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建议改为雪铁龙^②。瞿秋白正是在重视细节真实和现象真实的前提下，来强调深入揭示社会的内部矛盾和必然结果的。也就是说，他并不孤立地把本质当作真实的唯一因素。因此他关于深入揭示本质的意见并不会导致作品的概念化。这也可证之于《子夜》的修改。茅盾起初打算以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握手言和结束，瞿秋白建议改为一胜一败，认为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没有出路^③。现在我们所见的《子夜》正是这样写的。最后，在什么是本质的问题上，瞿秋白不象很多人那样，把本质仅仅理解为社会发展的光明面，把本质和主流机械地等同起来。他激烈地反对写革命斗争则一定是“没有失败，只有胜利；没有错误，只有正确”的“团圆主义”，反对“把一切现实生活里的现象都公式化”的“脸谱主义”^④。这与优秀现实主义作家茅盾的观点也是一致的。茅盾在《〈地泉〉读后感》中同样指出，一些左翼作家“缺乏对于社会现象全面的非片面性的认识而只是‘脸谱主义’地描写人物”。总之，瞿秋白虽然有

① 《普洛大众艺术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868页。

②③ 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载1981年11月《新文学史料》第4期。

④ 《普洛大众艺术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870页。

时使用“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名词，虽然在字面上否定浪漫主义，但其实际主张和“拉普”派的观点还是有区别的。

现在，我们较多地注意到唯心论的、抽象的“本质论”给创作带来的危害，这是完全应该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文学作品只要写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写出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够了。不反映本质的作品同样会走向虚假，丧失其积极的社会职能。只有现象和本质的辩证统一，才能达到艺术上的真实。这是为创作实践所证明了的，也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不能代替创作方法，但是它作为基本的指导思想，却不能漠视。

在阐述如何把握本质的问题时，瞿秋白介绍了高尔基的“两种真实”论，至今读来还给人启示。高尔基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断变动着的事实，但总的说来，“真实有两个：一个是临死的，腐烂的，发臭的；另外一个是新生的，健全的，在旧的‘真实’之中生长出来，而否定旧的‘真实’的。”^①从旧的“真实”中生长出来的新的“真实”，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它存在于我们每天的实际生活之中，又与无产阶级科学的社会理想相联系。作家应当以无产阶级的理想和热情，去把握它，表现它；而不应视而不见。当然，衰亡着的“真实”也是客观存在，也可以描写。但应该分别采取肯定和否定的态度，显示出他们前进和衰亡这两种不同的本质和趋向。这样，就能反映出生活不断向前发展的规律。瞿秋白十分赞赏“两种真实”论，认为它体现

^① 《高尔基论文选集·写在前面》，《瞿秋白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2月版，第1721页。这段话是瞿秋白对高尔基有关论述的一个概括。高尔基关于“两种真实”的原话，可见瞿编译的《高尔基论文选集》中的《无耻主义》和《答复知识分子》的两处（《瞿秋白文集》第7卷，第1903页、1933页）。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高尔基《文学论文选》中《同进入文学界的青年突击人员谈话》一文也有论及（见该书第130页）。

了以鲜明的无产阶级观点观察现实的精神，因而颂扬高尔基是“新时代的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家”^①。

至于如何才能正确反映“两种真实”，这就取决于作家的思想。瞿秋白说：“艺术上反映着现实的时候，作家没有可能不表示某种立场的某种态度。”这里，他实际上提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客观真实性与作家的主观思想感情的统一问题，提出了文学的倾向性问题。关于文学作品的倾向性，是瞿秋白在论述现实主义真实性之后提出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对此，他在其他文章里也多有论析，并且有他独到的见解。

瞿秋白指出，文艺是“人的行为底一种”，是通过作家的头脑的，因而总是“包含着文学家所表示的对于社会现象的态度”，而非照相式的观照，不可能有所谓“‘纯粹的’客观主义”。有人说自己抱着“纯粹客观主义”来写作，那是“假装的”，“自欺欺人”的^②。文艺的真实，既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又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能够帮助作家达到本质的真实，他们也确实总是公开要求自己所写的“真实”，既要反映出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又要融注进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革命的理想，是革命倾向性的重要因素。

当时，自称为“第三种人”的苏汶曾提出一个论点：“只要作者是表现了社会的真实，没有粉饰的真实，那便即使毫无煽动的意义也都决不会对于新兴阶级的发展有害的，它必然地呈现了旧社会的矛盾的状态，而且必然地暗示了解决这矛盾的出路在于旧社会的毁灭，因为这才是唯一的真实。”^③他主张以真实性来取

①② 《高尔基论文选集·写在前面》，《瞿秋白文集》第7卷，第1719—1721页。

③ 苏汶：《“第三种人”的出路》，《文艺自由论辩集》，现代书局1933年版，第117页。

消革命的倾向性，从而反对表现革命的理想。他回避了如何才能达到真实的问题，否定了作家的世界观在创作中的指导作用，实际上没有懂得文学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瞿秋白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的注释里，指出苏汶的错误是“把‘现实主义’解释成为客观主义”^①。瞿秋白不但认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能够帮助作家达到真实，而且认为，真实性和倾向性虽然一致，但不能全然代替。它们终究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两个方面的要求。固然，真实性是革命倾向性的基础和前提，真实反映现实的作品往往能够表现出作者正确的立场、观点；但是革命的倾向性并非仅此而已。仅仅具有真实性和正确观点的作品并不一定会产生鼓舞人心、激发革命意志的作用。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总在而面对现实的时候，“激发”出革命的理想和热情。没有理想，没有热情，也是“庸俗的现实主义”，也难以和批判现实主义区别开来。瞿秋白说：

“不要忘记现实主义的要素”（恩格斯致拉萨尔谈革命悲剧一信中的话，现译为“不应该为了理想而忘掉现实”——引者），并不是要抛弃一切热情，理想，思想和“最终目的”。……真正的现实主义——不做资产阶级“科学”底俘虏的现实主义，应当反映到这现实世界之中的伟大的英勇的斗争，为着光明理想而牺牲的精神，革命战斗的热情，超越庸俗的尖锐的思想，以及这现实的丑恶所激发的要求改革，要求光明的“幻想”，远大的目的。

自然，瞿秋白接着说，要“把这些情感和理想建筑在现实生活的

^① 见《瞿秋白文集》第4卷，第1194页。

基础之上”。^①但如果把现存的一切看成天经地义，无法改变，或只描写现实的丑恶，浸沉于平庸的思想，那样的作品，会多么令人生厌，令人颓丧啊！

认为革命的倾向性的重要因素是革命的热情和理想，是瞿秋白的真知灼见。虽然瞿秋白当时曾把表露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浪漫谛克”与浪漫主义相混，表明他对浪漫主义这一创作方法的内涵缺乏考察；但他这里所强调的革命热情和理想，却正是革命浪漫主义的内容。他实际上主张将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结合起来。当然，理想和热情不应是外加的，或者在字面上特别地说出，但它也不会真实地反映现实的过程里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能够在真实反映现实的同时迸发革命的理想和热情的作家，往往是最富革命性的作家。例如鲁迅，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就曾这样评论说：“鲁迅的现实主义决不是第三种人的超然的旁观的所谓‘科学’态度。善于读他的杂感的人，都可感觉到他的燃烧着的猛烈的火焰在扫射着猥劣腐烂的黑暗世界”^②。这里所说的鲁迅作品里“燃烧着猛烈的火焰”，与《序言》开头指出的鲁迅作品的“倾向性”，“为着自己的理想而斗争”等等，是相呼应的。瞿秋白本人，也正是具有巨大革命热情和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作家，也正是怀着强烈的革命责任感从事文学事业的。他热切地希望文学作品能够给革命人民以信心和力量，能够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成为造就新人的强有力的精神武器。因此，瞿秋白阐述现实主义时，才如此明确地要求真实性和倾向性的融合，如此突出地强调革命热情和理想的重要。这个看法，在今天还显然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① 《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1008页。

^② 《瞿秋白文集》第3卷，第999页。

瞿秋白的鲁迅论

瞿秋白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最集中地反映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一文中。

这篇《序言》一问世，就曾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并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被公认是鲁迅研究史上一篇具有开创性的、经典性的马克思主义论文。到了“文化大革命”，《序言》随着瞿秋白在政治上被“打倒”，曾遭受过猛烈的“批判”，但今天又重新获得了众多研究者的肯定。《序言》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盛而久远的生命力呢？《序言》的马克思主义性质表现在哪里呢？我以为，这主要是在于，《序言》坚持运用了“实践的观点”这个“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①，它象一条红线似地贯串全文。瞿秋白始终将鲁迅及其杂文放在近代、现代中国社会斗争中间，又主要依据鲁迅的革命实践，来考察、分析鲁迅杂文产生的社会原因和战斗价值，来论述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因而他首先在认识论上为人们树立了榜样，同时也使他的结论，他对鲁迅的基本评价，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能够经住时间的考验，不断给认真的研究者以有益的启示。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1964年4月版，第261页。

对鲁迅的基本评价

在《序言》之前，鲁迅的杂文和思想，没有得到过科学的分析和应有的评价。新文化运动的敌人，出于反动的立场，开始施以恶毒的攻击，继而竭力地贬低，公开地表示鄙视。鲁迅自己就曾说过：“这‘杂感’两个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厌恶，避之唯恐不远的了。有些人们，每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就往往称我为‘杂感家’，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视”^①。另有一些评论者，敬佩鲁迅态度的忠实，惊叹鲁迅观察的深刻，试图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成功作出解释。但是他们往往离开鲁迅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作玄虚的心理分析，作抽象的人格评价，从而得出鲁迅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鲁迅是“沉默的旁观者”^②之类的显然错误的结论。左翼文艺运动中有一些同志，则从个别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或概念出发，进行简单的机械的推论和“裁决”，即如瞿秋白在《序言》中所指出的，采取了“‘空城计’式的夸张”，如有一篇文章，一会儿说“鲁迅在这阶级对立间，取了一个中立(?)的态度，也‘不革命’，也不‘反革命’”，一会儿说“鲁迅，对于布尔乔亚是一个最良的代言人，对于普罗列塔利亚是一个最恶的煽动家！”^③另有一篇文章，连声指责“他完全变成个落伍者，没有阶级的认识，也没有革命的情绪。他对于革命和革命文艺，态度是异常的不庄严”^④。更有甚者，还有人谩骂他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⑤等等。直到后来，不少左翼作

① 《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② 张定璜：《鲁迅先生》，见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

③ 李初梨：《请看我们中国的 Don Quixote 的乱舞》，1928年4月15日《文化批判》第4号。

④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文末署“1928年5月太阳所载”。

⑤ 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1928年8月10日《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

家，还对鲁迅的杂文认识不足。据一些老同志回忆，他们当时误认为杂文是随便说说的，无法从中产生“伟大的作品”。至于社会上的一般读者和青年，对鲁迅是敬仰的，但大多只是把他看作著名的文学家，对他缺乏深入的了解。

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者；只有从社会实践出发，才能获得对真理的认识。瞿秋白看到了鲁迅及其杂文的真价值。他从“急遽的剧烈的”现代阶级斗争情势，找到鲁迅杂文独特形式产生的原因；他依据阶级斗争中产生的结果，指出鲁迅杂文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是文艺性的“社会论文”，是革命艺术家的利器。这些从社会实践出发作出的论断，深刻指明了鲁迅杂文的文学价值和战斗价值。对于鲁迅的思想，瞿秋白更以这样的原则进行了研究。他紧密结合辛亥革命前后直到三十年代初期的社会阶级斗争，尤其是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来考察鲁迅思想的发展，寻找其根源和轨迹；同时又根据鲁迅自己的战斗实际，具体说明了鲁迅言论的真正含义和实质，从而得出结论：“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 and 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这个结论，从哲学观点和政治立场两个方面，勾勒了鲁迅思想发展的轮廓。它说明鲁迅前期是反叛封建统治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又确认后期鲁迅是一位无产阶级的战士，并指出坚韧的战斗精神和来自实践经验的深刻观察能力，是贯串于鲁迅一生的特点。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认识，所以他在《序言》一开头，就强调指出鲁迅是保持“和社会斗争的联系”的、有着鲜明政治倾向性的“革命的作家”，又在文章最后部分指出他不仅是文学家，而且是在思想斗争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思想家”，号召左翼作家向他学习，同

着他前进。

瞿秋白之所以能得出这正确的结论，除了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外，还因为他是被鲁迅引为“知己”的亲密战友，与鲁迅有密切的交往，和鲁迅进行着共同的战斗。尤其是在撰写《序言》的日子里，他与鲁迅几乎每天见面，畅谈一切。许广平后来回忆说：“在动笔之前，秋白同志曾不断从鲁迅探讨研究，分析鲁迅的代表时代的前后变化，广泛披览他的作品，当面询问经过。”^①这样的探讨和询问，为一般研究者所缺乏，当然更加深了他对鲁迅的认识，帮助他获得正确的结论。

因此，《序言》问世之后，有力地回击了敌人对鲁迅的污蔑，纠正了朋友和同志对鲁迅的误解。鲁迅本人就是首肯的。他对冯雪峰说：“分析是对的，以前就没有人这样批评过。”^②曹靖华在《片言只语话当年》^③中也生动描写过《序言》发表后引起的震动。茅盾更明确指出它“对于当时的文艺界起了非常大的指导作用。”^④并且在此以后，保持着久远的影响。历年中不少有一定权威性的人士，不断引证《序言》的观点并深表赞同，有的还把它作为自己研究的基本出发点^⑤。

当然，后来毛泽东对鲁迅作了更深刻、更崇高的评价，毫无

① 《秋白同志和鲁迅相处的時候》，1959年《语文学习》6月号。

② 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132页。

③ 载1959年5月4日《人民日报》。

④ 《纪念秋白同志，学习秋白同志》，1955年6月18日《人民日报》。

⑤ 参看艾思奇：《民族的思想上的战士——鲁迅先生》（1937年，载《鲁迅研究》），雪峰：《关于艺术大众化——答大风社》（1940年，载《鲁迅及其他》），胡绳：《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1948年，载《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集汇编》第一集），巴人：《鲁迅是怎样描写人物的》（1950年，载《文学初步》），李何林：《五四时代新文学所受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1951年，载《中国文学史研究》）及《五四时代文学作品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萌芽》（1954年，载同年5月4日《光明日报》），平心：《由进化论走向阶级论》（1956年，载《人民文豪鲁迅》），邵奎麟：《关于“五四”文学的历史评价问题》（1959年，载同年《人民文学》5月号）。

疑义地给予研究者们以更重要的指导。但是《序言》并未从此失去它的意义，因为它与毛泽东的评价并无矛盾。毛泽东的评价是概括的，《序言》在深刻性上虽有所不及，却有着具体的分析。周恩来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写的《我要说的话》^①一文中，为了说明鲁迅的思想发展和革命功绩，就不仅引用了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评价，而且三次引用了《序言》里的论述。在此期间，曹靖华曾与周恩来谈到《序言》，认为“论鲁迅先生的文章，在思想和艺术性上，能赶上瞿秋白同志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还没有。周恩来同志就接着说：‘我有同感’。”^②这里，曹靖华还提到了《序言》的“艺术性”。确实，《序言》与一般的论文不同，它纵意而谈，滔滔雄辩，又形象性强（富于比喻和象征），感情充溢，具有与鲁迅杂文相类似的“文艺性论文”的色彩，充分地传达出了瞿秋白的无产阶级革命激情、对鲁迅的深厚感情，和锐利的战斗锋芒，以至令人觉得“简直是一首散文诗”^③。而这种特有的论述风格，正是与瞿秋白对鲁迅具有真知灼见是分不开的。

但是，同许多早有定评的优秀文献一样，《序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了粗暴的否定。特别是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出现了不少专门批判《序言》的文章，甚至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还余波未息。这些文章在当时形而上学风气影响下，抓住个别词句，或从一些抽象的概念出发，指责它以唯心主义观点贬低了鲁迅思想的革命内容，延缓了鲁迅世界观转变的时间，抹煞了马克思主义对鲁迅思想发展的作用，等等。也就是说，它们根本否定了瞿秋白对鲁迅的评价的正确性。这些评论，与《序言》的实际相去是何等遥远，是多么不公正啊！他们采取的，也是一

① 1941年1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

② 曹靖华：《往事漫忆——鲁迅与瞿秋白》，1980年3月26日《光明日报》。

③ 师陀：《回忆〈鲁迅杂感选集〉》，1980年7月《读书》第7期。

种“‘空城计’式的夸张”。

一九七九年，随着思想政治上的拨乱反正，随着实事求是原则的恢复和学术民主风气的形成，这些文章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一些同志的反驳。不过“文革”期间的影响并未就此完全消除，有的文章仍然如此这般地指摘《序言》对鲁迅的基本评价是不正确的。如这年年底发表的《通达彼岸的“桥梁”——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①一篇长文(以下简称《桥梁》)，就认为《序言》的研究，“比较重视本本主义，不太重视社会实践”，“反映出瞿秋白对鲁迅认识不足”，实际上还是提出过去那些批判文章所说的用唯心主义观点贬低鲁迅的老问题。因此，本文在下面不得不对这篇文章的具体论点，提出辨正。

论鲁迅前期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所谓“本本主义”，其主要根据，是说《序言》不注意鲁迅“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政治思想和立场”，没有“用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来概括”鲁迅的前期思想，而“随意采用其他的概念，如进化论和个性主义之类”。

瞿秋白是否不注意鲁迅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呢？是否没有指出鲁迅前期思想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呢？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如前所述，他并未用进化论和个性主义来概括鲁迅前期思想的全部。《序言》在谈论进化论和个性主义的同时，十分明确地阐述了鲁迅民主主义政治立场的形成和发展。他指出，鲁迅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成为“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的。另一处，还更清楚地表达为“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绅士阶级的贰臣”。这

^① 1979年12月《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

就是指他背叛了封建阶级，站到了民主主义的立场。文章一开始就借一个希腊神话为喻，指出了鲁迅前期思想的社会根源和阶级基础。他说，鲁迅“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接触了农民，受到了农民群众思想感情的影响，“和农民群众有比较巩固的联系”，从而获得了他们的“野兽性”。这种“野兽性”，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反抗要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里言简意赅地指出：“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①。鲁迅就是较早懂得农民的政治要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如果说，指出这一点还不够，还没有反映出“现实斗争对于一个革命者的决定性影响”，那么，瞿秋白之后有更明确的论述。他将鲁迅前期所处的时代科学地划分为三个时期：辛亥革命以前，辛亥革命至五四时期，以及五四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他紧密结合每个时期现实斗争的情状，阶级关系的变动，说明了鲁迅当时所取的政治立场和态度。青年时代的鲁迅，置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漩涡，撰文揭露“竞言武事”的洋务派和提倡“制造商估立宪国会”的改良派真面目，主张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表现出彻底的革命派立场和远见卓识。在五四时期，他经历了思想界的第一次大分化，参加五四“思想革命”，并在运动中与改良主义者胡适等人划清了界限，“站在革命主义方面”。从五四到“五卅”前后，他更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以及胡适等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进行了激烈斗争，并在一九二七年“暴风雨的剧变”后实现了思想飞跃。这一切，不是在叙述鲁迅的“政治实践”吗？不是在实质上揭示了现实斗争对鲁迅思想的影响，揭示了鲁迅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立场和态度吗？瞿秋白虽然没有象我们今天这样用“革命民主主义”来概括这一切，但今天作这样概括的同志，在具体论证时，不是常常进行着相同的叙述和分

① 《毛泽东选集》第976页。

析吗？抓住他没有用“革命民主主义”的名词，抓住他在谈到进化论和个性主义时恰恰使用了“基本”这个字眼，来指责他不重视实践这个“基本”，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序言》对于鲁迅的“进化论和个性主义之类”，正是在阐明前期鲁迅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立场和态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不应当把这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进化论和个性主义”，实际上是瞿秋白对鲁迅前期哲学观点方面的概括，特别是对他的社会历史观的概括。对于鲁迅这样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仅仅叙述他的政治立场、态度和社会革命论思想是不够的，太空泛的，的确有必要剖析他所运用的哲学思想武器。这种剖析是研究深入的表现，而决不能以此反证这是“不重视政治实践”对他的思想的决定作用。

那么，瞿秋白用进化论和个性主义来概括鲁迅前期的哲学观点，是否正确呢？

瞿秋白并没有把鲁迅的“个性主义”与“本本”上的尼采学说等量齐观。他是结合当时的阶级关系和鲁迅的政治实践来进行分析的。他说，鲁迅的个性主义，是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汲取了尼采学说某些方面并加以改造而形成的思想。它和尼采学说本质不同，目的不同。尼采学说本身，“在欧洲已经是资产阶级反动的反映”。在那里鼓吹这种学说，目的在于“抵制新兴阶级的群众的集体的进取和改革”。鲁迅的“个性主义”，“固然”“是一般的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性的幻想”，过多地看到了本来应当与之结合的“民众的落后”，低估了他们的觉悟，在哲学上属于唯心主义。“可是，鲁迅在当时的倾向尼采主义，却反映着别一种社会关系。”就是说，在近代中国，由于“城市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巨大的自觉的政治力量，而农村的农民群众只有自发的不自觉的反抗斗争”，又由于统治阶级对小资产阶级“市

佞”施行“奴才主义”的思想灌输，因此，个性主义“这种发展个性，思想自由，打破传统的呼声，客观上在当时还有相当的革命意义。”它在本质上，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揭露只提倡“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不重视发扬人的精神作用的改良派思想武器。鲁迅运用这一思想武器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个性解放，使人民群众逐渐觉醒起来，以推翻封建传统的重压。瞿秋白对鲁迅个性主义的这种密切结合社会阶级斗争实际的简要而深刻的分析，实际上已成为后来许多人的共同看法。

瞿秋白用进化论来概括鲁迅前期的哲学观点，也不是如《桥梁》一文所认为的，意味着否定有朴素的阶级观点的存在。瞿秋白指出“鲁迅在‘五四’前的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以后，紧接着就说：“可是，不久他就渐渐了解到封建的等级制度和中国社会里的层层压榨。一九二四——二五年，他的《春末闲谈》，《灯下漫笔》，《杂忆》（《坟》），以及整部的《华盖集》，尤其是一九二六年的《华盖集续编》，都包含着猛烈的攻击阶级统治的火焰。”十分清楚，瞿秋白说“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主要是指鲁迅在“五四前”的哲学思想，即现在不少同志称做“早期”（从“前期”中划出来）时的思想；而五四以后，则“渐渐了解封建等级制度和中国社会里的层层压榨”，亦即产生朴素的阶级观点了。他接着还进一步阐述了鲁迅在与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斗争中，不是把他们只看作个别的人，而把他们看作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帮凶，看作他们的“意识代表”；论述了鲁迅在斗争实践中，领悟到不应当再用请愿那样的和平的方式，而须进行“别种方法的战斗”，等等。显然，瞿秋白说“进化论”，主要是指鲁迅早期的哲学思想，对于他五四以后的思想，则恰恰强调指出它已具有朴素的阶级观点。

至于鲁迅的进化论本身，《桥梁》以相当长的一段文字，来阐

述“鲁迅的进化论既不是庸俗进化论、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也不是原封不动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这是缺乏针对性的。因为瞿秋白本没有把鲁迅的进化论说成是以上三者。瞿秋白指出，鲁迅的进化论针对着“僵尸”般的封建旧文化旧道德，召唤人们“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明显地表现出在斗争中求发展的思想。众所周知，按照“原封不动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观念，是只有渐变，没有飞跃的；庸俗进化论把这种观念搬到社会科学领域，认为人类社会也是这样缓慢前进，不会产生激烈的革命斗争；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搬运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物竞”、“天择”的说法，制造了“优胜劣败”的谬论。瞿秋白强调了鲁迅的进化论中主张斗争的思想，足见没有把它与这三者混淆起来。此外，瞿秋白还认为鲁迅在接受和运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发展观点时，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身体力行。鲁迅认为青年必胜于老人，将来必胜于过去，他就不愿自居为青年的导师，而甘愿“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为将来和大众做牺牲。瞿秋白非常重视鲁迅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以至把这段话引录在《序言》正文之前。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也不可能从上述三者中引申出来。

在谈到鲁迅前期杂文时，《桥樑》一文认为瞿秋白称它们“不是社会科学的论文，这只是直感的生活经验”，“未免低估了它们的思想意义”。过去有一些文章，也曾称之为“直觉论”而加以批判。但是我们如果顾及全文，会懂得瞿秋白的这句话，首先在于说明鲁迅杂文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论文，而是充满感性形象的“文艺性论文”，包含着从实际生活中得来的感受和经验，更能启人思考，移人性情。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比之于鲁迅运用辩证法分析问题的后期杂文，这时的杂文中感性的东西确实较

多一些，有的地方带有某种片面性。就此而言，这种说法也是反映了一定的实际情况的。

紧接着，《桥樑》又令人感到突然地谈到一个不大相关联的问题：它说瞿秋白在论述“五卅”时期时，只强调鲁迅所说“中国有枪阶级的焚掠平民，却向来不很有人抗议”，表明瞿秋白对鲁迅的反帝精神“不予重视”，而这也“就是忽视鲁迅所代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反帝性格，忽视了他作为无产阶级文化生力军伟大旗手的一个主要特点。”这一严重的指责，更令人惊奇。因为瞿秋白在引述这句话之前是这样说的：当时一般革命者只注意反帝，而鲁迅提出了“国内阶级战争”这“更加严重的问题”。这是为了说明鲁迅在这时期阶级斗争观念的发展和深化，哪有忽视鲁迅反帝精神的意思呢？瞿秋白在引述那句话之后，又明明说：“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就必须打倒这些阴毒‘东西’”！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在旧中国，反帝反封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墙脚。瞿秋白为了说明鲁迅阶级观点的深化，而强调他在反帝时注意反封建，这有什么可指责的呢？《桥樑》作这个指责的根据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一段著名的评价，但是，如果按照《桥樑》的逻辑，那么，毛泽东似乎只讲鲁迅的反帝“性格”、“代表全民族”、是“民族英雄”、其方向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岂不是忽视了鲁迅的反封建精神和阶级斗争观念，成为更大的问题了吗？

综上所述，可见瞿秋白是立足于现实斗争，阐明了鲁迅前期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哲学观点的。他认为鲁迅前期哲学观点主导的东西是在斗争实践中经过改造的个性主义和进化论，又说明了鲁迅在五四以后不断增长着阶级观点。瞿秋白对鲁迅前期思想的分析，对它的革命内容的估计，是基本正确的。

论鲁迅世界观的转变

延缓鲁迅世界观转变的时间，曾经是过去许多批判《序言》的文章的共同指责。《桥樑》一文重复了这一指责。它说瞿秋白把鲁迅“新思想的产生，推迟到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不知什么时间。”这究竟是否符合事实呢？瞿秋白写道：“鲁迅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就是以后的《三闲集》（一九二八——二九），《二心集》（一九三〇——三一）又何尝不是哭笑不得的‘而已’！可是，正是这期间鲁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彷徨和愤激，他才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瞿秋白明明白白说是在“这期间”，即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作《二心集》时，“最终”完成转变的。而且在下文，概括鲁迅思想转变之前，又特别引录了鲁迅《三闲集·序言》中关于一九二八年学习了“科学底文艺论”（即马克思主义文艺论——引者）而“救正”了“进化论的偏颇”那段话，无疑是为了说明这是鲁迅思想转变的关节点。《桥樑》指责瞿秋白把鲁迅世界观的转变“推迟到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不知什么时间”，仅仅是因为瞿秋白说这期间的鲁迅杂文“反映着”“彷徨和愤激”，而“‘彷徨’和‘愤激’显然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但是，一个人一旦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不会“愤激”，不会“彷徨”了吗？何况《桥樑》一文自己也说，当时鲁迅还是在向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瞿秋白之所以这样说，不过为了强调，鲁迅是在现实的血淋淋的阶级斗争刺激和教育下学习马克思主义，实现世界观的转变的。

除了上述种种简单化的指责之外，《桥樑》提出了一个实质性问题，即认为瞿秋白“看不到鲁迅在这场斗争（按：指“五四”

运动——引者)中接受‘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的深刻影响”。但该文看到的东⻄，是否确实存在呢？它认为鲁迅前期受到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的根据，一是鲁迅在一九一九年写了《“来了”》和《“圣武”》两篇随感录^①，“清楚地表明鲁迅的世界观已经开始滋生无产阶级思想的新因素”；二是一九二五年前后“在革命途径问题上，鲁迅已经开始批判‘任个人’、‘张灵明’”，“在对青年的看法上，已经突破了‘青年必胜于老人’的进化论的旧观念”，表明他“接受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论的深刻影响。”这两个判断，是站不住的。《“来了”》和《“圣武”》这两篇互为补充的随感录，其实是鲁迅“拊物质而张灵明”的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反映。《“来了”》的主旨，是慨叹“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只要听见有什么新的事物来了，统治者尚未弄清，就严加防范，老百姓也未弄清，而“纷纷乱逃”；《“圣武”》则再一次指出“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统治者只崇拜“两种物质——是刀与火”，即“圣武”；只贪求“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结果使人们永远只“看见物质的闪光”。鲁迅在这两篇杂感里既愤慨于封建统治者的崇尚反革命暴力、贪求物质享受和压制思想自由，也不满于我国群众精神上的落后状态(当然估计过低)。而在他看来，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新的外来思想，能振奋人民的精神，也就是他早期的《破恶声论》^②中所说的，能唤起人民的“心声”和“内曜”；在他看来，“别国的人民”即俄国的人民是“有主义的人民”，十月革命借这个“主义”与压迫者的“刀与火”搏斗，是值得赞颂，应当拥护和欢迎的。但是，他这时还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的内容和意义，还是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看成和很多外来思想一样，“总不

① 见《热风》，《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见《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并没有把它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学说区别开来。至于到了一九二五年前后，鲁迅的个性主义和进化论思想确实有所突破，但是新产生的还是朴素的阶级观点，它来自斗争实际中的经验，也并非由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论的深刻影响”。

鲁迅对于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来对待的。他当然阅读了一些有关的书籍文章，但还没有作认真的研究。例如五四时期鲁迅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李大钊，“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①，直到一九二六年，他在给未名的信中还说：“我们倒也并不是看见社会主义四个字就吓得两眼朝天，口吐白沫，只是没有研究过”^②。他后来又回顾说，当时，“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③。确实，鲁迅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在种种事实的启示下，在大量地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之后，才真正树立的。而他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如瞿秋白所明确指出，是在一九二八年和创造社展开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之时。这一点现在已为大家所公认。

瞿秋白在关于鲁迅思想发展的全部论述中，包括谈到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时，都十分重视他的实事求是精神。瞿秋白指出，这种精神最初来自农民的求实精神的影响，尔后发展为贯串一生的战斗传统。这是鲁迅的一个可贵之处。所以瞿秋白最后在总结鲁迅精神的特点时，首先提出的一条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作为归结的一条是“反虚伪的精神”。瞿秋白还将鲁迅与后来一些参

① 《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鲁迅全集》第4卷，第524—525页。

② 《集外集·通讯》，《鲁迅全集》第7卷，第109页。

③ 《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鲁迅全集》第6卷，第18页。

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较，说“他们和农村的联系更稀薄了，他们没有前一辈的黎明期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也可以说是老实的农民的实事求是精神”。的确，有一些人阅读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籍以后，立即以为理解，表示深信，宣布自己已经掌握，但其实以后思想上常常反复，甚至叛变。鲁迅不是这样。鲁迅是根据广泛的社会实践的结果，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来进行判断的。他在走向共产主义者的道路上，似乎略嫌缓慢，然而步子扎实。但也正因为这样，他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对马列主义理解透彻，信仰坚定，运用自如。瞿秋白实在并未“贬低”鲁迅，他只是无意“拔高”。而一些“拔高”、神化鲁迅的同志，却有意无意地歪曲了鲁迅，忽视了鲁迅精神的重要特点和战斗传统。

自然，我并不是说，《序言》的鲁迅论，已经完美无缺，是天经地义，不能触动，不可逾越。今天的一些研究者已有和必将有更细致深入的研究。但就《序言》遵循实事求是的，即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原则而言，它是矗立在鲁迅研究领域里的第一块正确的路标，是永远值得珍惜的丰碑。

瞿秋白的家世及其他

关于瞿秋白的家世，瞿秋白本人在《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以及《多余的话》里，曾多处提及，但都语焉不详。他牺牲以后，有关回忆录、专著和年谱，作了不少介绍；近几年来，涉及更多。其中有的自然是言之有据，翔实可靠的；但有的方面，由于第一手文字资料太少，常有错讹，或者因为知者寥寥，还是空白。与之相联系，瞿秋白幼年、少年时期的经历，也有一些不确切的说法，尚在流传。

瞿秋白的家世和他幼、少年时期的经历，与瞿秋白后来的社会活动和思想发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是应当重视的。本文将对笔者所认为是不正确和不确切的记述，以及一些未曾接触的问题，作力所能及的辨正和补充，并以此为重点，对瞿秋白的家世作比较系统的叙述。

需要说明，瞿秋白的祖上和家庭，属于封建士大夫阶层，其中许多人和事，自然是不值得肯定的。然而我将如实叙述。这并不会有益于先烈。瞿秋白后来背叛了自己生身的阶级，并且带动家庭的一些成员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恰恰能够说明，瞿秋白勇于否定旧我，同着时代前进的革命精神是何等强盛，何等可贵。

本文除参考较为可靠的资料、访问瞿秋白一些亲友以外，主要的依据，是两个方面的：

一，我母亲瞿秩群（瞿秋白的妹妹）的回忆。在她一九八一年十月去世以前，我曾帮助她一起反复追忆、核对和考辨有关事实，并随时作了记录。这些记录，后来还得到有关方面的印证。过去有的同志记载的一些情况，原是出自我母亲的口述，但辗转相传，发生了差误。

二，经瞿世琥（瞿秋白的大伯父）细心校阅并作了补充的《瞿氏宗谱》（共十册）。这部《瞿氏宗谱》是民国癸丑年（一九一三年）重修印行的，为第六次修订，称“瞿氏六修宗谱”。其中“城西世系”，写到“第十六世”即瞿秋白的一代（瞿秋白家属于老二房一支内四房）。瞿世琥在他弃官闲居之后，对这部宗谱作了校阅和补写。其中有的是用毛笔写在大小不一的八行纸上，零散地夹在册子内；有的直接书写在有关书页上。内容大致有二：一、将瞿氏世系支派，列成图表，使观者一目了然，便于查检；二、补充了他自己一代（瞿氏武进城西世系第十五世）诸人的一些经历，和瞿秋白一代（第十六世）的一些缺漏，还续记了当时已出生的第十七世的几个幼者的名字。

始祖和原籍

解放初，有一本油印流传的瞿秋白年谱说：瞿氏家为明末抗清之瞿式耜之后裔，明末自宜兴迁常州。一九八一年一份公开发表的《瞿秋白年谱》中也说：“瞿秋白本南明抗清将领瞿忠宣公式耜之后裔，瞿氏原籍宛平，清初迁江南，遂为常州世族。”^①此外，还有一些文章、资料，也有类似说法。据我所知，这些关于瞿秋白始祖和原籍的说法，来自瞿秋白友人的口头介绍。其实是不确

^① 1981年《艺坛》（季刊）第1期，第63页。

切的。

关于武进瞿氏既瞿秋白所属一支的始祖，《瞿氏宗谱》第十册卷二十二《远宗略》的《弁言》有这样明确的概述：瞿氏“于东晋光禄公，讳昉，始显。于湖北黄梅县，传耀、震、庆、万十三四支，遂为各支始祖。我祖斯馨公，则由宜兴中准渚分支，为庆之后，而庆之子保三公，则由常熟迁宜兴之始祖也。”（标点为引者所加——下同。）《弁言》之后的《远宗世表》、《本宗世表》，还记载了各支系的历代名字、官职和移居情况。

根据《远宗略》，武进瞿氏支系和其他支系的情况如下：瞿氏的始祖，最远可追溯到东晋的瞿昉（住湖北黄梅）。昉生子四人：耀，震，庆，万十三。其中耀和震两支，《远宗世表》注明“后未详”。庆和万十三兄弟，于宋末同由黄梅迁至苏州府常熟县。然后，弟万十三一直居住常熟；庆之子保三则由常熟迁至宜兴之中准渚。到明成化三年，保三的玄孙兰（即《弁言》所说的斯馨公，从昉算起为第六世），由宜兴迁到常州府武进县，被称为瞿氏武进始祖，武进第一世。因此，在《本宗世表》中，昉被称为本宗始祖，兰被称为本宗武进始祖。瞿秋白这一代，从兰算起，为第十六世。

而瞿式耜，属于以万十三为始祖的常熟一支，称常熟支系。这两支当然是有关系的，其关系就是同出于东晋时的瞿昉；但显然不能说瞿式耜是瞿秋白的始祖。

关于瞿式耜的记载，宗谱里只有两处。一是《远宗略》之《远宗世表》中式耜名下的简述，一是宗谱第一册卷一中的《题雁公原序》（按：为“二修谱”序之一，题雁为武进瞿氏第八世）里略有提及。《远宗世表》的一段简述如下：“式耜，汝说子，字稼轩。万历乙卯丙辰联捷进士，由知县历升科道应天府府丞，广西巡抚，吏、兵二部尚书，大学士。殉节广西，谥忠宣，聚邵氏，生四子。”《题雁公原序》则是在略述“瞿氏宗派”的文名武功时提到瞿式耜的。题雁在颂

扬其曾祖父芝逵（名士达）时说到，“式耜前乙卯丙辰与曾大父乡会试皆同榜。其殉节粤西时，作浩气吟，今伏读之，犹凛凛有生气。”想来武进瞿氏一支的后人，一定是以瞿式耜为荣，于是笼统地称之为始祖了

《宗谱》第一册卷一所载“初修谱”的一篇《原序》，认为“凡谱远引前代，附会名流”，是一个通病，很有点道理。我们今天研究瞿秋白，更当如此。瞿式耜是我国明末清初一位坚持抗清的著名人物，但他确不是武进瞿氏的始祖。瞿秋白自有其自身的地位和价值，正不必“附会名流”的。

至于所谓“原籍宛平”，更加错误。我们上面叙述了武进瞿氏的始祖及其迁移情况之后，就知其非。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传呢？我在翻阅宗谱第九册卷十二的《赧甫公行述》时，发现了它的原由。赧甫名廷韶，是瞿秋白的叔祖，这篇行述，为张之洞所写。其中说：“府君姓瞿氏，讳廷韶，字赧甫，一字舜石，世为江苏武进人，寄籍顺天宛平县。……先大父有子二人（另一子即瞿秋白的祖父廷仪——引者），府君其仲子也。道光戊戌生于京都，寄籍。”这就是说，瞿秋白的叔祖瞿赧甫是生于宛平而寄籍宛平的，宛平即京都（北京）。瞿秋白的一家与他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瞿秋白的父亲七岁时，祖父廷仪去世，秋白一家就寄居在赧甫官署里（赧甫当时在湖北做官）。但说瞿秋白原籍宛平，是一错再错的。赧甫只不过生于宛平罢了，“寄籍”，在当时是只要住满六个月便可取得的，决非原籍；何况叔祖又非祖父，他的“寄籍”，更与瞿秋白的“原籍”无干。

既谈到瞿秋白的籍贯，顺带再作一些辨析。现在大多数文章在介绍瞿秋白时，都称他是“江苏常州人”。这个说法比较宽泛，不甚确切。确切地说，应是“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他的原籍为武进，见于宗谱，已如上述；直到秋白成人，家庭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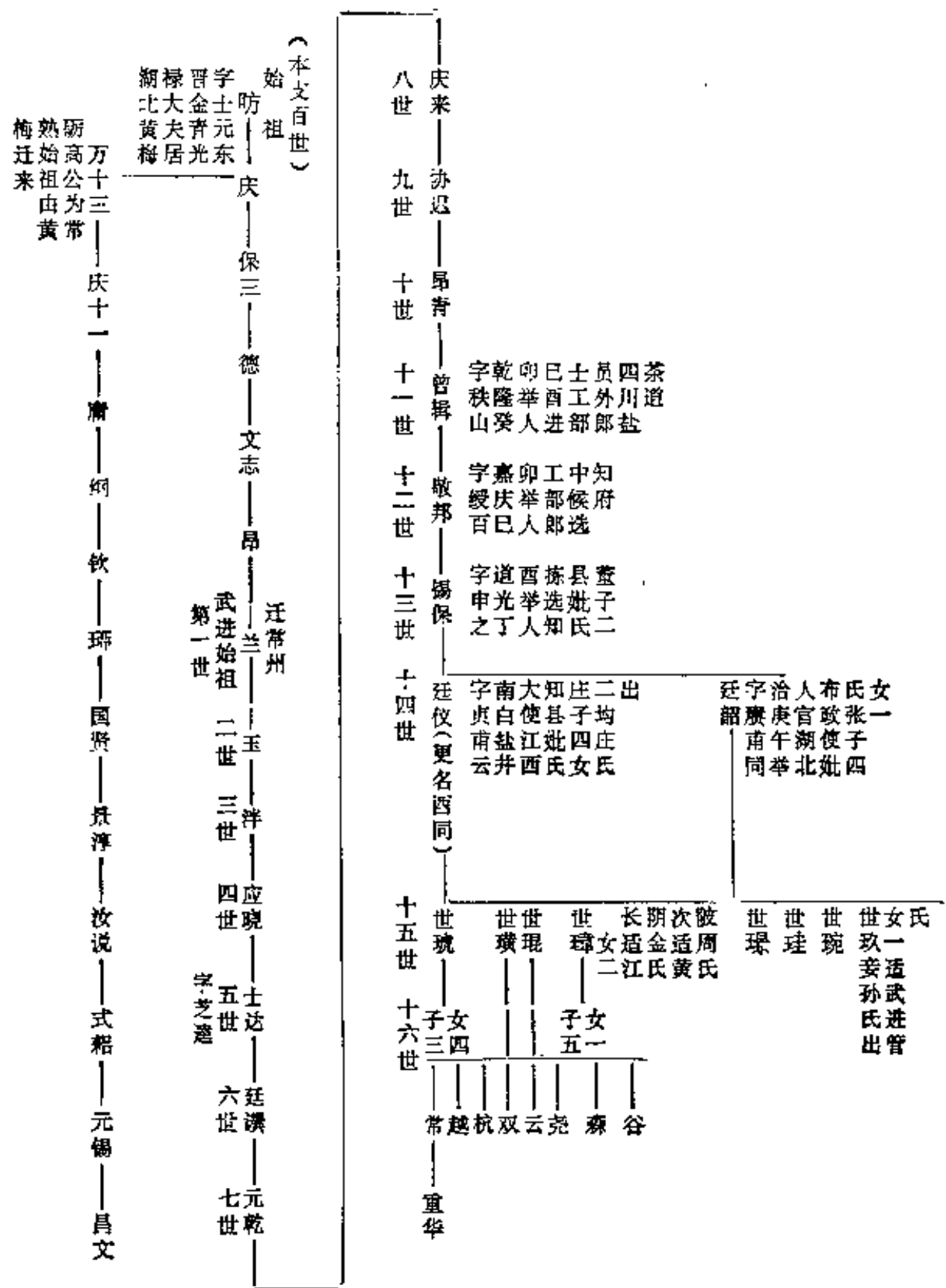
也主要属武进县。当然，武进县在明清两朝，都隶属于常州府。如清雍正以后直至民国初，常州府辖武进、阳湖、无锡、金匱、宜兴、荆溪、江阴、靖江八县。但这也说明，称武进瞿氏为常州人，有如称某一无锡人或宜兴人或江阴人为常州人，太过宽泛。

这里还需说明，瞿秋白同支的人，如瞿世琥的后人，有时又是自称为阳湖人的。这是因为，清雍正至民国初，从武进县分出阳湖县。分界线是今常州市的西庙沟。西庙沟以东为阳湖，以西为武进。而瞿秋白的家庭具体地址，从清末至民国初的一段时间里，有过三次变动，即住过四个地方。瞿秋白一八九九年出生时，住青果巷八十六号八桂堂（八桂堂是叔祖虞甫的房子）；约一九〇〇年，搬至八桂堂对面的乌衣桥。八桂堂和乌衣桥，就都属于阳湖县。在乌衣桥住了几个月后，迁到西门织机坊星聚堂的九皋楼（星聚堂是瞿秋白祖母的娘家的房子，瞿秋白就曾在设于星聚堂内的私塾读书）；约一九一一年或一九一二年初，为免付房租，搬到城西瞿氏宗祠（实为叔祖虞甫的专祠，因而才可搬入，宗谱《城西世考》就有叔祖“捐巨资建西祠”的记载）。星聚堂和宗祠，则是属于武进县了。不过到了民国初年，阳湖县重又併入了武进县。所以籍贯武进，还是最恰当的说法。

世 系

为了使读者易于弄清武进瞿氏一支和瞿式耜所属的常熟瞿氏一支的关系，也为了综合说明瞿秋白的祖上、父辈及其弟妹的简况，我现在将瞿世琥夹于宗谱内的一张图表抄录如下，并作一些解释。

(本文百世)



瞿世琥的这张表，是以宗谱中的《城西世系》、《城西世考》及一些《家传》、《行述》为依据的。

从这张表可以看到，武进瞿氏，至少自十一世以降，直至十四世（即秋白的祖父、叔祖），都读书做官。第十五世的世琥，也曾任知县、知事，不过他本人在这里没有注出。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说：“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作官”。这张表正具体说明了瞿秋白这句话。

下面，再具体说明瞿秋白以上三代的情况。

祖父廷仪，又名酉同，字贞甫。他有“国学生、兼袭云骑尉、同知衔江西候补知县、云南白盐井大使”等虚衔。实际上，选白盐井大使而未赴任，分发江西，“得厘一次，而赋闲四年”；不久，于光绪壬午正月二十三日（一八八二年二月十九日）卒。（据《家传·庄太恭人传》）当时，秋白的父亲世玮年仅七岁。祖母庄氏，是道光庚子举人直隶大名等县知县庄士全（字心蕙）的长女。她长期由世玮夫妇侍奉，一九〇七年起因中风偏瘫，约于一九一三年由世琥接至杭州居住。民国四年九月（一九一五年九月）卒。这部世琥收藏的《家传》部分后的空白处，有一篇用毛笔誊录的缪荃孙所撰的《庄太恭人传》，是他人收藏的宗谱所没有的。（缪荃孙是庄氏表弟，世琥表叔，他是应世琥请求而撰的，文末署：“赐进士出身、国史馆提调、纪名道府、翰林院编修愚表弟缪荃孙谨撰。”）

叔祖廷韶，字赓甫，号舜石。《城西世考》在其简介中称赞他“天性孝友，胞兄堂弟故后，恤其孤寡，婚嫁教养，引为己任。”这些不是虚辞。其胞兄即秋白祖父廷仪去世后，他确实担当起了庄氏及其四子二女的经济开支和教养的责任。

廷韶先是在直隶（今河北、内蒙、辽宁的部分地区）和河南做官。同治庚午（一八七〇年）入都应试，为庚午科顺天乡试中

式举人，同年赴湖北。以后三十余年一直在湖北做官，官至湖北按察使、湖北布政使，于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四（一九〇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病故。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说：“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赓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以虚岁算，当时赓甫确正在湖北布政使任上；至于死时正署理湖北巡抚，则不见于记载。此外，这里叔祖的名字，是写错了的。（我见到的《多余的话》的几种翻印本都如此。这很可能是瞿秋白记错了，也可能出于最初誊录或排印的错误。顺便说说，周君适的《瞿秋白同志在黄陂》^①一文中，则误以为廷韶是秋白的祖父。）在宗谱里，除《城西世考》里有关于赓甫的简介外，在行述部分，还有张之洞受其子孙请托而撰写的篇幅颇长的《赓甫公行述》。（张之洞，字孝达，瞿赓甫任湖北布政使时，他是两湖总督。）

瞿秋白的父辈，包括祖父贞甫的四子二女和叔祖赓甫的四子，即秋白的伯父、父亲、叔父共八人，及姑母两人。

在这一辈中，贞甫的长子世琥（其实世琥之前，庄氏还生有一子，名世泉，但幼时夭折，故宗谱上无名，仅在《庄太恭人传》里提到），又名世璋，字薛斋，与秋白一家关系最为密切。世琥是嫡亲的大伯父，但因为赓甫的前三个儿子世璟、世珪、世琬，比世琥年长，所以世琥行一又行四，秋白及其弟妹称之四伯父。秋白写于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的《饿乡纪程》中说：“从我母亲去世之后，一家星散，东飘西零，我兄弟三个住在北京，还有两弟一妹住在杭州四伯父跟前”。关于世琥本人，秋白又说：“四伯做官几十年，清风两袖，现时中国官场，更于他不适宜，而在中国大家庭制度之下，又不得不养育全家，因此生活艰难得很。”^②当初，秋白祖父贞甫死

^① 1981年7月《山花》第7期。

^② 《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0月版，第8页。

后，叔祖虞甫表示除负担胞兄一家经济开支外，要培植侄子一人，也只有力量培植一人。他选定作为贞甫长子的世琥。因而在秋白的亲伯父中，只有世琥一人做了官，做了几十年。他先历任浙江桐乡、山阴、常山、长兴、黄岩、嵊县等县知县；民国后任江苏丹阳、泰兴知事（据《城西世考》中世琥本人亲笔添改的简介）。他不善钻营，因而从未升迁。约一九一二年，世琥在泰兴任知事时，一个师爷（武进人）偷盖印章放走一名在押的强盗，上司追查世琥的责任，被罢去知事，改任沙田局长，俸薪每月只一百元。世琥不谙此道，不久就弃官赋闲，寓居浙江杭州。晚年只在钱塘尹衙门做过一次书办的小官吏，经济十分拮据。秋白的两弟一妹，即景白、坚白和轶群，从一九二〇年起寄居在他家里，经济更见困难，不过外面还讲究一点排场。秋白一九二三年六月到杭州召集浙江省共产党和共青团员传达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期间，曾在世琥家里，与弟妹团聚。一九二五年春又到过杭州一次。他对四伯父世琥礼节周到，内心也是颇为尊重的。

世琥继室庄氏，是庄士全（字心蕙）的孙女，亦即祖母的姑侄女。又，前述星聚堂是祖母娘家房产，星聚堂周围几乎都是庄家的人。秋白在星聚堂内私塾就读时，塾师为庄怡亭。可见这一代的瞿家与庄家关系甚密。

世琥以下的世璜和世琨，即秋白另两个嫡亲伯父，称五伯父和六伯父。世璜早夭未娶，因而秋白为其嗣子。（世琥所作图表，在世璜名下画一竖线，与“双”相连，即是此意。“双”是秋白小名。）世琨字述侔，日本留学政法毕业生，湖南候补知县，曾充任法政学堂提调。他虽娶而无子，因而秋白二弟云白为其嗣子。当时世琨已患肺病死，所以云白实际上是六伯母费氏的嗣子，曾住六伯母的哥哥（六伯母的哥哥叫费赞舜）处。世琨以下，就是世玮，即秋白之父，行四又行七，下文再作具体介绍。

此外，世琥还有两个妹妹，即秋白的两个姑母。大姑母嫁江阴贤庄金翰如（广东按察使金逸亭之孙）。《饿乡纪程》中，秋白曾回忆幼时“环溪的清流禾稼”^①，“环溪”即在贤庄。二姑母嫁湖北黄陂周福孙（翰林院编修、山东巡抚周福陔之孙，一些资料将他的名字写成周复生）。《饿乡纪程》中，秋白说“到黄陂会见表兄周均量，诗词的研究更深入一层”^②，周均量（又名君亮）就是二姑母的长子。

叔祖麇甫的四个儿子，即秋白的堂伯父，前三个世璟、世珪、世琬，年长于世琥，称大伯父、二伯父、三伯父，与秋白一家来往不多，从略。麇甫第四子为侧室孙氏所生，名世玖，幼于秋白的父亲世玮，故称八叔叔。世玖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起任山东平原县知事，后世玮到山东，曾当过他的帐房以糊口。

以下再略说瞿秋白同辈的兄弟姊妹。

秋白和他的同胞弟妹，共有八人。世琥所画表上，在世玮名下注“子五女一”，是将早殇的一子一女略去了。现在的不少资料、文章，更将秋白弟妹的人数、名字及其排行弄得相当混乱。现顺次排列如下（开头是谱名）：

楸森（1899—1935）小名阿双、霜，即秋白，世玮长子。

鞅群（1900—1981）无谱名，小名群群、均均，世玮长女。

楸焱（1902—1964）小名阿耘，后改名昀白、云白，世玮次子。

楸鑫（早殇，生卒年不详）小名阿兴，世玮三子。

楸森（1906—1929）小名森，后改名景白，世玮四子。

楸焱（1909—？）小名阿尧，世玮五子。

红红（生卒年不详）世玮次女，三岁时即病死。

①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4页。

②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2页。

林毅（1913—1944）小名阿谷（按：“谷”不是“毅”的简体字），后名铨、坚白，又名徂白，世珪六子。

其中需要说明的是，林鑫是幼小时因失落书本，不敢回家，在野外过夜而得病死的。红红（小名）约三岁时患肺炎死。轶群幼时，家里为减轻负担，曾住江阴贤庄其舅舅金声倡处，九岁时回家；三年后又曾有一小段时间，去贤庄外祖父金心芑处居住和读书。还有，景白幼时鼻子上生疮，无钱医治，任其溃烂，终成塌鼻子。从这些情况，也可想见那时秋白一家经济的困窘。又，景白原名森，而有的资料（如《瞿秋白笔名印谱》）以为“森”是秋白的别名。此外，林珪自幼头脑迟钝，并有精神病现象，跟随父亲飘流到湖北、山东（其间也曾与秋白、云白住过北京），约二十余岁时死于山东。

秋白的堂兄弟，则有世珪的五子（其中两个早殇）。其中世珪长子名常，字纯伯、纯白，与秋白关系极为密切。（羊牧之《霜痕小集》^①中，将纯白说成是世珪之子，是记错了。）纯白是京师大学法文毕业生，历任南洋方言学堂、上海南洋大学、北京民国大学、清河陆军预备大学的教员。一九一七年，秋白到北京后，就住在纯白家里。当时纯白已在外交部门办事，家住东单东观音街草厂胡同二十八号。秋白在《饿乡纪程》中说：“在北京整整的住了四年，虽纯哥是按‘家族的旧道德’培植扶助我，我又被‘新时代的自由神’移易了心性，……到现在一切都已决定，纯哥亦就不说什么，勉励我到俄国后专门研究学问，不要半途而辍。”^②一九二三年秋白回国之初，仍住纯白家（时住东城大羊宜宾胡同）几个月，直到离京赴上海工作为止。瞿秋白对世珪和纯白父子及其一家，一直很有好感，并且是甚为感激的。

^① 1981年10月《党史资料丛刊》第3辑。

^②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5页。

父 母

瞿秋白的父亲世玮，字稚彬，贞甫幼子，光绪乙亥二月初六（一八七五年三月十三日）生。在宗谱上，他有“国学生、浙江候补盐大使”等虚衔，其实始终没有做过官，也无有职业。在兄弟中，他负侍奉母亲（秋白祖母庄氏）的责任，因而在家闲居。平日郁郁寡欢，沉默少言。少年时在废甫的湖北官署内住过一段时间，学过剑术之类。又善绘画，尤工山水，还懂得一点医道，能开一般药方。在思想上，他爱读老庄，信仰道教。卒于民国壬申仲夏五月十六日（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九日）。

世玮的山水画，据他的学生韩少婴《瞿世玮和〈秋山落叶图〉》^①一文说：“取法宋元，融会创新。郑午昶编的《中国画学全史·当代画家介绍》中，有他的传略。”世玮留下来的国画作品，除韩文介绍的常州博物馆珍藏的《秋山落叶图》外，笔者于一九七九年还在常州博物馆看到下列几幅：一幅画面是小山长河，河岸上有人拉纤，有人车水，还有一头水牛缓行；上题“庚午中秋傲张大风田家乐以赠廉如贤契清玩”，落款为“稚彬瞿世玮”，并有“世玮”印章。廉如不知为何人。另有一幅也赠廉如，画高山耸峙，山下有一草堂；上题“岁寒图庚午九秋写奉廉如贤契以贺齐眉之喜”，下署“瞿世玮”。再有一幅山水画，画面已忘，题词是“辛亥小春法耕烟为耐铭贤甥俗写山居图”，署“一禅瞿世玮”，盖“稚彬”印章。（耐铭下详。）此外，还有春、秋二幅屏条，一幅题“稚彬兴到之作”，另一幅盖“世玮”印章。秋白自幼受父亲熏陶，所以也善国画。

^① 1981年9月《文物天地》第5期。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出版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也有“瞿稚彬”的条目。但同页又另列了“瞿园初”一条（据《中国画学全史》），其实园初就是稚彬，而辞典没有说明。另外，辞典列有“瞿廷韶”一条，废甫也善绘画，倒是过去亲友未曾提及的，故抄录如下：“又字耕甫，号舜石，江苏武进人，宛平籍，同治九年（1870年）举人，官至湖北布政使。少与吴圣俞友。工书，古茂奇恣。雅擅刻印，边款署‘舜石治石’。偶工花卉果实，雅韵欲流，墨趣高致”（据《广印人传》、《毗陵画征录》）。

世玮还信仰道教，曾给子女留下很深的印象。上述“一禅”，即是他含有道教意味的别号。秋白等幼小时，常见他闭目端坐，不出一声，曾效仿为戏。世玮后来以“稚彬”为字，也与信仰道教有关。当时，常州一带有一个关于龚子彬的传说。传说如下：元朝至正年间，常州府一名主管刑事的师爷龚子彬，住在玄妙观。一天，出门回来时，已过中午，以为小婢尚未送饭，一怒之下，鞭打小婢，不意击中要害致死。然而后来却发现饭菜其实盖好放置架上。龚子彬深悔自己错怪，又因而想到天下这等冤事一定很多，自己平日办案当中，也何尝会没有？于是将全部案卷焚毁。这样，他两罪俱犯。常州刺史念其平日为人正直，从轻判为徒刑，流放云南。出东门时，遇见一老人。老人送他一支竹竿，嘱其闭目骑上。龚如所教，只觉耳畔风声甚急，刹那到达目的地。他离常州前，随身带有常州刺史（云南人）给父母的家书，云南官员见家书上所署日期，极为诧异，龚如实告之，竟被立即放回。龚仍骑竹竿返常州。临行时在云南折了一枝红梅，到常州后到玄妙观前插活，因而后有“红梅阁”。龚后即仙去，称为紫阳真人。世玮信仰道教，就称“稚彬”，“稚”是小的意思，谓其为子彬后辈也。据羊牧之先生告诉笔者：瞿秋白一九二五年与他同在上海时，曾将

世玮寄自济南的一封信给他看，信有三、四页纸，尽是道家用语，看不懂。秋白笑着说，我们父子两人，是各走各的路的。羊牧之先生在《我所知道的瞿秋白》^①中还写道：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时，“我知道他学画于他的父亲，学金石于他的六伯父，殊不知他反感地说：我父亲画是好的，但一生无益于社会，太没价值。”对于羊牧之先生这些回忆，我母亲瞿铁群认为是可信的，并证之以其他材料。瞿秋白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持这种态度和看法，也是十分自然的。

世玮一生经历大致如下：一九一三年以前在家闲居，一九一三年带着第五子阿尧往湖北黄陂周福孙（秋白二姑夫）家做帐房。一九一六年秋白的母亲死后不久，又带阿尧离鄂往山东平原县世玖（秋白的八叔，世玮堂弟，赓甫侧室孙氏所生）处做帐房。当时世玖是平原县知事。后来世玖因“官亏”逃走，上司就把世玮扣留下来。过了一段时间，此事不了了之，放了世玮。世玮从此更加心灰意冷，不久流寓济南，终身未曾返常。他是约在一九二〇年到济南一个朋友王璞生（江苏人，曾任山东乐陵县知事）家居住的。瞿秋白《记忆中的日期》中说“一九一六年，是年父亲赴济南，”大约他不知道父亲初到山东时在平原县世玖处做事一段经历。其他不少有关资料和瞿秋白年谱中说于一九一六年到山东“投奔朋友”，也是不对的。

一九二〇年后，世玮在济南，先后住悟善社、正宗坛等，常与道士交往，取别号圆初、园初。一九二〇年秋白动身赴俄之前，曾专程由北京去济南拜别父亲。他在《饿乡纪程》中写道：“大明湖畔小酒馆晚膳之后，我父亲的朋友同着我父亲和我，回到他家里去。父亲和我同榻，整整谈了半夜”^②。一九二二年，世玮到

^① 1979年11月《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

^②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8页。

山东美术学校任国画教师，曾作有《山水入门歌诀问答》。一九三二年卒于正宗坛，所立墓碑上刻“民国壬申仲夏五月十六日申时寿终”。下署珪、铨（铨即坚白）立。《文物天地》上韩文说世玮卒于一九三一年，而未引录墓碑，应是误记。

上述关于世玮在山东的经历，我曾于一九八二年择要写出，寄给韩少婴、胡纯浦、王凤年三位先生（三位都是瞿世玮在山东美术学校的学生），请他们补正。三位老人很快就有复信，很值得参考。现分别摘录如下。韩老的信中说：“瞿世玮老师在济南有十四年之久，我是一九三〇年时受业于瞿老师。还有胡纯浦是常州人，流寓山东的，那张《秋山落叶图》就是园初老师为胡的父亲所作。王凤年这个同学是哑巴，瞿老师曾作过他的家庭教师。瞿老师安葬于济南的第二公墓，很久就无人敢提。……一九六二年间，胡纯浦和王凤年在一个大雾迷天的冬日早晨，通过山东医学院（原齐鲁大学旧址）西墙和南郊宾馆觅到江苏第二公墓，坐南朝北，这里是人迹罕到的山径，碑碣纵横，位于千佛山麓与马鞍东麓之间的平原地带，南毗八里洼庄，费了很长时间，也没寻到。正欲走时，在梨树休息时，突然发现一石碑，上刻有‘先考稚彬公之墓’字样。他们两人这一发现是一大功绩。”至于世玮究竟卒于何年，信中没有提及。胡老和王老联名的复信中说：“瞿老师在济南约十五年左右，一直没有正规职业，只是教教书和卖几幅画及靠同乡帮助生活。生活很苦，又有病在身，笑脸很少，终日愁闷忧虑。瞿老师的名字，有世玮、稚彬、园初、一禅等，……瞿老师在济南时主要是在大军阀张宗昌督鲁时期，闹得地方上很乱。最初是随其弟来的山东，当时其弟任平原县县长职务。瞿老师担任县署会计工作。我（胡纯浦——引者按）的先父是任县里财政工作。那张山水中堂是在平原县署画的，送我父亲的，上有我先父名字。约在平原镇不到两年时间，其弟即撤了任。因为清理财

政，瞿留在济南，住公园后街。财政清完后，自此就在济依靠同乡帮助生活。约近二年后，山东私立美术学校成立了，经同乡介绍即任山水画教师一直到逝世。这美术学校……因张宗昌来了，一连搬了几次，闹得不能开班了。这样的学校，瞿老师工资是拿不到的，是只有名义的义务教师。在王璞生家教书约有二、三年。王是落第的县长家庭，生活也不好。”“瞿老师在王家下来就住到历山街悟善社，是一些落时的官僚军阀组成的社。瞿老师只是住在里面，实际是看房性质，没一点工资，还要陪着他们谈说。约计二、三年，又自己租房住，最后迁到正宗坛住，这个坛也是落第官僚等组成，在一个作绍兴酒的厂内，几间平房，瞿老师就在此处逝世。”下面，胡、王两老明确说到世玮逝世的时间。他们说：“逝世日期是民国二十一年壬申五月十六日西历1932年6月18日（应是19日——引者按），碑上署子珪、铨。寿终时有瞿老师小儿子在身边，随后不知去何处了。”此处所记世玮去世时间，与我母亲所记相同。要说明的是，铨，即坚白，当时不在山东。墓碑上署他的名字，可能是世玮生前所嘱；珪，即阿尧，不是小儿子，小儿子是坚白。这封信接着又写道：“瞿老师的名字是随住处移动而有的。一禅是在悟善社，园初是参加道院而有的。关于山水画诀一书，是老师在美术学校教学用过的讲义，整理而印的。当时没有钱，印得很不好，但内容丰富，在初学山水画是一份好材料，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都失落了。……与瞿老师关系好的不过是个穷学生，师生终日在一块。瞿老师对学生谆谆善导，最后也是靠学生相助。老师的墓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完整的，文革后变成苹果园了，所有墓都倒了，碑也砸了。这里原是一块江苏义地。”

瞿秋白的母亲金璇，字衡玉，光绪乙亥八月二十八日（一八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生，江阴西乡大岸村人。她自幼聪慧，深得其父喜爱，在家里延师教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长大后颇有

才学，落笔成章（现在常州博物馆尚可见她给外甥女婿秦耐铭的一封信）；并且为人善良、贤淑，正直刚强。她是由秋白大姑母（即世玮之姊，嫁江阴贤庄金翰如）介绍而与世玮结婚的。婚后家庭贫困，世玮又少管家事，全靠她一人维持。卒于民国五年正月初六（一九一六年二月八日）酉时。瞿秋白受她影响很大，对她十分敬爱。

金璇的父亲金心芑，名城，原籍安徽，生一子二女，金璇是他次女。金心芑早年随同乡金逸亭（即前述秋白大姑母夫金翰如的祖父）到广东。金逸亭是广东按察使，金心芑是广东盐大使。瞿秋白等幼时，金心芑早已回家闲居，并双目失明。他原住江阴西乡大岸村（离常州北门外不远），因只有两间小房子，又地处偏僻，后搬到贤庄，与秋白大姑夫金翰如一家同住。所以贤庄既是秋白的大姑母家，又是外祖父家，常去作客。

瞿秋白幼年未入学时，就得金璇教授一些易记易诵的诗词，如李白的《静夜思》、张俞的《蚕妇》以及李后主的一些词，还听她讲解汉乐府《焦仲卿妻》（《孔雀东南飞》）等。其中一些具有人民性的作品，给幼时瞿秋白很大感染。

瞿秋白一家，没有一分土地，也无一间自己的房子，父亲又从未正式就业。经济上，曾靠两个方面支撑。一是由于父亲世玮侍奉祖母，因此世玮每月约有大洋五十元寄来，它也就成为秋白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二是贤庄的大姑母家，是地主，逢年过节也有些柴米运来，接济一下。后来，母亲认为父亲正值壮年，应该出去做事，好有固定收入。因而在征得世玮同意之后，于一九一三年秋天，把祖母送到杭州世玮家里，然后父亲到湖北黄陂二姑母周家管帐，月薪约三十元。（有的文章说世玮在去山东前未外出过，是不确的。）但是，不久，世玮被罢了官，自己经济拮据，又兼祖母已与他同住，就不再往秋白家寄钱了。这样，秋白

一家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二姑母那里又因分了家，不再主持家政，也绝少来接济了。自此秋白一家每况愈下，渐渐只能以典当衣物和借债度日，借据积了厚厚一迭。母亲曾伤心地说：“要等到我七十岁，才能还清这些债啊！”而当时她才四十来岁。

瞿秋白在《饿乡纪程》里多次回顾和分析了他幼时的家庭。他说：“这种最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的状态，绝对和我心灵的‘内的要求’相矛盾。于是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我家因社会地位的根本动摇，随着时代的潮流，真正的破产了。‘穷’不是偶然的，虽然因家族制的维系，亲戚相维持，也只如万丈波涛中的破船，其中名说是同舟共济的人，仅只能有牵衣悲泣的哀情，抱头痛哭的下策，谁救得谁呢？我母亲已经为‘穷’所驱逐出宇宙之外”^①。笔者在《瞿秋白的思想发展及其特点》中，曾结合瞿秋白的其他一些阐述，略说了瞿秋白一家破败的原因和必然性。这个家庭，可以说是清末民初典型的破落封建士大夫阶级的家庭。金璇则是这个破落的封建家庭中的第一个受害者。她一方面为不断应付咄咄逼人的债主而痛苦不堪，为思量维持生计而愁肠百结；另一方面，当年为要使丈夫外出谋事而送走婆婆一事，还给她带来不贤不孝的“罪名”。当时，祖母因不愿离开故土而骂过她，而且祖母于一九一五年阴历九月初二，即到杭州不到两年就亡故了。因而更有人数说她“把丈夫逼走了，把婆婆搬死了……”金璇为此百感交集，曾对着祖母的遗像整整哭了一夜。

一九一六年初（旧历民国乙卯年底），金璇的外甥女婿秦耐铭（金璇姐姐的女婿）为秋白在无锡乡下谋到一个小学教员的职

^①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3页。

业。这时，金璇已准备自尽，有意要支开较为懂事的秋白，就叫秋白到无锡去面谈一次，并嘱他就在无锡过年，不必急于赶回。另外，又要轶群去舅舅金声侣（金璇的哥哥）家探望表姊病体。轶群不几日即回家。一天，见云白买回一包东西，说母亲不让告诉人，也就没有细看。其实，这是一封红头火柴。约腊月二十四日，世玮两手空空地从湖北回来，意气消沉，金璇见了，唯有叹息而已。除夕之夜，她做了一些较好的菜肴，说了一些吉祥如意的话。晚饭后，孩子们睡了，她还为轶群改制了一条棉裤，为阿谷的狗头帽缝上了福、禄、寿、喜四个银字。新年过后，丙辰年正月初五（一九一六年二月七日）子夜左右，轶群醒来，见母亲房里还有灯光，朦胧中见她在灯下疾书，隔壁房里父亲则已酣睡。后还依稀看到母亲过来给最小的阿谷掖紧被子，在另几个孩子床头转了一会，又到自己床前俯视。轶群当时也与弟弟们一样，年幼无知，又兼渴睡，根本没有觉得有什么异样。凌晨，父亲才发现她已经服毒多时，正在极端痛苦之中。她是剥下红火柴头，用桃花纸包成小丸，用虎骨酒吞服下去的。地上还散落着不少未服的火柴头。年节里，医院停诊，到别处请来一个外科郎中，当然毫不济事。当日（初六）下午六点钟左右（酉时），金璇停止了呼吸，终年四十一岁。她平时爱读的书籍，同着各种借据、当票，都整整齐齐地放置在案头。而昨夜所写，是几封给亲友的书信，信中恳切请求他们照看、扶助自己的子女。秋白于次日（初七）上午从无锡赶来，恸哭在地。正如他后来所说，母亲留下的“唯一遗产”，只是对于子女的万般慈爱。

以上的叙述，可以纠正两种不正确的记载：一是一些资料说金璇死时，世玮不在家里。其实世玮那两、三年在湖北周家做帐房，逢年过节是回家的，此时也在家。二是关于金璇的去世日期，有的说是一九一六年正月初二（如曹子西《瞿秋白的文学活

动》，有的说是一九一五年正月初二（如上官艾明的《瞿秋白与文学》），有的说是一九一六年正月初三（如一些现代文学史专著）。一九一五年的说法差距一年，自然错误，不必多加辨析。一九一六年初二、初三的说法也是不对的。除上述具体经过外，还有一点可为佐证。当时当地大年初五是祭财神爷的吉日。如果死在这天以前，以后成为忌日，是不吉利的，金璇囿于习俗，而为后人着想，自尽的日子，也是选择过的。

顺便指出，一些关于金璇丧事的经费来源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有的文章说，为了购买一具棺木，瞿秋白“只得将所住四席房屋三间，擅自作主，典给木器铺”，有的则说是“亲邻凑钱买了棺材”。事实是，丧事是世玮主持的。世玮向一个亲戚（秋白一个表姐的公公）借了一百元钱，买了棺木等物，用以入殓。而秋白一家所住的房屋，如前所述，是叔祖所建的宗祠，并非自己产业，不可能擅自典给别人。亲邻资助，在当时也已不可能。当时，除了借款一百元外，秋白还将两只桦木衣柜典给当铺，还清了米钱，另有裁缝费用等则拖欠了下来。自然，一大迭借据当票（放在一朱红漆的摆盒内）更无法清还。瞿秋白直到《饿乡纪程》里还这样慨叹说：“母亲死时遗下的债务须得暂时有个交托，——破产的‘土的阶级’大半生活筑在债台上”^①。金璇死后，瞿秋白“一家星散，东飘西零”，就完全崩溃了。

金璇的丧事，十分草率。祠堂第二进厅上，安放灵柩，挂起白幔、遗象，牌位上书“金宜人之位”。来吊丧的人，只有秋白的舅舅金家、表舅母陆家、表姊夫秦家（即秦耐铭家）。金声倡送了一副輓联，内容是：“我妹非人妹，傲骨珊珊男子相；伊女即我女，……”“伊女”指轶群，因她曾居住舅家，但下联后半句她

^①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5页。

已不能记忆。世玮也有輓联，轶群只记得其中半联原是“受尽讥谗全大局”，后因怕得罪亲友，改成“受尽饥寒全大局”。其原句，颇能说明金璇生前的处境，透露了破落封建家族里的关系。秋白在《饿乡纪程》中曾说到他那时的感受：“好的呢，人人过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坏的呢，人人——家族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经济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怨悻诅咒毒害，无所不至。‘人与人的关系’已在我心中成了一绝大的问题。”^①这种状况，对少年秋白的思想很有触动，从相反的方面，推动他反叛本阶级，走上革命道路。

对于母亲的死，瞿秋白是十分悲痛的。母亲死后，他写了不少悼念的诗。其中，当年清明写有这样一首：“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时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据羊牧之回忆）入殓后，灵柩放在祠堂东侧屋内达十多年，一直无钱买地安葬。据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一文说：一九二五年，瞿秋白和他在上海相聚，曾有四首五古赠他，其中一首写道：

君年二十三，我年三岁长。
君母去年亡，我母早弃养。
亡迟早已埋，死早犹未葬。
茫茫宇宙间，何处觅幽圻。
荒祠湿冷烟，举头不堪望。

可见瞿秋白对母亲的悼念，十年不渝，耿耿于心。再过了若干年后，约一九三〇年之前，当地有关方面将金璇孤柩搬到常州东郊

^①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3页。

乱坟堆里埋掉。一九六二年，才在常州市人民政府主持下，由杨之华从《瞿秋白文集》稿费中拿出三百元为经费，迁葬到常州西郊公墓，竖了墓碑。墓碑上刻：“瞿秋白烈士母亲金太夫人之墓”，下署“媳杨之华女瞿秩群敬立”。此次迁葬，瞿秩群、杨之华的秘书以及张太雷的夫人陆静华参与其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京的造反勇士们砸掉瞿秋白在八宝山的墓之后，金璇的墓也被夷为平地，本人则被毫无根据地指为“地主婆”。秋白和他的母亲，一生崎岖坎坷，死后也不得安宁！

金璇最后的埋葬地常州西郊公墓墓地，现在是常州汽车修造厂内的一块场地。

少年时期的同学友伴和亲戚

本节主要简述瞿秋白的同学友伴及一些曾与交往的亲戚的情况，同时附带说明瞿秋白青少年时期一些人们不甚明了的经历。

在《瞿氏宗谱》里，瞿秋白谱名懋森。《城西世系》中世琥注明小名“双”；《城西世考》中，懋森名下记载：“行一世玮长子嗣世璜中学堂肄业光绪戊戌十二月十八日申时生”。其出生时间，按公历，即是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瞿秋白入学前后，有游伴羊牧之等。羊牧之的母亲原在金心芗家侍奉金璇，金璇出嫁时随之来，因而羊牧之与秋白幼小时曾住在一起。后来，一九二五年，羊牧之由秋白介绍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时秋白为社会学系主任。之后交往更多。详见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等文。

瞿秋白在常州府中学堂（他毕业前夕，改称省立常州中学）读书时的同学，有张太雷、苏辛伯、孙九录、李子宽、任乃纳和任乃闾兄弟以及吴炳文等。

张太雷，原名复，后改名泰来、太雷，与瞿秋白同住青果巷，往来甚密。一九二一年，瞿秋白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太雷是介绍人，张太雷后于一九二七年领导广州起义时牺牲。苏辛伯早已退休，现住常州市。孙九录写有《瞿秋白在常州府中学堂和北京的一些情况》^①，可以参阅。李子宽与孙九录毕业后都往北京求学，仍与瞿秋白有交往。现上海鲁迅纪念馆藏有瞿秋白赠李子宽的原画一幅。画面上高山临水，老松数株，山下一座水阁，内有一人横琴抚弦。题词是：“松风自度曲，我琴不须弹，胸中具此潇洒，腕下自有出尘之概，何必苦索解人耶。己未春清明为子宽五兄雅属”。末署“秋白瞿爽”，盖“爽”印章。己未年即一九一九年，此时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读书，应是在北京画成赠李子宽的。

任氏兄弟及吴炳文，《饿乡纪程》中都曾提及：“扬州任氏兄弟及宜兴吴炳文都和我处同样的环境，大家不期然而然同时‘名士化’，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大家还以‘性灵’相尚，友谊的结合无形之中得一种旁面的训育。”^②任乃纳，字仲敏，曾有一黑色锭形漆盒赠瞿秋白，上刻“涤梅玩此，弟纳赠”。此盒后存铁群处，一九六二年赠给常州博物馆。任乃纳后在四川大学任教授，现在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执教，是词曲专家。其弟乃闾，早已逝世。吴炳文，又名凌虚，曾赠瞿秋白《李长吉歌诗》一函四册。此书解放后常州博物馆于当地旧书店购得。四册以“文行忠信”四字编次，是秋白笔迹。“文”字册上，书“乙卯季夏吴子凌虚持赠”，“乙卯”为一九一五年，吴凌虚即吴炳文；“行”字册上有“涤梅藏书”字样；“忠”字册署“瓠舟”两字；“信”字册上有“秋白”两字，并盖“铁榘珍藏”印章。于此可见此时瞿秋白有

① 1980年11月《党史资料丛刊》第3辑。

②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1页。

“漆梅”、“瓠舟”、“铁梅”等别号；“秋白”这个后来最常用的名字，这时也已用了。

在中学读书时及肄业以后，瞿秋白还与舅父的一个女儿、表妹金君怡来往很多。当时，瞿秋白常到贤庄舅家，与金君怡姐弟一起游玩。秋白曾送金君怡一些书画。金君怡后来嫁一恽姓人家，丈夫早死，生活很苦。她一直将秋白所赠书画妥善保存，例如曾藏之屋梁上，但后来终不免于失落。不过笔者在上海鲁迅纪念馆见到一幅瞿秋白的画，即是赠金君怡的。画面是滔滔江流，浪花飞溅，隔江有秋林一行。上录谢灵运的诗句：“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棲川怍渊沈”^①。下题“丙辰孟秋临鹿村居士杂寓谢灵运诗为题以应纤哥雅属”；末署“秋白瞿爽”，盖“爽”及“秋白”小章。丙辰年，公历为一九一六年。羊牧之在《我所知道的瞿秋白》一文中介绍过这幅画，但他说“不知‘纤哥’何人”。“纤哥”，即金君怡。金君怡小名纤纤，至于女性而称“哥”，则不知何意。一九一六年秋，时值瞿秋白去湖北前后，推测起来，此画当是瞿秋白离常州前或到湖北后所作。关于瞿秋白和金君怡在少年时代的关系，还有下面两个材料可以参考。一是我母亲瞿轶群曾回忆说：一九一六年十月，瞿秋白离开无锡江陂小学到贤庄舅家住过几天，之后才赴湖北。到火车站送行的，除轶群、陆家表舅母外，还有金君怡的姊姊金君芝。一是瞿秋白在《饿乡纪程》里的如下一段回顾：“我幼时……虽亦有耳鬓厮磨啾啾情话，亦即亦离的恋爱，安慰我的心灵，良朋密友，有情意的亲戚，温情厚意的抚恤，——现在都成一梦了。”下文，还又一次提到离故乡之前，贤庄“环溪的情流禾稼，也曾托我的奇思遐想”^②。

① 此为谢灵运《登池上楼》的开头四句。见《谢康乐诗注》（黄节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3月版，第35页。

②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4页。

《饿乡纪程》上这段文字，更值得我们注意。

至于“良朋密友”和“有情意的亲戚”，则有无锡的表姊夫秦耐铭和湖北黄陂的表兄周均量等。前已说过，秦耐铭是瞿秋白姨母的女婿，他在秋白家最困难的时候，介绍瞿秋白到无锡南门镞子桥边上的江陂小学教书，使之每月能得到二十元左右薪金来补贴家用。周均量，是二姑母的长子，又是共同研究诗词和佛学的友人。秋白在湖北黄陂周家居住将近一年（其间曾到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语几个月），始与周均量交往，“诗词的研究更深入一层”。他们曾夜游黄陂县城城墙边冷僻处的古迹铁锁龙潭，吟诵诗句。他们还同读佛学的书，如《成唯识论》、《大智度论》等，因为秋白认为佛经里有哲学，可以钻研^①。在黄陂的这段经历，瞿秋白一直未能忘怀，他赴俄前说：“黄陂铁锁龙潭的清波皓月，也曾使我低徊留恋”^②。那时他正处于消沉时期。而不久之后，瞿秋白就奔赴北京，置身于更开阔的天地，并且酝酿着思想上的大变化了。

瞿秋白是一九一七年初到北京的。住在东单东观音街草厂胡同堂兄纯白家里。四月，他遵纯白的意见参加了一次文官考试，未被录用。夏，由于张勋复辟，时局混乱，秋白曾送纯白的妻儿三人到黄陂周家，不久他一人返京。九月，考取了外交部主办的免费的俄文专修馆。瞿秋白入学后，成绩一直优异，常名列前茅。同时间里，他还自修法文，也取得良好效果。当时纯白在外交部护照科工作之余，在一个法语补习学校中兼课，自己编写了一本法文教材。秋白利用这个机会学法文，几个月之后，他的法文水平，竟远远超过了补习学校的正式学员。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打破了瞿秋白的枯寂生活，也使他遇到

^① 周君适：《瞿秋白同志在黄陂》。

^②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4页。

了具有新思想的同志，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成为俄文专修馆学生中的“领袖”之一。他还与俄文专修馆、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学校等的代表常在一起开会、活动。同年十一月至一九二〇年五月，他与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等主办了《新社会》旬刊；一九二〇年一月前后，还参与了文学研究会的创办（参阅《瞿秋白文艺思想再评价》的一条注释，见本书第九六页）。后来郑振铎回忆说：“秋白在我们几个朋友里面，是有‘少年老成’之称的。许地山、耿济之、瞿世英和我的年龄都比他大。……但比起秋白来，似乎阅历都没有秋白深。秋白在我们几个人当中，够得上是老大哥。”^①在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里，郑振铎是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耿济之是俄专的学生，许地山和瞿世英（菊农）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他们常在耿家聚会。现在还可看到一九二〇年摄的瞿秋白与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及其弟耿式之的合影。

其中，需对瞿世英作些介绍。在《饿乡纪程》里，瞿秋白称他“菊农叔”；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送瞿秋白赴俄时，瞿世英送别诗也称“秋白姪”^②。翻检《瞿氏宗谱》，瞿世英是瞿秋白的远房叔父，属于“老二房一支内长房”的第十五世。据《城西世考》简介，瞿世英字超杰、号品涛，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四日）生。菊农是后取的字，也是笔名。瞿秋白则属于“老二房一支内四房”的第十六世，要小一辈。但两人的年龄，秋白要比世英大将近两岁。郑文说瞿秋白比他们年龄都小，大概是因为知道他们的叔侄关系而误记了。瞿世英于一九一四年到北京求学，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后来是颇有成就的作家和教育家。一九七六年八月去世。

此外，再略述几个《饿乡纪程》中提及的亲戚。“儿时的旧伴”、

① 《记瞿秋白同志早年二三事》，1955年6月16日《新观察》第12期。

②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30页、32页。

“一少寡的表姊”^①是秋白大姑母的次女，其丈夫姓庄，确有吸鸦片的嗜好^②。到北京不久的“三妹”^③，小名姗姗，则是大姑母的第三个女儿。这些亲戚，如《饿乡纪程》中所说，都是封建旧家族中人，此时都已没落困窘，只有徒然感叹“时乖命蹇”，与倾向社会主义新思想的瞿秋白，已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了。

景白和坚白

在瞿秋白四个成长成人的弟弟中，景白和坚白由于秋白的带领和影响，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在很年轻的时候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他们身上，也可以看到瞿秋白的崇高品格和精神力量。

瞿景白在母亲去世、父亲赴济南之后，与幼弟坚白一起，由姊姊轶群带领，先寄居其舅舅金声倡家。一九二〇年，又一起到杭州，寄居大伯父世琥家里。瞿景白在常州进过小学，到杭州后，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为人正直、刚强，很快受到秋白的感染，倾向革命，在《新青年》季刊上发表诗作，如《知心》^④等。秋白一九二三年写的散文《弟弟的信》，曾摘录了景白信中的一段话。他对杭州湖滨公园“一个衣冠禽兽”“将他的兽掌打工人的面颊”一事，极表愤慨。秋白因而在文中亲切地写道：“弟弟，景白，你大概渴望那东方，那东方……早升旭日？”^⑤一九二四年夏，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尚未毕业，就由秋白带往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学习，并不久加入了党。

①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6页。

② 见《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7页。

③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9页。

④ 1923年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2期。

⑤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23页、224页。

景白在一九二五年“五卅”反帝运动中，表现了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他带头参加游行，散发传单。他自己也写有《红毛狮子》等文，油印成册。

关于景白在“五卅”运动中的情况，《热血日报》里有一条材料。《热血日报》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载有一则题为《上大学生紧急会议》的消息。消息说：六月七日上午上海大学临时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当场查明了已保释及在捕房的同学的姓名”。所列学生有二十四名。其中二十二名当时已保释出捕房，唯有两名尚押捕房。而瞿景白是两人之一。消息中写道：“瞿景白、杨恩盛于五月卅日被捕，不准保出，六月九日候审。”从这则消息，可见景白在敌人眼里是“罪行”最严重的。此外，姚天羽在《培养革命干部的洪炉——上海大学》^①一文中写道：瞿景白“年才二十岁，是个共产党员，在五卅斗争中，他领头叫喊口号，鼓励同学们前进：‘同学们，前进呵！’‘同学们，勇敢些，前进呵！’象一只勇敢的海燕，飞翔在同学们中间。帝国主义巡捕把他逮捕了。后来，在法庭受审时，瞿景白脸不变色，作了义正辞严的答辩。他那坚决有力的言词，使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惊惧不已。”关于景白在法庭上的答辩，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曾有所反映。这本书里记载说：“六月九日，会审公廨开庭审讯被捕者瞿景白等十八人。……六月十日，以法国公使馆参赞祈毕业为首的英、法、美、意、日、比六国调查委员团到了上海，会审公廨继续开审，关炯之主张不要研究捕房犯罪不犯罪的问题，只须研究被捕者犯罪不犯罪的问题，这就是说，捕房开枪是否出于自卫属于外交范围，应当由政府特派员负责去交涉，公堂只应根据捕房所控案情，判决被捕者应否有罪。这个时候，美国领事突然问瞿景白

^① 1980年8月《党史资料丛刊》第2辑。

道：‘你读过四书五经吗？’瞿回答说：‘读过。’于是这位洋大人一面摇头簸脑地哼着，‘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一面向堂下人睨了一眼说，‘你懂得书中的意义吗？’瞿不耐烦地说：‘这是两千年以前的陈腐学说，现在已不适用了。’说罢，大家不由得哄堂大笑起来。”^①

“五卅”运动后，瞿景白曾担任过上海曹家渡区团委书记。^②

一九二七年三月，瞿景白随瞿秋白抵汉口，参加党的工作。^③一九二八年又一起赴莫斯科，进中山大学学习。那时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并撰写和翻译了不少论文。景白曾于一九二九年九月与秋白合编了《中国职工运动材料汇编》^④。但过了一个月左右，他即因反对那时形成不久的王明集团而“失踪”了。

当时，中山大学党内斗争非常尖锐复杂。以王明为首的宗派小集团，在中山大学校长、支部局负责人米夫的支持下，利用中大清党，整肃反对他们的许多同志。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瞿秋白，和中国广大同志站在一起，坚决抵制和批评了他们的做法，引起了米夫等人的仇视。于是，他们将景白作为攻击对象，称之为“反党分子”。而景白为人正直，也早对他们一伙十分不满。一九二九年十月，在中山大学一次党的大会上，景白对王明一伙肆意污蔑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极表愤慨，当场把联共预备党员党证退交了中大所属区的区委书记。这次惊人事件发生后，景白就失踪了。事后秋白向莫斯科警察机关报告，要求查明景白下落，可是全无消息。据估计是被捕了。关于景白的失踪，盛岳（即盛忠亮，一九三五年被捕叛变，解放后逃往美国。）在一

①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7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72—173页。

② 李强：《关于建立常熟党组织的回忆》，《常熟革命文史资料》，1981年。

③ 茅盾：《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1980年11月22日《新文学史料》第4期）曾提到瞿景白这时的轶事。

④ 见丁景唐、文操：《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1959年1月版，第52页。

本回忆录《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也提到。他叙述说一九二九年十月中山大学第一次清党大会上，他发言四十五分钟（其他人发言只限五分钟），“公开谴责瞿秋白及其同伙犯了机会主义的罪行。……我谴责他们都在中山大学培植‘反党第二路线联盟’”。“我的讲话引起了听众的不同反映，忠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人报以热烈的掌声，属于第二条路线联盟的学生则发出一片愤怒的喊声和嘘声。所有到会的俄国人，包括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代表，一致鼓掌表示赞许。俄国人本来以保持中立为宜，而当时的情况却是用鼓掌来明确表示他们反对中共代表团的立场。由于我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其他人随后的公开攻击，国际中共代表团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关系迅速恶化。瞿秋白及其同伙的政治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瞿秋白在中山大学上学的弟弟瞿景白一气之下，把他的联共预备党员党证退给区党委。就在他交还党证的第二天，他失踪了。我们不清楚他是被捕了呢，还是象谣传的那样说他自杀了。不管小瞿出了什么事，对瞿秋白都是一个打击；从那天起，开展斗争的气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了。”^①然而据瞿秋白等人的分析，景白决不是自杀的，而是被谋害的。

景白就这样为反对王明集团牺牲了生命，时年仅二十三岁。他和后来的秋白和坚白一样，也是为中国革命而死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

瞿坚白则是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

坚白从九岁起，与轶群、景白一起住在杭州世琥家里。十五岁时，毕业于杭州志诚小学。毕业后无力升学，随着景白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徐肇宗，到浙江淳安、嘉善、镇海等地的县

^① 《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亲身经历）》，奚博铨、丁则勤译，陈庆华校，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0年12月印刷，第246页。

教育局当雇员。为了避免暴露与瞿秋白的关系，用瞿谷生的名字。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强烈不满。他虽然年纪很轻，地位卑微，然而正气凛然，总是横眉冷对国民党的党棍政客们。每周举行所谓总理纪念周，很少参加。在镇海时，当局强令公务员不论职位大小，一律加入国民党，办所谓“集体入党”。他坚决顶住，说宁可打破饭碗，也不报名参加，别人劝说，他也毫不动摇。一九三五年，秋白殉难，他在办公室看到报上消息，冲门而出，回到住所，掩上房门，从下午哭到半夜，不思茶饭。自此以后，他沉默寡言，而内心已打定主意，要继承哥哥遗志，参加革命队伍。

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浙江省国民党政府在丽水县碧湖创办政治工作训练团，标榜是培训战时地方行政干部。坚白闻讯，即脱离教育局，前去受训。但入团不久，发现国民党并无抗日诚意，大失所望。于是在一天深夜出走，历尽艰苦，辗转到了武汉，见到了徐特立。不久，由徐老介绍，往延安陕北公学，后又转到抗日军政大学。约一九三九年后，他给姊姊轶群一信，说将调往别处，难以确定地址，不要再寄信去。自此与亲友断绝了音信。直到一九四九年八月，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时，轶群接到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民运部的一封信，才知道坚白已经牺牲。信中说：“我们很抱歉，由于交通不便和敌人的长期封锁，直到今天才通知你们关于坚白同志的不幸消息。坚白同志原在太行山地委调查研究室工作，工作一贯积极负责，艰苦奋斗，为其他同志的榜样，为负责同志所表扬。但不幸在一九四四年日寇大扫荡时，英勇牺牲于武安百草坪。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对于革命丧失了这样坚强的战士，对我们失掉了这样可敬佩的战友。这是一件极悲痛的事，但是他为解放人民的伟大革命而牺牲，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和今天我们还活着的人的幸福而牺牲，这是伟大的，也是光荣的。今天他若知道他多年努力争取

的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即将实现，他出生的故乡早已解放，他一定会含笑于九泉的。”

坚白就这样踏着哥哥秋白、景白的足迹，光荣地度过了短暂的一生。他牺牲时，也只有三十三岁。

瞿秋白、瞿景白、瞿坚白兄弟三人，同心同德，英勇奋战，前仆后继，是可歌可泣，值得传颂的。瞿秋白不仅自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而且引导和感召了他亲爱的弟弟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更显示出了他品格的崇高。

愿他们兄弟三人，在地下安息！

瞿秋白研究概述

古人常说：盖棺论定。其实这不是普遍规律。许多稍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去世之时，或有一致的评价，但后来随着世事变迁，曲折起伏，难有定论。瞿秋白就是如此。他牺牲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就是复杂多变的。不但毁誉臧否，因人而异，而且升沉起落，也因时而变，就象他生前坎坷不平的遭遇一样。近年来，关于他的生前经历，已有同志编写了年谱，给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而我以为，关于他死后人们对他的评论，也不妨参照编年的方法，加以整理。这可作为年谱的“续编”，也同样有助于知人论世。

瞿秋白是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英勇就义的。本文主要概述此后四十七年间人们对他的全人或某一方面的评论。但为了使概述有一个完整的面貌，也收入他牺牲前几年（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的有关评论。不过国外和台、港方面，因所见不多，难以反映得全面，故暂付阙如，以待来日。

概述中，除引录外，略加评点。所引文字，均出自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专书。引述和评点，都将力求客观全面。同时，为了节约篇幅，述评将尽量概括。至于错漏之处，一定很多，希望读者和专家指正。

概述将分四个时期：一、黑暗年代（一九三二——一九四九）；

二、黎明以后（一九四九——一九六六）；三、十年动乱（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四、拨乱反正（一九七七——一九八二）。

一、黑暗年代

瞿秋白在牺牲前的几年，由于参加了左翼文艺运动，公开发表过创作和理论文章，因而文学界人士对他有所评论。这些评论，主要是关于文学和语言的大众化问题。

一九三五年他牺牲后，在全国激起很大反响。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和瞿秋白生前友好，满怀悲愤，同声哀悼。至全国解放的十四年中，他们公开或秘密地发表了不少文章，出版了一些书籍，回顾瞿秋白战斗的一生，颂扬他对革命的贡献，以激励同志继续战斗。另一方面，国民党报刊，则肆意歪曲、诋毁，并以此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而无论敌我，都是把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来进行评论的。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二年一月，钱杏邨在《北斗》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一文。文章认为左翼文艺运动此时同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更加与政治合流起来，而且坚决的向工农大众方面开展，努力于大众化的运动”，取得了成绩，出现了《水》（小说，丁玲作）、《活路》（话剧，适夷作）和瞿秋白的《东洋人出兵》等一类“优秀的作品”。并指出：用民间歌曲形式写成的《东洋人出兵》“是大众化的作品”，它以“反日的斗争和对统治阶级的讽刺”为主题，适应了战斗的需要，含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同年十二月，李长夏在《文学月报》第五、六期合刊上，致信

编者周起应(周扬),谈对于大众文艺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在《文学月报》发表的有关文章^①中,瞿秋白的“理论最有条理,有最大的影响”。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四年六月起,文化界开展了关于“大众语”的讨论。八月,国民党文化特务李焰生在《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由大众语文文学到国民语文文学》,攻击一九三二年关于文学大众化的讨论。他说:“所谓大众语文,意义是模糊的,提倡不是始自现在,那些文艺的政治宣传员如宋阳(瞿秋白的《大众文艺的问题》等文署名宋阳——引者)之流,数年前已经很热闹的讨论过。”企图引动反动当局,从政治上来压制大众语运动。对此,鲁迅在《门外文谈》(刊于八月二十四至九月十日《申报·自由谈》)中,揭露了他的阴谋和反动实质。他指出,提倡大众语,“使另一些人发生恐慌了。首先是说提倡大众语文的,乃是‘文艺的政治宣传员如宋阳之流’,本意在于造反。给带上一顶有色帽,是极简单的反对法。不过一面也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太平,宁可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鲁迅在对敌人的反击中,肯定了瞿秋白提倡语言大众化的革命目的和意义。

九月,文逸编著出版了《语文论战的现阶段》一书(天马书店出版发行),评述了本年的大众语讨论。为了说明问题,他回顾了一九三二年关于文学大众化的讨论。他指出:一九三二年文学大众化的讨论是“这次大众语运动底前奏”。“那次的讨论虽然没有展

① 《文学月报》于六月创刊,先后发表的有关文章有:署名宋阳的瞿秋白的《大众文艺的问题》,署名止敬的茅盾的《问题中的大众文艺》、方光焘的《艺术与大众》,也署名宋阳的瞿秋白的《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鲁迅的《连环图画辩护》等。

开就中止了，但是它的意义却是不可抹煞的；它，可说是这次大众语讨论底先导，也可说是这次大众语讨论底序曲。”而“那次讨论底开端，是宋阳先生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一篇《大众文艺的问题》”，继而在《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中又“提出了许多很有系统的意见”。文逸最后说：“一九三二年关于‘大众文艺用什么话写’的讨论，到这里就告了终结，没有继续发展。这个讨论，虽然没有提出‘大众语’这名称，但实际已是‘大众语’问题的讨论，是无疑的。这回的大众语运动底产生，当然有它底特殊的社会条件，但和上次讨论有许多不可分离的联系，却也是不可否认的。”（以上引文见该书第三二页至三三页、三七页、四三页）这就是说，瞿秋白是“大众语”的最早的实际提倡者。

《语文论战的现阶段》一书中附录了数十篇当时讨论大众语的文章。其中魏克猛的《普通话与“大众语”》（原载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已注意到瞿秋白的贡献。他说，瞿秋白不但是“最先涉及到‘用什么话写’的文字本身”，而且比现时“泛论”话和文不能分开的人不同，早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意见，那就是“‘现代中国普通话’才是‘大众语’，才是大众中间的普通的语言。”魏克猛的看法，当是文逸判断的根据之一吧。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瞿秋白在福建上杭水口镇附近被敌保安第十四团俘获。同年四月，被解送国民党东路军三十六师拘押。六月十八日于福建长汀英勇就义。

瞿秋白被俘以后，最早的有文字可查的评论，出于瞿秋白的亲密战友鲁迅的书信。四月间，鲁迅已得到他被俘的“确信”，而深知必将被害，五月二十二日，他在致曹靖华信中沉痛写道：“它（瞿秋白别号之一——引者）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

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

瞿秋白牺牲以后，鲁迅在六月二十七日致萧军信中，又一次从文化方面，高度评价了瞿秋白。他说：“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中文俄文都好，象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九月一日又致萧军说：“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之类——引者）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对蒋介石国民党表示了强烈愤慨。在这段时间里，鲁迅还在多封致友人书信中，表达了对瞿秋白的哀思和痛惜。出于火一样的革命友情，鲁迅于六月下旬开始与友人酝酿收集出版瞿秋白的译文遗稿，并于九月十一日拟好译文篇目，定名《海上述林》。（他之所以决定編集瞿的译文，意在求快。他在九月十一日致郑振铎信中说：“他的写作，編集较难”，恐“拖时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开始，多种国民党报刊报道了瞿秋白被俘和被杀的消息。如五月十一日、六月十九日、六月二十一日日的《中央日报》记载、七月五日《申报》的《瞿秋白伏法记（长汀通讯）》、同日天津《大公报》的《瞿秋白毕命记（长汀通信）》、七月三日至六日的《福建民报》和七月八日《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二十六期的《瞿秋白访问记》（李克长作）、八月《社会新闻》第十三卷第一期摘要转载《多余的话》时的编者前言等。

上述报纸主要记牺牲经过和“罪状”。如《申报》的长汀通讯中写道：“十七日，奉中央电令，着将瞿就地枪决。翌日（十八日）晨八时，特务连连长廖祥光，即亲至狱中促瞿至中山公园照相，瞿欣然随之。照相毕，廖连长示以命令，瞿颌头作豪语：‘死是人生最大的休息。’廖连长询以有无遗语留下，瞿答：‘余尚有诗一首未录出。’当即复返囚室，取笔书诗一首并序如下：（引者按：即《偶成》，略）末署‘秋白绝笔’。书毕，复步行中山公园，在园中凉亭内饮白干酒一斤，谈笑自如，并唱俄文《国际歌》及《红军歌》

各一阙。……歌毕，始缓步赴刑场，手持烟卷，态度镇静，乃至刑场，盘坐草地上，尚点头微笑。俄顷，砰然一声，饮弹而殒矣。”然后“录其罪状”。《大公报》的长汀通信略有不同。不同处如下：“……自斟自饮，谈笑自若。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小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继而高唱《国际歌》……酒毕，徐步赴刑场，前后卫士护送，空气极为严肃。经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彼犹回首瞻视，似有所感也。既至刑场，自请仰卧受刑。”

《国闻周报》转载李克长《瞿秋白访问记》时，在编者按语中略有评论。按语说：“共党首领瞿秋白氏，在闽被捕，于六月十八日枪决于长汀西郊。本文作者于其毕命前之两星期（六月四日）访问瞿氏于长汀监所，所谈多关于个人身世，了无政治关系，故于刊载，以将此一代风云人物的最后自述，公诸国人。”《社会新闻》（国民党中统局主办）选载《多余的话》所加的编者按语，则表达了国民党反动派对瞿秋白及其《多余的话》的看法，并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按语说：“共魁瞿秋白已伏法于闽南，关于瞿之处死，这在近年来的剿灭共匪事件上是一大收获。因中国共产党之积极破坏中国革命，并发动各处暴动，甚至于流为土匪，其关键全在民十六之八七会议，而此会议之中心人物，及会议后之政治领导责任者，即为今日伏法之瞿秋白。……则瞿秋白罪恶之重大，虽十死不足以赎其辜”。对于《多余的话》，按语认为，“观于此，则瞿之狡猾恶毒，真可谓至死不变，进既无悔祸之决心，退亦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所以瞿之处死，实属毫无疑义。”这个评论，暴露出国民党反动派决意杀害瞿秋白的原因，也从反面说明了瞿秋白及其《多余的话》的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

本年九月一日出版的左联机关刊物《文艺群众》创刊号上，发表了《悼瞿秋白同志》一文（署名“本社同人”），它以昂扬的革命激

情，高度评价了瞿秋白的一生。文中说：

他的名字将是中华民族万古不灭的光辉，将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中烛照长空的火焰。临刑之前，听说他站在长汀破晓的天野，唱着俄文国际歌，在生命的最后一刹那，他一点也没有忘记世界革命，没有忘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他是属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他的名字将和李布克拉西（即李卜克内西——引者）、卢森堡及其他一切世界革命的殉难者连成一通，写在人类真正的历史的序言上。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巴黎的《救国时报》第三十七期，用一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组纪念瞿秋白的文章，并冠以“瞿秋白先生殉难一周年纪念”的通栏标题。《救国时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汉文报纸，创刊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以海外华侨为主要读者对象。该报的文章，反映出党对瞿秋白的评价。

这一天所载的纪念文章有：《纪念瞿秋白先生》（不署名）、《瞿秋白先生略传》（南田）、《我国共产党领袖王明等之纪念词》、《瞿烈士风度一瞥——〈国闻周报〉记者之〈瞿秋白访问记〉（摘录）》、《闽粤民众纪念抗日志士瞿秋白》（报道），并刊有“瞿秋白烈士遗容”一幅。

其中，《瞿秋白先生略传》对瞿秋白的生平经历，除少年时期等几个段落外，叙述都颇确切，评价也较中肯。文章正确分析了瞿秋白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它说瞿秋白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底任驻莫斯科记者期间，于资产阶级肆意歪曲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现实的气氛中，“独能一一秉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记者精神，综覈情实，剖

抉原委”；本人也在考察中“日益懂得俄国，懂得布尔塞维克党”，并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有机会目击和亲炙，他的革命意志益加坚决，不久以后遂正式加入共产党。他的带有光芒的政治生活遂自此开始。”对于瞿秋白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功绩，该文也作了有力的肯定。它指出瞿秋白在上海大学期间，曾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赞扬他“百忙中依然不忘著述，其好学之切与致力之勤，实在非常人所致”；并且明确肯定瞿秋白此时期在建立和维护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先生为积极参加民族反帝统一战线的一人，也为积极反对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人。”关于瞿秋白一九二七年后曾任党中央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九三一年后的三年与鲁迅一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的经历，该文没有涉及，不知何故。文章后半，主要赞颂瞿秋白在江西苏区的艰苦条件下致力于群众文化教育的劳绩。文章最后叙述了瞿秋白被俘后在毒刑下坚不吐实，并斥责国民党的英勇举动；还说：瞿被俘后，“蒋惮于民气，犹不敢遽然加害。事为日本所悉，以先生颇系人望，留之恐为异日害，……因扬言蒋久囚瞿某不杀，殆将为他日联共地步。蒋闻之大惧。戴季陶素恨先生举发其破坏民族统一战线之阴谋，亦扬言‘秋白死有余罪，系狱日久，徒招友邦烦言’。蒋遂电汀州令杀先生。”鉴于该文许多叙述符合事实，因而这关于瞿被害原因的说法，也有参考的价值。

《纪念瞿秋白先生》一文，以该报编者的身份，称颂瞿秋白“不独是我国的革命巨子，不独是我国有数的政治家，而且也是我们新闻界、文化界的同人之一，……先生的英勇殉国行为，正代表了我国新闻界、文化界的至大的光荣，因此，先生遇难一周年纪念，益发振起了我们为救国而奋斗的热情”。

《纪念词》署名王明、康生、史平、周和生、李广、徐杰、康谷、李明，它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对瞿秋白作了悼念。同时表

示，为了纪念瞿秋白，要发扬他为抗日而奋斗的精神和从事反帝统一战线的经验。

此外，《瞿烈士风度一瞥》说：“瞿秋白氏在狱中及殉难时之状况，各报多有登载，虽因言禁及政治成见关系，记载多有失实；但瞿氏一生为民族解放而斗争之精神，及其不折不挠闲逸自在之风度亦流露于字里行间”，就连“赞助蒋介石‘剿共’的国闻周报，亦于十二卷二十六期发表李克长君之《瞿秋白访问记》。”《闽粤民众纪念抗日志士瞿秋白》，报道了闽粤边境革命根据地红军，在张鼎丞同志等领导下获得胜利的消息，指出他们继承了瞿秋白烈士的遗志，并证明瞿秋白的革命精神，活在闽粤人民的心中。

同年七月三日，《救国时报》第四十期又以《旅英侨胞纪念先烈瞿秋白》为题，发表了伦敦解放社同人作于六月十八日的《纪念民族英雄瞿秋白烈士宣言》。宣言认为“瞿秋白同志之死，是中国民族革命的斗争上，进行抗日救国的工作上，一个巨大的损失，这损失是不可补偿的。这是整个中国民族的不幸，这是每个有良心、有抗日救国意识的中国同胞都得感到万分痛心的。”宣言表示要继承瞿秋白烈士的精神，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

上述《救国时报》上的文章，都是配合着当时的形势，主要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方面来纪念瞿秋白的，是将他作为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来表彰的。

同年，上海地下党组织秘密出版了油印小册子《纪念我们的民族英雄和人民战士》，纪念十几位中国共产党烈士的光荣历史。其中，关于瞿秋白的文章，有五篇（南田的《瞿秋白烈士略传》、王明等的《纪念词》、《巴黎〈救国时报〉纪念词》、《闽粤民众纪念抗日志士瞿秋白》和《旅英侨胞纪念先烈瞿秋白》），即转载自上述《救国时报》第三十七期和第四十期；此外，还有一篇《瞿秋白的故事》，转载自四月三日《少共真理报》。上海地下党将《救国时报》

上的文章介绍到国内，是有很大的战斗意义的。

本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在鲁迅逝世前，由他手编的瞿秋白译文遗稿《海上述林》上卷《辨林》于五月印成，下卷《藻林》于十月印成，均以诸夏怀霜社名义刊行。“诸夏怀霜”（按：“霜”为瞿秋白原名），寓有全国人民共同怀念瞿秋白的深意。鲁迅编辑出版这部书，花了一年多时间，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表现出他对瞿秋白的深长情谊和由衷推崇。他自一九三五年九月起，扶病亲自编辑校对、设计封面装帧并题签，以至于选购纸张。书的装帧极为精美庄重，分皮脊麻布面和蓝色全绒面两种，在日本印刷。一九三六年十月初，上卷《辨林》由日本运回。同月九日，鲁迅亲拟《海上述林上卷出版》一则消息，刊载于《译文》十月十六日新二卷二号，及同年《中流》、《作家》、《文学》三个刊物。（一九三八年收入《鲁迅全集》时改题为《介绍〈海上述林〉》。）这则消息说：

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煌煌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足以传世。

鲁迅对《海上述林》的价值，是推崇备至的。其中所说《写实主义文学论》，即书中的《“现实”——科学的文艺论文集》（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第四卷里，据瞿秋白原稿将副题改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包括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的文艺论文和瞿秋白据苏联公谟学院有关材料所作的阐述，在当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论著的相当系统的译介。鲁迅的赞颂，绝非虚言。到鲁迅逝世前四天，即十月十五日，鲁迅还在致曹白的信中，再次对瞿秋白的死深表惋

惜。他说：“《现实》中的论文……原是属于‘难懂’这一类的。但译这类文章，能如史铁儿（瞿秋白笔名之一——引者）之清楚者，中国尚无第二人，单是为此，就觉得他死得可惜。”在编校和出版《海上述林》的过程中，鲁迅还对冯雪峰“说过象下面这样意思的话”：

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
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
是杀不掉的！^①

鲁迅在这里深刻指出，瞿秋白的译作是战斗的，他的劳绩是永存的。

同年十月三十日，《救国时报》为追悼鲁迅逝世，发表了史平的《一个深晚》，记述了一九三二年阴历十一月史平（按：史平即陈云；当年阴历十一月，公历为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二十六日之间。）将避居鲁迅家里的瞿秋白送往“另一个地方去”的情况。文中生动表现出鲁迅对瞿秋白的关切。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七年三月，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中文书《殉国烈士瞿秋白》。书中有编者引言一篇；正文三篇：《瞿秋白同志殉难一周年》（即一九三六年《救国时报》三十七期所载王明等的《纪念词》）、杜宁（杨之华）的《纪念我们亲爱的战友瞿秋白同志》及《瞿秋白同志传》；附文有：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部分，以及共产国

^① 《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8月版，第158页。

际代表古西宁，日本、英国、美国、德国、加拿大、安南等国共产党追悼瞿秋白的文章。

本书编者的引言中写道：

瞿秋白同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好领导者之一，而且是中国人民最优秀的领袖之一。他毕生为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到底。当他牺牲的周年纪念日，不仅中国共产党，而且全中国人民都必然要纪念这位优秀的领袖。

这段话，较之一九三六年《救国时报》各篇文章，对瞿秋白作了更全面的评价。在各国共产党的悼文中，日本共产党代表的悼文，除了肯定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重要地位外，还指出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悼文说：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中一个伟大的革命家。

瞿秋白同志是坚持着马克思、列宁的共产国际的旗帜的人，他反对军国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之下为着解放中国四万万饥寒交迫的人民，与反动的国民党及各帝国主义者进行残酷斗争，以便从他们残惨剥削和恐怖之下获得解放。

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悼文，都表达了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愤慨，和对瞿秋白牺牲的沉痛悼念，由此可见瞿秋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声望。

杜宁的《瞿秋白同志传》，也指出瞿秋白被害“是一件震动全

中国、全世界的事件，这是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一项莫大的损失！”这篇传记，扼要评述了瞿秋白的一生，肯定他是“介绍斯大林同志论列宁主义著作到中国的第一个人”，“反对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战士”，“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学者”，并指出他“对于妇女问题很注意”，撰写过不少有关文章，为妇女解放作出了贡献。传记还转引了当时报刊关于瞿秋白牺牲情形的一段文字：“杀瞿之计划，固已早决，劝其投降之威逼利诱，又被瞿氏严词拒绝，是故瞿氏遂提早枪决。……十八日上午八时，由特务连长廖祥光，亲至狱中将瞿氏提出，领至中山公园照相，事毕，廖连长示以枪毙命令，瞿氏大呼：‘为中国革命而牺牲，是人生最大的光荣。’”（以下记载与前引《申报》、《大公报》的报道大致相同，略。）

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部分，指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方针、任务及取得的巨大成就。编者收入的目的，在其编者注中说得很明白：“毛泽东同志此处所讲的当时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的成绩，与中央苏维埃政府的人民教育委员长^①瞿秋白同志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特节录于此，作为对秋白同志的纪念。”

同年三月四日，冯雪峰在《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一九三六年七月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一文之后，加了一个“附记”。其中说到，鲁迅同意瞿秋白对自己的评价（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的评价）：“先生也同意对于他的杂感散文在思想意义之外又是很高的而且独到的艺术品的评价，并且还慨叹地说：‘作

^① 瞿秋白在中央苏维埃政府中的职务名称应为：教育人民委员。当时中央行政机关称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外交、军事等十一个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据《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次会议记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一号》，载1934年2月6月、12月《红色中华》第146、148期。）下面一些引文中称“人民教育委员”等，也都是不准确的。

这种评价的还只有何凝一个人！同时，看出我攻击章士钊和陈源一类人，是将他们作为社会上的一种典型的一点来的，也还只有何凝一个人……”^①

同年三月五日、四月二十日、七月二十日，《逸经》第二十五期、第二十八期、第三十四期，发表了一些反共文人评论瞿秋白《多余的话》和三首狱中诗词的文章。这些文章对《多余的话》作了很多曲解，以进行反共宣传。雪华的《〈多余的话〉引言》（二十五期）和赵庸夫的《关于瞿秋白之种种》（二十八期），抓住《多余的话》里“历史的误会”、“一场噩梦”等片言只语，把瞿秋白的一生说成一个“悲剧”；从而大放厥词，劝诱青年不要凭着“冲动的青年的热情和深悉为时代抛弃的虚荣心理，不自主地朝着时代浪潮的漩涡里跳”，胡说《多余的话》“是一般共产青年执迷不误者的当头‘棒喝’”。他们歪曲了瞿秋白出于过分自责的一些话的实际含义，利用了他对王明路线的愤懑和由此流露出来的消沉情绪，来损害瞿秋白的革命者形象。这是不奇怪的。但即使如此，他们也承认瞿秋白并非惧死而屈节。如雪华指出：“有人说，瞿秋白这篇《多余的话》，实在不是‘多余’的，他在字里行间，充分地流露了求生之意；这对于共产党，要算是一桩塌台的事。我觉得象瞿秋白这样历尽沧桑的人，到了如此地步，对死还不能参透，是不会有事，我们不应从这方面去误解他。”赵庸夫一方面利用《多余的话》反共，另一方面也提到瞿秋白还有一篇“笔供”，“长达四千余字，首段叙在沪之生活状况，中段述刚到匪区之感想，末为匪区政治之设施，及其对伪政府之鼓吹，因而不便发表。”（关于这篇“笔供”的主要内容，陈铁健在一九八〇年《近代史研究》第三期作了引录。它全面叙述和歌颂了中央苏区在政治、经济、文教方面取

^① 《过来的时代——鲁迅论及其他》，新知书店1946年版，第32页。

得的巨大成就，驳斥了敌人的攻击和污蔑，并在最后明确表示了自己的革命立场。)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八年五月五日，上海霞社出版了瞿秋白的《乱弹及其他》。霞社的主持人是谢澹如。一九三二年夏至一九三三年春，瞿秋白曾避居上海南市紫霞路六十八号谢家，“霞社”之名即由此而来。瞿秋白在离开谢家时，将一份稿本交谢澹如保存，内有瞿秋白在此期间撰写的杂文、诗、小说、文学论文和译文共五十余篇。谢澹如于本年选择了五月五日这马克思诞生纪念日，以霞社名义出版，扉页印有瞿秋白剪影一幅。他以这本书纪念瞿秋白在文学方面的战斗业绩。这对于保存、流传瞿秋白文学遗著起了很大的作用。

同年六月九日和十日，《文汇报》连载了鹰隼（钱杏邨）《关于瞿秋白的文学遗著》一文。文章回顾了瞿秋白自“五四”以来的文学活动，指出其文学著译是十分丰富的。其中，说到《乱弹及其他》遗漏了发表于左联机关刊物《文学》（半月刊）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只编入了之后发表于《文学月报》的《大众文艺的问题》；事实上，后者“为着‘公开’的关系，不能不弃去‘初稿’（指《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引者）中之不能发表的部分，而‘初稿’因为是秘密发行，故能更充分、更彻底的说明关于普洛文艺大众化的一切。”

一九三九年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文献》第六卷，刊载了《瞿秋白全集》发行预告》一则。预告说：“瞿秋白先生逝世已五年了。他的遗著刊行的，有鲁迅先生辑印之译著《海上述林》，及谢澹如先生辑印

之杂著《乱弹》。顾二书所收，大多为瞿先生后期译著，且未尽。至五四运动以还著作，及后期政论，则全未收入。瞿先生从事政治文化运动，前后凡二十余年，所作文字，不下六七百万言，在政治文化上，所起之影响极大，此伟大之历史里程碑，时至今日，实不能再听其湮没。钱杏邨先生于瞿先生著作，二十年来，搜集甚勤，所藏亦富，瞿先生故后，久有为亡友编辑全集之意，现应本店（风雨书屋——引者）之请，将瞿先生关于文艺部分著译，先行付印。诸凡瞿先生初期著作，苏联通讯，文学译品，以至发表在秘密刊物上之有关文艺文字，靡不搜罗俱备。付印有期。仅先预告其内容卷目，以告爱读先生著作者。”于此可见，钱杏邨于此上海“孤岛时期”已打算出版包括瞿秋白政论在内的全部遗著。这是由于他认识到瞿秋白著译在文化上、思想上的重要意义。可惜由于后来“风雨书屋遭查封，书屋经理人黄定慧他住，出版工作搁置下来”，终未能出版。^①

同年九月，李何林编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书前刊有鲁迅和瞿秋白（称宋阳先生）像各一幅，并称为“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在序言中，对瞿秋白在现代文艺思想史上的地位，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说：“在近二十年中国文艺界中，除鲁迅以外，瞿秋白也站着很重要的地位”，从他的《赤都心史》、《海上述林》和许多论文，“可以看见它的风格底清新、俊逸，漂亮，通俗，深刻，锐利，而且有力！”然后，指出其原因和价值道：

这当然不仅仅由于他的文字的形式，而是由于他的
博大精深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的知识，而是由于他的

^① 《阿英忆左联》，1980年2月22日《新文学史料》第1期。

社会文化斗争的实践。他在现代中国的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和文艺批评上，和鲁迅站着同等重要的地位。他的作风虽有一部分和鲁迅不同，但他二人的学识，思想，文章，在现代的中国实在可称“双璧”！

从现代文学史的角度，对瞿秋白作出这样崇高的评价，这还是第一次。在本书第三编第二章《文艺创作自由问题》中，还阐述了瞿秋白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的价值和论述特点：

“‘左联’方面，首先给‘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文艺理论以严正的光辉的批判的，是易嘉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理论周密透辟，文字通俗漂亮；确为新文学运动以来难得的批评文字，它的本身就是一篇‘艺术品’，有它的艺术价值。”

一九四〇年

一九四〇年，史社刊行《民族解放前驱瞿秋白》一书。封面有“再版”字样；扉页印有两句口号：“为中国革命而牺牲，是人生最大的光荣”（这个口号，见于《瞿秋白同志传》一文中所引的报纸的记载。）和“自己的死是千万群众的生”。篇目与一九三七年三月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殉国烈士瞿秋白》大体相同，可见为此书的再版。唯一不同的，是增加了一篇《王明康生追悼瞿秋白烈士》。目录前，有史社编者的一篇《再版序言》。序言中说：“中伤，诬蔑，挑拨，离间，这些都是罪恶者惯用的伎俩，他们用以抹煞自己血腥的事实，侮辱革命者坚贞的精神。可是真理是不灭的，肉体虽然会腐蚀，然而精神却是永恒的，不灭的。同时更非常明显，这精神的不灭，是须要我们未死的人来肩负的。”这段话，显然是针对国民党报刊和一些反动文人对瞿秋白的歪曲、污蔑而

发的。

八月三日，许广平在《上海周报》第二卷第八期上发表了《留存于鲁迅先生处的几位友人的旧诗集录》。文中一节记瞿秋白和鲁迅的交往，录下了瞿秋白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赠鲁迅的两首诗：“雪意凄其心茫然……”和“不向刀丛向舞楼……”（两首都无标题，所引为其首句；前一首是瞿秋白青年时代的旧作。）文中赞美瞿秋白和鲁迅的友谊，并对瞿秋白及其旧体诗进行评论说：鲁迅和瞿秋白“都是饱学健谈者，所以畅叙积愫，大至天下国家，小至私人生活，是尽情地倾诉，毫没有芥蒂的，除了三位数十年相处的老友之外，鲁迅先生要算和瞿先生最意气相投的了。”瞿秋白“对于旧学也很有研究，旧诗的造诣很深，而且字里行间，时常显露出他的天才成分”。

同年十一月一日，东方曦（孔另境）在《宇宙风》乙刊第三十二期发表《记瞿秋白》一文。文章回忆了一九二五年听瞿秋白讲授《社会科学概论》、一九二七年与瞿秋白在党的一个机关相遇以及一九三二年瞿秋白在作者亲戚家（当为茅盾家）居住时的情况。作者这样评述瞿秋白的讲演风格：“瞿先生的声调始终没有怎样高昂，他的全篇演词非常冗长，可说完全是学术讲演的方式，中间并没有什么激昂慷慨和声色俱厉的表现，这和我们平日习见习闻的那些革命领导者的鼓动式讲演完全异趣。”对于瞿秋白的日常生活和气质风度，作者有这样的感受：“从他的谈话里，知道他决不会放弃自己的政治活动的；可是我从他的日常生活里，仿佛觉得他不象一个政治家。从他的外表上，他没有一般政治家那种锋芒；从他的行动上，他没有一般政治家那种气概；即使在他的谈吐上，也没有一般政治家的滔滔善辩；要说他是一位政治家的话，那末只有在他那支生龙活虎的笔杆上了。我读了他的文章，才恍然于他之确为一位革命领导者，——不过，应该说是一位革

命理论家似乎较为更合适些。“文章最后对瞿秋白的被害，深表痛惜：“‘死’对于瞿先生原算不得一种威胁，他已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的‘死’，而死也正得其所。可憾的是以他这么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物，而竟来不及参加新中国的创造，岂非是新中国的一大损失么！”

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一年五月，中国拉丁化书店出版了倪海曙编的《中国拉丁化运动年表》。这份年表第一次较系统地记录了瞿秋白在汉字改革上的劳绩。

年表说，瞿秋白于一九二一年受到当时苏俄“广大的化除文盲运动的影响开始研究中国文字拉丁化问题，写成了最早一部分的初稿。”（按：据其上文，当时苏俄的扫盲运动，是十八个土耳其民族，由新土耳其字母委员会领导，开始废除旧有的繁难的阿拉伯字母，改用拉丁化新字母。这个拉丁化新字母方案，在雅克托由政府公布。）此外，年表还在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一年等年份里提到瞿秋白的文字改革工作。其中较为详细地概述了瞿秋白的《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学阀万岁！》、《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的中国文？》、《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这四篇文章的内容。年表指出，从瞿秋白的汉字改革工作，“可以得到确切的证明：拉丁化中国字并不是外国人代我们所造的，而是跟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一样，也是中国人自己所创制的。”年表显然将瞿秋白视为汉字拉丁化的创始人之一。

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前，曾深深思考如何解决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其间，他提到瞿秋

白，并对他在文化工作上的作用作了很好的评价。此据李又然发表于一九八二年《新文学史料》第二期的《毛主席——回忆录之一》，李又然回忆说：“一天，又去看毛主席，……毛主席站在窑洞中间，很高兴。谈话中我提一句：‘毛主席，文艺界有很多问题！’主席一听，脸上立即显出愁容……一声不响。我跟过去，站在主席右边，窗子对面。隔了很久，主席气愤地说：‘怎末有一个人，又懂政治，又懂文艺！’‘要是瞿秋白同志还在就好了！’”在发表讲话后，讲稿“放了半年才拿出来。在这半年之中，主席阅读了《海上述林》等等。”

李又然的这段回忆，可以从肖三《忆秋白》一文（载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得到佐证。肖三文中说：“一九三九年五月，我回到延安，……一天晚上，我从毛主席的住处告别出来，……到了鲁艺（我就住在这儿），车停了要修理。我们下车在月下散步。我谈起牺牲了的老友叔衡、和森、秋白，特别是后二人正值壮年有为之时，不幸牺牲，可痛可惜！毛主席沉默了许久，对前二人没说什么。关于秋白同志，他说：‘是啊！假如他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言之不胜惋惜。”

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指出，瞿秋白所主持的“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在此以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二八年四月不到半年时间里，他却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但是，一九三一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

的绝大多数同志”，如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接着，决议写道：

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着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党的庄严的决议，不仅明确指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对瞿秋白的打击是错误的，而且确认他最后是英勇牺牲的，确认他具有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

一九四六年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重庆《群众》周刊第一卷第七期发表淡如的《瞿秋白最后的话》。文章回顾了瞿秋白被捕和英勇牺牲的经过，并以深深的敬意，表示：“瞿先生虽然死于反革命之手，但是瞿先生的不屈不挠精神，早已装备了每个革命同志的头脑。我们永远不忘瞿先生最后的一句话：‘共产党人是杀不尽的，没有共产党人，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同年八月，肖三在《北方文化》第七、八期发表了《纪念瞿秋白同志殉难十一周年》一文。文章略述了瞿秋白生平事迹，最后也叙述了瞿英勇牺牲的经过，说“六月十八日早八时枪毙前，秋白同志大喊：‘为中国革命而牺牲，是人生最大的光荣！’步入刑场时，态度镇定，谈笑自若，高唱国际歌和红军歌各一曲，观者都肃然起敬。”

同年七月一日，新华书店晋察分店印行了《乱弹及其他》一

书，以纪念瞿秋白牺牲十一周年。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印行《乱弹及其他》的第一种印本。后附一篇《出版者后记》，对此书作了正确的评价：

那时秋白同志在上海，领导着左翼文化斗争，在极端反动统治下，他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特别的文章形式，来评论那时的文艺问题，这和鲁迅先生一样，如空谷的足音，引起普遍的反响，是新文学运动的最重要文献之一。

一九四七年

一九四七年二月五日，上海《新文化》半月刊第三卷第三期发表了朱年的《关于瞿秋白二三事》。文中同李何林《近二十年文学思潮论》的《序》一样，认为“中国近代大思想家中，瞿氏与鲁迅二人，堪称‘双璧’。”指出“瞿氏在文化思想方面的贡献，永远有他的历史价值，特别如文艺大众化的号召，新文学运动的提倡等功绩，是谁也磨灭不了的。我们应遥向他学习，踏着他的脚步前进。”

同年七月五日，胡绳在《野草》第四期发表了《读秋白遗文》。文章指出人们对瞿秋白的政治论文注意不够，有待整理研究。其实，“从其透辟的见解和锐利的远见中至今是依然散发着光辉的”。如一九二三年的《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清楚分析了知识分子有两种，以及革命知识分子与主力军工农群众的关系；又如一九二六年的《最近中国之中央政府问题》，深刻揭露了军阀政府制宪、行宪的虚伪和拥护曹锟宪法的保皇党张君勱的反动本质；再如一九二五年一篇评论义和团的文章（即《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引者），一反过去对义和团的片面指责，正确肯定它是被压迫劳动群众反帝的表现，同时指出它缺乏阶级的觉悟。这

些都表现出瞿秋白的政治远见和深邃的洞察力。

同月，冯乃超选了瞿秋白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和论文学大众化论文六篇共七篇文章，集成一小册子，书名《论中国文学革命》，署“瞿秋白著”，由香港海洋书屋出版。冯乃超写了《后记》，充分肯定了瞿秋白对文艺理论的贡献：

他的文艺批评文字纠正了当时不少作家及文艺理论工作者的错误倾向。他对于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留下了很宝贵的意见。他又是最先用马列主义方法来处理中国文艺问题的人。

《后记》对《〈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最为重视，认为它“分析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作家的发展过程，指出‘五四’以来各个论争的意义和鲁迅先生在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总结了新文艺运动以来到一九三二年间的文艺思想斗争的经验。这一篇文章，成为中国文艺理论上的光辉瑰宝。”对其他六篇论文，冯乃超认为“从理论上解决了大众文艺的问题”，并在解放区已初步实践着了。而对于尚未解放的地区的有志于“发展文艺的大众化”的青年，自然更有学习的必要。冯乃超的这些评论，是颇有见地的。

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八年一月，王士菁的《鲁迅传》由新知书店出版。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鲁迅传记。书中写到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论争革命文学问题时，说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此的分析，“有极精确的见解，首先指出了‘革命文学家’的阶级根性”，又“指出了这些‘革命文学家’们的错误。”写到一九三二年关于文学大众化的讨论时，还介绍了《大众文艺的问题》和《再论大众文艺

答止敬》两篇文章的内容，特别是关于语言文字的意见；他同一九三四年《语文论战的现阶段》的作者文逸一样，认为一九三四年的“大众语”运动是由瞿秋白这些文章引起的，并且鲁迅也是坚决主张废除方块汉字的。

黎明以后

一九四九年，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一个光明的新中国诞生了。瞿秋白终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终于胜利了。

这年四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力，迅疾推进，解放了大江南北广大地区，迎来了普天阳光。六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及各方面代表人士，在北平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着手建立全国政权。自此以后的十七年里，人民一直以钦佩的心情，追念为革命政权献出生命的先烈们，并以激励自己为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瞿秋白自然也活在人民心中，并且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尤其是在解放初的几年里，每逢六月十八日，报刊上都发表大量纪念瞿秋白的文章，叙述他的革命事迹，颂扬他的战斗精神。对他的研究，也不断有所加深；尤其是对他的文学活动方面，有更多的评论。而总的评价，保持着解放前党和革命前辈们的结论，稳定不变，就象革命政权一直是稳固的一样。因此，这个时期的概述，将更简括，以避免重复。

一九四九年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如上所述，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会筹备会在北平召开，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两天之后，正值瞿秋白牺牲十四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及后几天里，许多知名人士纷纷在

报纸上发表了纪念瞿秋白的文章。如吴玉章的《纪念瞿秋白同志》（载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茅盾的《瞿秋白在文学上的贡献——瞿秋白逝世十四周年纪念》（同上），杨之华的《秋白和鲁迅》（同上），胡愈之的《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模范》（载六月《光明日报》），叶圣陶的《回忆瞿秋白先生》（载六月二十八日《新民报晚刊》），柳亚子的《谏瞿秋白》（同上），郑振铎的《回忆早年的瞿秋白》（载七月十八日《文汇报》）等。

这些文章，除了赞颂瞿秋白的革命战斗精神外，还在以下几个方面肯定了瞿秋白的贡献：

瞿秋白创制的拉丁化字母开辟了中国新文字发展的道路。一九二八年，他与吴玉章、林伯渠等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时，写成了《中国拉丁化字母》小册子；“一九三一年九月中国工人在海参威召集了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他的这本小册子作出了中国新文字的新方案，这就使中国文字改革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开辟了中国新文字发展的道路。”（吴玉章的《纪念瞿秋白同志》）

瞿秋白对于语言大众化提出了卓越的主张。“他首先提出了‘大众语’问题，发表了卓越的主张；他又不遗余力地抨击了那非驴非马的‘五四’文腔”。在抨击过程中曾发生过对五四新文学估计过低的偏向，但在觉察之后，“绝不固执己见”，尔后的意见“平稳得多了”。（茅盾的《瞿秋白在文学上的贡献》）他正确地强调了白话文的语言应当以口语俗语为源泉。“写作上运用的口语，在白话文运动当时没有详细研讨，大家各随其便，保持文言的语汇跟句式，模仿欧洲的语汇跟句式，只不过换了些‘的了吗呢’，结果成了一种能看不能说不能听的语言，（引者按：这些话是对瞿秋白有关批评的准确概括）……如果推究谁关心这个问题最早，恐怕要数秋白先生了。”（叶圣陶：《回忆瞿秋白先生》）

瞿秋白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我们组织了一个研究文学的团体，名为‘文学研究会’，我们五个人（引者按：据前文，五人是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都是发起的人。”（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

一九五〇年

一九五〇年三月和六月，许多报刊发表了十篇回忆、评论瞿秋白的文章。其中李伯钊的《回忆瞿秋白同志》（载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第一次比较具体地记录瞿秋白一九三四年至三五年任苏区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期间，领导群众性戏剧活动的事迹。此外，还有《瞿秋白对于中国文字改革的贡献》（载六月《文艺报》第二卷第七期）一文，认为“瞿秋白先生提倡的拉丁化新文字，吸取了过去各种文字改革方案的宝贵经验，无疑地是形成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最高发展”。

一九五一年

一九五一年六月，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出版。书中论及了瞿秋白在党史上的功过。在第一部分《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里，提到一九二七年四月下旬召开的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任弼时等同志批评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在第二部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叙述党的“八七”会议时说：“在这个会议上彻底地纠正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并撤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后又指出，“但是在革命失败的形势下，”“因为错误地估计当时的形势为革命仍在继续高涨，拒绝承认革命的失败，党在瞿秋白同志的领导下，在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春曾陷入‘左’倾盲动主义，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因而使保留

下来的革命力量继续受到不少损失。”

本年二月，六月、七月、九月和十月，还有十五篇纪念和评论瞿秋白的文章和一份年表发表于报刊。

纪念文章方面，曹靖华的《罗汉岭前吊秋白并忆鲁迅先生》（载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记述了访问瞿秋白就义处长汀中山公园时的见闻，回忆了自一九二二年以后与瞿秋白交往的经过。其中关于瞿秋白在苏俄扶病写作的情况，在北京翻译《国际歌》的情况，颇为珍贵。文中还说到，约在一九二八年，瞿曾对作者说：“应当把介绍苏联文艺作品与文艺理论工作，当作庄严的革命政治任务来完成”。

《瞿秋白同志年表初稿》（载六月十日天津《进步日报》）简略记述了瞿秋白历年的活动，但主要记其著译篇目，且脱漏甚多。

另外，丁易的《文艺第一次和兵农结合》（载二月十六日《新中华》第十四卷第四期）和王瑶的专著《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九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有关章节，从文学史角度高度评价了瞿秋白对新文学的贡献。王瑶的书（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本现代文学史专著），在阐述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七的新文学时，多处引录了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的有关论述，并指出它对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论争的评论是“精到”的，对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论述是符合实际的。关于瞿秋白的杂文，认为“泼辣有力”，“是当时的指导性文字，也是革命前驱者的丰碑。”

一九五二年

一九五二年六、七月间，许多报刊发表了回忆和纪念瞿秋白的文章约十一篇；另有一篇《瞿秋白同志年表初稿补遗》（载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大公报》，所补仍很简略）。

在回忆文章中，郑伯奇的《回忆瞿秋白烈士》（载六月十八日

西安《群众日报》），记述了一九三二年瞿秋白对他的《大众化的核心》（署名何大白）一篇短评的批评。郑在那篇短评里，认为文学大众化“第一重困难在大众自己”，表现出一般知识分子对工农劳动群众的轻视。瞿秋白为此写了《“我们”是谁？》一文，并经夏衍约见了郑伯奇，以宁静和蔼的态度作了一次长谈。这给郑伯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称瞿秋白是“亲切的导师”。

同年八月，冯雪峰的《回忆鲁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非常忠于史实的、材料丰富的具权威性的鲁迅回忆录。其中有一个专节为《关于他和瞿秋白同志的友谊》；另外，在《我对于他的思想方法和他的天才的特征的一二理解》、《鲁迅先生对左联的态度》、《在病中和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的他的情绪之二》等节，也谈到瞿秋白。这些文字记录了鲁迅对瞿秋白文艺大众化思想和文学评论（包括《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肯定、对瞿秋白杂文的评论、对瞿秋白之死的悲愤，和编校《海上述林》以纪念瞿秋白等事迹；同时也叙述了瞿秋白对鲁迅的由衷钦佩和信任。作者还深刻分析了他们的友谊的特征，指出他们的友谊“主要的根源，是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人类的共产主义的胜利而奋斗的共同的思想和行动”，赞美他们的友谊“超过任何旧时代所谓的‘私谊’”，表现出象劳动人民那样的朴实真挚的感情和革命者的赤诚无私的品质。

一九五三年

一九五三年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之后，载有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的注释（五），概述了瞿秋白一生的经历，也有对他的评价。注释全文如下：“瞿秋白同志，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至第六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秋白同志曾积极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戴季陶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曾主持召集八月七日的党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但在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他在担任中央领导工作时曾犯过‘左’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三〇年九月，秋白同志主持召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危害党的立三路线的执行。但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却受到了‘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从这时到一九三三年的一个时期，他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一九三三年到江西红色根据地，担任工农民主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红军主力长征时，他被留在江西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三月，秋白同志在福建游击区被蒋匪逮捕，六月十八日就义于福建长汀。”

同年十月，《瞿秋白文集》第一册（含第一、二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瞿秋白文集编辑委员会撰写了《序》^①。《序》说明文集将共为四册八卷，收瞿秋白在文学方面的创作、评论和翻译的重要作品。政治方面的遗著将另行处理。

《序》全面评价和分析了瞿秋白及其文学遗著的地位和特色：

不屈不挠的共产党员，不朽的烈士，瞿秋白同志，他的一生是完全献给了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他的革命活动，主要的是在党的工作和实际的政治斗争方面。他留给了我们数量很大的著作，大部分也是关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论著与译述。但瞿秋白同志又是一个著名的

^① 《序》是由冯雪峰执笔的。

有天才的革命作家、批评家和文学翻译家，虽然他不曾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文学活动，可是他所留下来的文学著作，不仅分量仍然不少，而且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十分宝贵的财产。

这些作品所以宝贵，首先因为它们的作者在文学活动上也和在革命实际活动上一样，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战士。这些作品鲜明地表现出，它们的作者对于旧文化、旧中国和人民敌人的态度，始终都是挑战的、进攻的。这些作品，不管是创作、批评、研究，以至于介绍和翻译，都尖锐地反映着时代的意义，都具有明确的社会斗争的目的。它们的一个很突出的根本性的特色，就是贯穿着一种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精神，贯穿着对于社会的一种现实主义的、彻底的态度。这一个特色使我们看见，对于一个革命者，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和在什么机会之下，文学都是战斗的工具，用它来批判社会、打击人民的敌人，也用它来启发与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斗争；同时也使我们了解，这种特色正是“五四”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最好的传统精神。大家知道，瞿秋白同志，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是一个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当他受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影响之后，他是中国最早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先驱者之一。“五四”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传统精神，就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战斗精神；瞿秋白同志就是这种精神的重要代表者之一，他的这些作品完全可以说明这样的意义。

这段文字，正确指出了瞿秋白文学论著具有明确的革命目标和现

实主义的战斗精神。接着，《序》还指明了瞿秋白文学论著的重要历史地位：“这些作品在过去反动统治的黑暗时代，曾经在革命文化战线上进行过冲锋陷阵的斗争，在文艺思想上发生了不可磨灭的巨大的影响，即在今天也仍保有它们的战斗作用。”“这些作品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都具有纪念碑的意义，不仅因为它们曾经尽了开辟的作用，同时也因为在文学上有其不会被后代遗忘的辉煌的建树。”然后，《序》又具体地对瞿秋白的散文、杂文、文学批评、语言文字上的研究、文学翻译等方面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序》的最后，也指出瞿秋白在个别论点上存在偏向，如对“五四”文学革命和白话的成绩和意义估计过低，在论述语言大众化问题时“有个别的句子会使人误解好象语言是有阶级性的”。但他关于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意见，“在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相一致的。”

《序》的论断，对评论者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时期关于瞿秋白的许多评论文章，从基本观点上说，可以说没有明显的不同意见和重大的超越。

同年二月、六月、十一月，还有约十二篇纪念和评介瞿秋白的文章，发表于各种书刊。其中，《文艺报》编辑部的《〈瞿秋白文集〉第一册出版》一则介绍（载十一月十五日《文艺报》第二十一号）中说：“我们希望这个文集的出版，能够引起大家对瞿秋白同志遗著的切实研究。”

一九五四年

一九五四年六月、七月、八月，许多报刊发表了纪念和评论瞿秋白的文章约十篇。此外，《解放日报》五月二十四日报道福建长汀县建立了“革命先烈瞿秋白同志纪念碑”，六月十九日又报道长汀人民在罗汉岭下悼念瞿秋白就义十九周年；新华社六月三日

报道了杀害瞿秋白烈士主犯二人伏法的消息。

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五年是瞿秋白就义二十周年。

本年六月十八日，新华社报道瞿秋白遗骨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安葬。（遗骨是一九五四年由福建长汀县运到北京的。）同日，新华社还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安葬仪式上发表的《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这个报告指出“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简述了他一生的重要经历和在政治上、文化上的贡献。报告最后说：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的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

同年二月、六月、七月，许多报刊发表了回忆、纪念和评论瞿秋白的文章近三十篇。其中有下列几篇比较重要。

六月十六日《新观察》第十二期上郑振铎的《纪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详细记述了瞿秋白一九一九年前后参加五四运动和参与编辑《新社会》旬刊的情况。文章说，瞿秋白在五四运动中是俄文专修馆等几个大专学校的学生领袖之一；在编辑《新社会》旬刊和撰写的文章中，“已有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

同期刊载的丁景唐的《瞿秋白同志在上海紫霞路的时候》，根据反复调查，准确叙述了瞿秋白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的文学活动，考证了瞿秋白与鲁迅初次见面的时间、地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上茅盾的《纪念秋白同志，学习秋白

同志》，认为《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能促使人们切实走上革命道路；认为批判“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是到那时为止的一篇最谨严、说服力最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章”；指出瞿秋白文论的一个特点，是从文艺同政治任务的密切结合上提出问题来。

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上陈涌的《继承瞿秋白同志的文学理论遗产》，正确概括了瞿秋白文论的特点和价值。文章说：“瞿秋白同志的文学理论遗产最可宝贵的部分就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做了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在于他在文艺领域内坚持工人阶级的观点，坚持党的方向；在于他保卫马克思主义，和当时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进行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瞿秋白在他的全部文艺理论活动中特别鲜明地表现出他的高度的党性，高度的原则精神。”

六月三十日《文艺报》第十二期上夏衍的《追念瞿秋白同志》，回忆了瞿秋白三十年代初期的文学活动。文章说，瞿秋白受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打击之后，仍然态度安祥，奋发工作，表现出“高度的党性，高贵的品质”，表现出“旺盛的斗争性和高度的责任感”。

此外，本年七月、十二月出版的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和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第一卷内，都有关于瞿秋白的章节。此后十年中，各种现代文学史专著也都列有专章或专节。

一九五六年

一九五六年六月、九月和十月，一些报刊发表了关于瞿秋白的评论和考证文章十余篇。其中，了景唐的《从〈鲁迅日记〉看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载十月十六日《萌芽》第八期）一文，叙述、考核了瞿秋白和鲁迅交往中的许多史实，以及鲁迅为悼念瞿秋白

而亲自编校、出版《海上述林》的经过，热情歌颂了他们的崇高友谊。

此外，五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刊载一则消息，说人民大学历史档案专业展览会展出瞿秋白一九三一年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是“党发布的档案最早的一个文件”。

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七年全年每个月都有关于瞿秋白的考证、回忆和评论文章发表，共约三十篇。

其中，丁景唐《关于〈乱弹及其他〉的出版》（载一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的《新民报晚刊》）、《关于〈引玉集〉——瞿秋白和鲁迅友谊的一例》（载一月二十九日《文汇报》）等考证文章有较大价值。丁景唐的《瞿秋白笔名、别名集录》（载《学术月刊》八月号和九月号）更给研究者提供了极重要的线索。秦耐铭的《回忆瞿秋白烈士》（载无锡《工人生活》第六期）为瞿秋白少年时期在无锡乡间的活动提供了资料。

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八年一月至七月和十二月，许多报刊发表了回忆和评论瞿秋白的文章约二十篇。

其中，一些文章（如《瞿秋白和〈热血日报〉》，载一月二十九日《新民报晚刊》；《五卅运动中的〈热血日报〉和〈上大五卅特刊〉》，载《学术月刊》五月号），谈到瞿秋白在“五卅”运动中主办《热血日报》的情况。

杨之华的《忆秋白》（载中国青年出版社七月出版的《红旗飘飘》第八期），详细记述了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五年瞿秋白的一些革命活动和生活细节，提供了不少重要史实。例如具体描写了

瞿秋白一九二七年支持出版《湖南农民革命》（即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为之作序的经过，和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与陈独秀、彭述之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情况等。这些史实过去很少见诸文字。

除文章外，六月，丁景唐的《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内收有关瞿秋白的文章十三篇（包括前述《瞿秋白同志在上海紫霞路的时候》等）和一份《有关瞿秋白同志生平及其著译的参考资料目录》。七月，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学史概要》中，评述了瞿秋白在大众语问题上的得失，书中说：“这次论战狠狠地批判了当时白话文中许多不健康的现象，提醒大家写文章必须面向人民大众，务求写得通俗易懂，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并且在当时政治上也起了一定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假如一定要说什么‘新兴阶级的普通话’、‘农民的原始语言’、‘绅士等级的语言’、‘乡下人的语言’，‘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只是“上层小资产阶级与一般知识分子的所有物”’等等，就跟马尔的语言是有阶级性的，全民语言并不存在的说法没有什么分别了”。九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曹子西编著的《瞿秋白的文学活动》一书，系统介绍了瞿秋白的文学著译。

一九五九年

一九五九年是瞿秋白诞生六十周年。

一月，丁景唐、文操的《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十月，再版。内容包括：瞿秋白的著译系年目录；著译专集书目；著译选集、合集书目；所编选、校阅、题签、作序、译序书目；建国后出版的著译书目；建国后出版的合集、编选、作序、译序书目；所自编的未刊书目；以及瞿秋白笔名、别名集录。瞿秋白一生著译浩繁，笔名、别名又多，目录编者自解

放以前就开始搜求、考证，积十余年之力，所收相当充备，为瞿秋白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这本目录本身，也有力地显示了瞿秋白的战斗业绩。

本年每个月都有评论和回忆瞿秋白的文章发表，共五十余篇。其中不少是对瞿秋白文论的评述，还有一些是对瞿秋白散文、杂文和诗歌的分析。其中四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五四”散文选讲》，对他五四时期的六篇散文逐一进行了简明的讲解。

此外，本年九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官艾明的小册子《瞿秋白与文学》，对瞿秋白的文学著述作了系统的分析。十一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瞿秋白笔名印谱》。

一九六〇年

一九六〇年每月都有评论瞿秋白的文章发表，多为对瞿秋白文学论著的评论和对他的文学作品的分析。此外，有一篇《瞿秋白同志论语言问题》（载《合肥师范学院学报》第五——六期），评价了他关于语言文字的研究，认为存在着缺点和偏向，如“忽略了古代文学语言和现代文学语言的联系，贬低了旧白话文学语言的价值”；“在论大众艺术的语言问题上有个别句子会使人误解为好象语言是有阶级性的”；“在《新中国文草案》里主张拼音语言，不标声调，忽视了语言的特点”；等等。至于贡献，文章的提法，与一九五八年科学出版社的《语言学史概要》中所说完全相同。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一年五月，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本书第十一节《瞿秋白与鲁迅》，详细回忆了瞿秋白与鲁迅交往的始末（其中记述了瞿秋白三次避居鲁迅寓所的情况，但对第二、三次避难的回忆不确切），生动描述了他们深厚的革命友谊。

六月至十月，一些报纸发表了关于瞿秋白的评论和考证的文章十余篇。其中丁景唐的《为〈瞿秋白文集〉订误》一文（载九月七日《新民晚报》）值得一读。

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二年一月、六月和十二月，一些报刊发表了关于瞿秋白的评论和考证文章约十篇。

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关于瞿秋白的文章甚少。四年中仅十余篇，而且多是小故事和琐屑考证而已。特别是从一九六四年起，瞿秋白已很少为人提起。不过一九六六年四月五日，在新华社关于清明节悼念革命烈士的报道中，瞿秋白的名字，尚列于众多烈士中间。新华社报道题为《清明时节各地人民悼念革命先烈》（载四月六日《人民日报》），其中说：“最近几天，还有许多人前往北京市革命公墓悼念先烈。在瞿秋白、任弼时、林伯渠等先烈的墓或灵堂前，摆着人们献的花圈和花束。”

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发表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通知》，掀起了“无产阶级专政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风暴，党和国家开始遭受严重的挫折，革命先烈瞿秋白也就随之蒙受奇耻大辱，沦为“叛徒”了。此距一九四九年六月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以迎接新中国诞生和众多知名人士发表文章纪念瞿秋白，正好十七年。

十年动乱

在革命先烈中，瞿秋白是“文化大革命”这场空前政治动乱

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五·一六”通知公布后不久，瞿秋白就被公开称为“叛徒”。其根据是《多余的话》。这个罪名按在他头上，时间达十年之久。制造这一罪名的人，主要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及其一伙，还有一批狂热的造反者和许多见风使舵或不明真相的人们。一九六七年后，不少无知而狂暴的青年“英雄”们，砸碑掘墓，出版“战报”一类小报，大举讨伐，抛出无数不值一驳的污蔑不实之词。与此同时，公开的报刊上也频频与之呼应。下面将择要摘编。

一九六七年

一九六七年一月，北京师范大学一个“造反”队，开始出版《讨瞿专号》，并与常州等地的追随者，砸了常州西郊公墓中瞿秋白母亲金衡玉的墓。（此墓于一九六二年在常州市政府主持下建立，墓碑刻“瞿秋白烈士金太夫人之墓 媳杨之华女 瞿轶群 敬立。”）

同年五月六日，北京政法学院等“造反”队开始出版《讨瞿战报》，十二日，又往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砸了瞿秋白的墓。后来《讨瞿战报》“意气风发”地报道说：“政法公社的战士们”“来到八宝山烈士公墓后，即用粗大的绳索套在叛徒瞿秋白的墓碑上，同仇敌忾、齐心协力地推翻了墓碑。接着，战士们又以满腔的阶级仇恨，抡起铁锤和铁镐狠砸，……经过四个小时的紧张战斗，终于把大叛徒瞿秋白的墓砸得粉碎！”（《讨瞿战报》六月五日，第三期）他们的砸墓“伟举”，很快张扬开来，助长了“造反”声势。

自五月二十日起至十二月二十日，《讨瞿战报》出版了二十期（半月一期），流行甚广。它发表了许多署名和不署名的文章，以“造反派”特有的强暴和武断，大肆污蔑瞿秋白。它声称“《通知》是讨瞿工作的指针”（六月二十一日，第四期），给瞿秋白戴上

种种“反革命”的帽子。诸如：“大叛徒”、“老牌的机会主义者”（五月二十日，第二期）、“帝国主义的应声虫和辩护士”（同上）、“假革命”（六月二十六日，第五、六期合刊）、“奴才”（十二月四日，第十八期）。它称瞿秋白真实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现实和记述自己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心灵历程的《赤都心史》，是“叛徒嘴脸的自我写照”（十一月二十日，第十六期），称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名著《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是“投降主义的宣言书”（十二月二十日，第二十期），称正确总结了鲁迅思想发展过程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十月二十六日，第十五期），还说他在与鲁迅的交往中“欺骗鲁迅”（八月二十五日，第十期）。这种种，真正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至于对《多余的话》，更如同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报刊一样肆意曲解，横加污蔑，并还有其新的“论据”，那就是一九六三年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与此同时，还连篇累牍地恶毒攻击肯定瞿秋白的陆定一、周扬、罗瑞卿、杨之华等同志。在所谓“批判”文章的作者中，包括一些过去高度颂扬瞿秋白的人士。所有“批判”文章，既无可靠根据，又无具体论点，只是一味漫骂而已。

一九六八年

一九六八年一月，《讨瞿战报》继续出版了几期，重复攻击《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说是“射向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新国的支支毒箭”（一月五日，第二十一期），又把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社会科学概论》，说成是散布“在国家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谬论”的“毒草”。

同月，北京师范大学那个“造反”队，将他们去年《讨瞿专号》上的文章和另一些他们编写的材料，集纳成《瞿秋白批判集》出版。内容与《讨瞿战报》大同小异。

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三年

这五年间，报纸上一些“学习”党史的文章提到瞿秋白时，常冠以“‘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叛徒”的帽子，但大多是简单的裁决，没有具体的内容。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回忆”文章，对瞿秋白进行了具体的“揭露”。文章说：“鲁迅认为那些口头上说得漂亮、实际上并不实行的空头理论家是‘毫不足靠’的。他对‘左’倾机会主义者瞿秋白就是一个例子。有一次，瞿秋白写了一个纸条给鲁迅，署名‘犬耕’。后来，鲁迅问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他说：‘搞政治，我实在不会搞，我搞政治，就象狗耕田！’鲁迅对此深为不满，当面批评了他。后来鲁迅在编《海上述林》时，只收瞿秋白的翻译，而不选他的文章，这就证明马克思主义者鲁迅对瞿秋白是有保留的。”（按：此处所说“犬耕”的真正含义，笔者在《瞿秋白的思想发展及其特点》一文中已作了评析，不赘；至于“不选他的文章”，本概述在一九三五年部分引录了鲁迅的一封信的内容，已可说明鲁迅并非不想编选瞿秋白的创作，丁景唐《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一书中《关于〈乱弹及其他〉的出版》一文及其附录《鲁迅的一张“借书单”》，更足以证明其错误。）

此外，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起，有一份在上海流传的油印稿《关于鲁迅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中批判的〈汉奸的供状〉一诗作者芸生的问题》，断言“芸生就是瞿秋白”，“《汉奸的供状》是出于瞿秋白的手笔”，“是瞿秋白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必然结果”。（按：

“芸生”究竟是谁？一九八〇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之注释(3)已明确指出：“芸生原名邱九如，浙江宁波人。”另外，可参阅一九八〇年《新文学史料》第一期《冯雪峰谈左联》一文中所说：“大概解放后在北京有一

次邵荃麟偶然谈起时说过：‘芸生就是邱九嘛，宁波人，当时是党员，现在已死。’这话我记得的，因为邵荃麟也是宁波人，所以我相信他说的是确实的。”再，还可参阅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中《芸生是谁？》一文。）

一九七四年——一九七六年

一九七四年一月，开始了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不久，“四人帮”一伙控制的中央党校编选了一本《鲁迅批孔言论摘录》，以小册子形式出版，发行一百万册。后发现其中摘编了瞿秋白用鲁迅笔名所写的《王道诗话》和《大观园的人才》两文的三段话，急忙下令全部收回。

本年至一九七六年，在一些大学学报上，陆续发表了约五篇“批判”瞿秋白“歪曲”、“贬低”鲁迅的文章。这些文章，在政治上，大多在“批林批孔”政治形势影响下，以极端简单片面、形而上学的方法，指责瞿秋白在鲁迅研究中宣扬“天才”论、“直觉”论，贬低了鲁迅前期思想的革命内容，延缓了鲁迅世界观转变的时间，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对鲁迅的指导等等，总之是说瞿秋白用唯心主义观点歪曲了鲁迅。（它们的指责，一九七九年后，受到不少同志的反驳。）

一九七五年，还有一封信在一些部门流传，也认为瞿秋白歪曲、贬低了鲁迅。其内容，后来朱正在《鲁迅回忆录正误》的《关于鲁迅保护瞿秋白的经过》一文的注释作了披露，此处从略。

拨乱反正

一九七六年十月，党和人民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大地回春，日月重光。不过在开头几年，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并未很

快消除。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开始拨乱反正。三中全会提出的思想路线，将人们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封建式专制主义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党的实事求是原则重新恢复和发扬。在实事求是原则下，大量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学术界也开始形成百家争鸣的民主空气。这样，势所必然，瞿秋白的“叛徒”罪名得到洗刷；并且对他的研究比“文化大革命”前更为深入和广泛（不再侧重于他的文学活动）了，对他的功过得失的评论也更全面客观了。这样的研究尚在继续，我们的概述将到一九八二年为止。

一九七七年

一九七七年初，一所大学的学报发表《试论鲁迅前期的思想——兼驳瞿秋白、姚文元对鲁迅的歪曲》一文，以简单粗暴的形而上学方法，将姚文元与瞿秋白相提并论，指责《〈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通过贬低鲁迅为‘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张目”，“暴露了自诩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瞿秋白完全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

一九七八年

一九七八年五月，《文艺报》第五期《鲁迅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文，针对将瞿秋白与姚文元相提并论的问题，指出：“其实，说鲁迅‘从进化论跃进到阶级论’，这并不是姚文元的发明创造，而是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一文的基本观点。这个论点不仅没有什么错误，而且完全符合鲁迅的思想发展实际，也深得鲁迅的首肯，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经过了历史检验的马列主义的科学论断。”文章认为，“我们应当象列宁评价普列汉诺夫那样，对他做出一分为二的科学评价。”

同年十二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玉章的《文字改革集》中《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语拼音字母的总结》一文（与黎锦熙合写于一九五七年），提到瞿秋白在提倡汉语拼音字母方面的贡献和不足。文中说：“1926年产生了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制订的‘国语罗马字’，至1928年由南京的大学院正式公布。接着，1931年产生了由瞿秋白、吴玉章等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是中国人自己创制的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大大超越了它们之前的各种同类方案，……如果说国语罗马字的缺点是标示声调的办法过繁，那末拉丁化新文字的缺点就是过简、完全不标声调。拉丁化新文字曾经在居住苏联远东边疆的华侨中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解放区中推行试用过。”

一九七九年

一九七九年出现了大量评论瞿秋白的论文和少量回忆文章，约三十余篇，所涉问题相当广泛。

一月，《历史研究》第一期刊载的《打破党史禁区》一文中，提出了应当重新评价瞿秋白的问题。

专论瞿秋白的文章中，最多的是评论《多余的话》。其中，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载三月《历史研究》第三期）发表最早。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多余的话》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的，襟怀坦白而又心情复杂的人，在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仅无损于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它既有长处，也有弱点；既有令人夺目的光辉，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文章认为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光明磊落地、坦率深刻地解剖了自己的政治家和文人的矛盾、马克思主义

和绅士意识之间的矛盾，虽流露出灰暗、消沉情调，但没有改变革命的信仰，丧失革命的信心，因而决不是“叛变革命”的表现。此后，又有三四篇专论《多余的话》的文章和书信发表。沈雁冰的《关于〈重评〈多余的话〉〉的两封信》（载《历史研究》第九期）认为陈文“持论公平”，并提到瞿秋白给鲁迅信中署名“犬耕”一事，指出这只是表现他“冷静的自我解剖”。其余几篇文章，有的观点与陈文相同；有的有所不同，认为它的“主要思想倾向是错误的”，“不是什么严格解剖自己，而是一个共产党人不应有的丧失信心和自我否定”，“给他留下了历史的污点”，但也认为纵观瞿秋白的一生，“功劳是主要的”。（《应当全面评价瞿秋白》，载十二月《历史研究》第十二期。）

其次，有四五篇文章是评论《〈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及鲁迅和瞿秋白的关系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不应否定》（载二月《文学评论》第一期），通过具体分析，否定过去一些批判文章的一系列论点，重新肯定“《序言》是一篇初步运用马列主义观点评论鲁迅的论文。”《通达彼岸的桥梁——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载十一月《社会科学战线》第四期），则认为《序言》表明瞿秋白“比较重视本本主义，不太重视鲁迅的社会实践”，“对鲁迅认识不足”等等。《鲁迅对瞿秋白“有所保留”吗？》（载九月《复旦学报》第五期），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篇“回忆”文章说鲁迅对瞿秋白有“看法”、有“保留”的说法是不正确的。《鲁迅和瞿秋白的革命友谊》（丁景唐作，载十月《社会科学》第三期）一文，系统论述、考证了瞿秋白和鲁迅的交往和友谊，并以大量事实驳斥了所谓瞿秋白“欺骗”、“贬低”鲁迅的言论。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还有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十一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的四篇：《关于鲁迅保护瞿秋白的经过》、《芸生是谁？》、《怎样解释鲁迅给黄源的四封信》和《鲁迅为什么没有编印瞿秋白的创作？》。

再次，还有七八篇文章，或叙述瞿秋白五四时期的经历，或评论瞿秋白的文学活动和文艺思想，都是肯定他对革命和革命文学运动的贡献的。其中，黄逸峰的《瞿秋白同志推行“盲动主义路线”的结论应当纠正》一文（载十月《社会科学》第三期），认为一九四五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当时的情况的估计有些不够公正”。“在‘八七’会议后，全国各地农民普遍武装起义，这种现象是历史的必然”，瞿秋白只是“防止盲动主义倾向不够，而且这个缺点有其客观原因和群众基础，不能说是盲动主义路线在党中央机关居于统治地位。”

除论文外，有一篇回忆文章《我所知道的瞿秋白》（羊牧之作，载十一月《党史资料丛刊》第一辑）。文章叙述了作者少年时期与瞿秋白的交往以及瞿秋白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后一段时间的活动。其中，作者凭记忆录出了瞿秋白一九二五年赠作者的四首五言古诗，叙述了瞿秋白一九二七年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前后与陈独秀、彭述之的斗争情况等，值得注意。还有《新时期》创刊号和《社会科学》第三期，刊载了瞿秋白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的序言，并都加了按语。按语说明了瞿秋白出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版时题作《湖南农民革命》）并为之写序的原由和经过。

《社会科学》第三期还发表了《上海学术界座谈瞿秋白评价问题》一文，报道前不久“有当年与瞿秋白一起工作过或有过接触的老同志、有史学、文学专业研究工作者，以及瞿秋白的亲属等共三十余人”参加的座谈会情况。会上“一致认为”瞿秋白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煞的”；“认为瞿秋白在历史上功大于过”。

一九八〇年

一九八〇年是瞿秋白就义四十五周年。

六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忆秋白〉前言》。文章回忆了作者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〇年与瞿秋白相处的情况。其中指出，瞿秋白在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代表团里就发生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同志们同张国焘和王明集团的斗争。瞿秋白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在党内的主要打击对象，我成了他们在青年团内的主要打击对象。现在来看，我们在莫斯科同米夫、王明集团的斗争是正确的，实质上是反对‘老子党’和大国主义的斗争。”

六月十八日，各报刊载了新华社关于“中国文联、作协、社会科学院联合举行座谈会纪念瞿秋白就义四十五周年”的消息，副题为：

周扬指出，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才识卓越的领导人，他的一生，将永远为人们所纪念。

消息说，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四十五周年座谈会六月十七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周扬、谭震林、周建人、沈雁冰、王首道、刘澜涛、李维汉、胡愈之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和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人士共三百多人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贺敬之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周扬作了题为《“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的长篇发言（全文载同日各报），高度评价了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的多方面的贡献。“沈雁冰、谭震林、李维汉在座谈会上回顾了我们党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介绍了瞿秋白同志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建立的历史功绩。曹

瑛在发言中介绍了瞿秋白的生平事迹，驳斥了‘四人帮’一伙对瞿秋白的诬陷。他说，瞿秋白被捕以后，丝毫没有做危害党和革命的事，而是坚信马克思主义，大义凛然，宣传革命，痛斥敌人，最后壮烈牺牲。”“座谈会上宣布，中共中央已批准有关方面关于蒐集瞿秋白同志的手稿、重新编辑出版瞿秋白文集的报告。”

本年，每个月都有许多评论、回忆瞿秋白的文章和一些有关考证文章以及其他材料发表于各种报刊，共约一百二十余篇。

评论文章方面，涉及的面十分广泛。其中，评《多余的话》的文章，有《我对〈多余的话〉的理解》（丁玲作，载三月二十一日《光明日报》）、《瞿秋白与河上肇——也评〈多余的话〉》（载成都《社会科学研究》第二期）等；《耿耿丹心，举世怀仰》（载六月《党史研究》第三期）也有一节专作评论。《我对〈多余的话〉的理解》的基本观点与去年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相同，认为瞿秋白自必死，“仍然心怀坦白，举起小刀自我解剖，他自己既是原告，又是被告，又当法官，严格地审判自己，他为的是什么。他不过是自己当作一个完全的布尔什维克来要求自己，并以此来品评自己的一生，这正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品质，怎么能诬之为叛徒呢？革命者本来不是神，不可能没有缺点，不可能不犯错误，倘尚能正视自己，挖掘自己，不是比那些装腔作势，欺骗人民，给自己擦脂抹粉的人的品格更高尚得多么！”文章还说，瞿秋白“是一个大勇者”，他“写《多余的话》时，仍是王明路线统治的时候，他在敌人面前是不能暴露党内实情，批评党内生活的，他只能顺着中央，责备自己，这样在检查中出现一些过头话，是可以理解的。”《耿耿丹心，举世怀仰》一文也指出不能根据《多余的话》“把烈士污为叛徒”，但不同意将《多余的话》说成是“光明磊落”的“自我解剖”而大加赞扬，甚至称赞瞿秋白同志写《多余的话》表明他是“大勇者”。另外，评论《〈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文章有：《鲁迅研究

史上的丰碑——重读《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兼与林志浩同志商榷》(载八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四期)、《不要拆毁那“通达彼岸的‘桥梁’”——和林志浩同志讨论《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再评价问题》(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第四期)等。

在回忆文章方面，较重要的有以下一些：

丁玲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载二月《文汇报增刊》第二期)描述了瞿秋白在上海大学期间的教学及与爱人王剑虹的爱情生活，还谈到她的中篇小说《韦护》与瞿秋白的关系，最后又评论了《多余的话》。

茅盾的《回忆秋白烈士》(载三月《红旗》第六期)回忆了瞿秋白在上海大学的情况、在“五卅”运动中的工作、一九二七年关于党的宣传工作的主张、三十年代与他及鲁迅的交往和友谊等，文章说：“我和秋白相识多年，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个正直的革命者，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一个无私无畏的战士，一个能肝胆相照的挚友！”

瞿独伊的《秋之白华——回忆我的爸爸瞿秋白和妈妈杨之华》(载三月《百科知识》第二期及《战地》第二期)，叙述了瞿秋白与杨之华在苏联的一个生活侧面，和瞿秋白一九三一年遭受王明等宗派主义分子打击之后表现出来的高贵革命品质，瞿秋白当时说：“革命需要我们做的工作多得很，不是没有工作做，而是做不完。”“只要对党有利的事都可以做，个人问题只是枝节问题，不必计较。”

周建人的《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同志》(载三月十六日《解放军报》)，主要叙述了瞿秋白与鲁迅交往的一些情况。其中说到，鲁迅书赠瞿秋白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可能这句话是秋白找来的，而鲁迅书写了。总之，这句话代表了两人的共同心愿”；又说到关于瞿秋白给鲁迅一封信上署名“犬

耕”一事。

瞿轶群的《回忆我的哥哥瞿秋白》（载四月《社会科学》第二期）和《怀念哥哥秋白》（载六月十五日《浙江日报》和六月二十日《文汇报》），回忆了瞿秋白的家庭和少年时代的生活境遇，介绍了在瞿秋白带动和影响下参加革命的两个弟弟瞿景白和瞿坚白，指出瞿秋白“自幼立志革命也终生这样实践，他临终是正直的，光明磊落的”。

史平（陈云）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发表在《救国时报》的《一个深晚》，在五月三日《人民日报》上重新发表。文章的内容概要见前（本书第一九六页）。

黄玠然的回忆《送秋白同志到鲁迅家避难》（载五月三日《光明日报》），叙述了一九三三年二月他任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长时，护送瞿秋白到鲁迅家里避难的经过。（按：这是瞿秋白第二次到鲁迅寓所避难。）

温仰春的《壮烈就义，气若长虹》（载六月十七日《文汇报》），记叙了一九三五年一月作者（当时任福建省委秘书长）负责安排交通线，送瞿秋白等人转道广州到香港而于渡汀江时被捕的经过。文章说：“瞿秋白同志在狱中，敌人问他交通线的情况，他一点风也没有透露。我们这条交通线一直很安全，没有受到敌人的破坏，福建省委及其他地区党组织也没有受到破坏。……这些，有力地证明了瞿秋白同志遇难之前对党是忠诚的。”

李维汉的《怀念秋白》（载七月十四日《北京日报》），回忆、评述了瞿秋白一九二五年参加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时作出的贡献、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主持“八七”会议及以后的活动、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米夫、王明撤消政治局委员后的态度等等。文章指出，瞿秋白“在我国革命道路的摸索过程中，在某些重要的问题上，有比较正确的见解，走在革命队伍的前列”；认为他的“左”倾盲动主义，“在政治上与李立三路线、王明路线不同，是在

执行八七会议总方针下，主要在秋收起义过程中犯的；在组织上也与陈独秀、王明、李立三不同，不是压制不同意见造成的。因此，我认为对此不应过于追究个人责任”；“他光明磊落，勇于自我批评，勇于承担责任，不揽功诿过，不搞歪风邪气。他的弱点是有点书生气，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较少”；并指出他在受到打击以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石联星的《秋白同志永生》和庄晓东的《瞿秋白同志在苏区》两文（载八月《新文学史料》第三期），具体记述了瞿秋白在中央苏区任教育人民委员期间主办高尔基戏剧学校等活动，和在红军主力离开江西进行长征以后他坚持工作的情况。

茅盾的回忆录第六、七、九部分（载《新文学史料》第一、二、四期）中，分别谈到了瞿秋白一九二三年在上海党组织中的活动、他与上海大学、《热血日报》的情况及他一九二七年在武汉的工作。

本年，报上还载有下列消息：“瞿秋白同志两所母校（按：江苏常州中学和常州觅渡桥小学）举行各种活动纪念瞿秋白就义四十五周年”。（见六月十九日《文汇报》）；“茅盾为瞿秋白故居题字”（见六月二十三日《文汇报》）；“宋副委员长给瞿秋白母校（按：觅渡桥小学）题字勉励少年儿童争取做好学生”，这则消息中还谈到茅盾给觅渡桥小学的题字。（见七月五日《文汇报》）

一九八一年

一九八一年每月都有关于瞿秋白的回忆、考证和评论文章发表于各报刊，共约九十余篇。

回忆文章方面，较重要的有如下几篇：

吴黎平的《在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关于遵义会议之前的片断回忆》（载七月《学习与研究》第一期）一文中，有关于瞿秋

白为什么未能参加长征的记述。文中说：一九三四年夏秋之交，中央局决定红军突围举行长征，“博古他们不让瞿秋白同志（当时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长）跟红军走。听了这事以后，我心里很难受，……请求毛泽东同志给中央说说。毛泽东说，他很同情秋白同志，他曾说过，但他的话不顶事。另一方面，我向张闻天同志提出同样的要求。闻天同志说，这是集体商量决定的，他一个人不好改变。秋白同志自己听到这个决定，精神上甚为不安。……他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十一月，吴黎平又发表《忆与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他》一文（载《学习与研究》第五期），回忆了瞿秋白一九二八年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与米夫、王明的斗争，以及一九三四年他在江西中央苏区的工作、思想和情绪。文中写道：“他写过不少诗歌，同毛泽东同志互相唱和，表示了自己的忧愤之情”；还说到，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曾经从遵义打电报给苏区的中央局同志，要他们妥善安排秋白同志。”

周君适的《瞿秋白同志在黄坡》（载七月《山花》第七期），回忆了瞿秋白一九一六年在湖北黄坡的生活情况及与表兄周均量（君亮）的交往。

羊牧之的《霜痕小集》（载十月《党史研究资料丛刊》第三辑），是对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作者的《我所知道的瞿秋白》一文的补充，多记瞿秋白的琐事。

茅盾的回忆录第十、十二、十三部分（载《新文学史料》第一、三、四期），有关于对瞿秋白盲动主义的简评、关于他在左联中的工作的评述、以及他对于《子夜》创作的建议等回忆。

在考证方面,《瞿秋白到瑞金日期订误》(载二月《新文学史料》第一期),根据瞿秋白狱中所写的《记忆中的日期》,指出一些回忆文章说瞿秋白曾出席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不准确的,瞿秋白是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离开上海,于同年二月五日才抵达瑞金的。《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补遗》(载四月《学术月刊》第四期),对一九五九年丁景唐、文操的《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作了增补。增补的内容有瞿秋白的一些笔名、别名和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的一些政论文目录。

评论文章方面,有《简论瞿秋白在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载五月《南京大学学报》第二期)、《简论瞿秋白的思想发展及其特点》(载六月《学术月刊》第六期)、《关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再评价问题》(载本年由湖北文学研究会、华中师院学报编辑出版的《中国文学研究》一书)等。《简论瞿秋白的思想发展及其特点》认为,除了从各方面论述瞿秋白的功过得失之外,需要研究他的世界观的发展过程及其变化;而在评论他的思想时,不能以《多余的话》为主要依据。文章认为瞿秋白的思想发展,可以一九二三年初为界,划分为前后期,而“真诚地追求革命真理,忠诚地为人民解放事业服务,毫不谋求个人权位和名利”的精神品格,是贯串他的一生的。《关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再评价问题》,对一九七九年《通达彼岸的“桥梁”》一文的一系列否定《序言》的论断,提出了反对意见。

本年,还出版了两本关于瞿秋白的书。三月,广西人民出版社的《瞿秋白诗歌浅释》(周红兴著),对瞿秋白四十余首诗歌作了诠释,并附有瞿秋白诗论辑录和《多余的话》。八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忆秋白》(《忆秋白》编辑小组编),内收陆定一为本书写的序言、周扬的《“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和解放以来回忆瞿秋白的文章三十二篇,以及《鲁迅著作中的瞿秋白史料》一篇。

此外，本年《近代史研究》第二期刊载了瞿秋白一九二七年写的《〈瞿秋白文集〉自序》（有几处文字与原稿不同，但刊载者没有说明），并附有《瞿秋白论文集目录》。

一九八二年

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至九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同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书中发表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报告中说：

对所谓瞿秋白同志在一九三五年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问题，重新作了调查。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对他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为他恢复了名誉。

这里，党公开宣布了对瞿秋白被捕问题的复查结果，为“文化大革命”中将他诬为“叛徒”一事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十月十五日，《文汇报》等报道了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动工修建的消息。消息说：座落在福建省长汀县城罗汉岭下的瞿秋白纪念碑（建于一九五四年五月——引者按），在十年动乱中遭受破坏，最近有关部门拨了专款，进行修建。

十一月，《新文学史料》第四期发表了原载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中华日报》副刊《小贡献》上署名施蒂而的文章《读〈子夜〉》，和瞿秋白给鲁迅和冯雪峰的信、给郭质生的两封信。《读〈子夜〉》前的编者按语，说判断此文是瞿秋白所作，是根据茅盾回忆

录《〈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中的说法。

此外，本年六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瞿秋白诗文选》（《瞿秋白诗文选》编辑小组编）一书。本年内，多种报刊还发表了关于瞿秋白的评论、回忆和考证文章五十余篇。其中瞿重华（瞿秋白堂兄瞿纯白之子）的《同叔父瞿秋白朝夕相处的几年》（载七月《人物》第四期），记述了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学习期间自学法文的情况，和一九二三年初回国后断然拒绝北洋军阀政府以每月二百元车马费聘请他为外交部顾问一事。茅盾的回忆录第十五、十六部分（载《新文学史料》第二、三期），回顾了一九三二年他与瞿秋白关于文学大众化的争论^①，提到了瞿秋白一九三四年一月离上海赴江西的情况。

^① 文中将瞿秋白的《大众文艺的问题》一文的标题，误记为《论文学的大众化》。《论文学的大众化》为冯雪峰所作，署名洛扬，载一九三二年四月《文学》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后 记

终于写完了这本小书，一个长久以来萦绕于怀的心事总算了却了。

我自童年时代起，就对瞿秋白怀着深深的敬意。瞿秋白是我的舅舅，我母亲的哥哥，比我母亲大一岁。我最早就是从母亲那里知道他的，那是在解放前一、二年暗无天日的时候。我至今还记得她是多么激动而又隐约其辞地对我们说，我们的一个舅舅是被万恶的国民党枪杀的！我当时还很小，不胜惊诧，但也已感染了母亲的愤怒，和对这位亲人的深切怀念。不久，全国解放，我进而从许多报刊上越来越多地知道他的事迹，并懂得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上染有他的鲜血。我在红旗下成长起来，对瞿秋白的敬爱也与日俱增。一九五九年我进大学中文系学习，兴趣渐渐集中在现代文学方面，自然就很想对瞿秋白作点学术性的研究，来寄托自己的感情。但因为能力薄弱，很长时间里不敢动笔；后来略有长进，写了一、两篇有关文章，正待继续钻研，又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在那十年中，专家前辈，都被迫搁笔，更不必说我了。然而，种种颠倒黑白的“批判”，横暴恣肆的“裁决”，并未使瞿秋白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倒坍下来。我总觉得，他虽有错误和弱点，但无愧于革命先烈的称号。我仍然心仪于他真挚地追求真理的精神，毫无保留地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品质，光明磊落的风

格，和喷泉般的不竭才思；仍然坚信他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的劳绩是不可磨灭的。我母亲更是愤然不平。当时电台经常播放《国际歌》，她曾几次对我说：“你大舅舅是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过来的，又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的，怎么反倒成了革命的罪人！”因而，在四凶垮台不久，母亲就让我代她写信，向有关领导提出了给瞿秋白平反的请求；并希望我能写些这方面的文章。这时，我自己也同样有这种无法抑制的冲动，而且感到公开写出自己的看法的时候确已到来。于是我尽我所能，着手收集资料，进行认真的研究，准备写这本小书了。前年十月，母亲突然病逝。为了尽快实现她的遗愿，我即仓促上阵，开始了写作。现在这本书稿草成，总算表达了我对于先烈的一点真情，偿了宿愿，也差可告慰母亲于地下了。

由于才识本来不济，准备又不充分，这本书稿的内容当然是十分粗陋浅薄的。不过我知道，感情不能代替研究，感情用事的评论并不是对瞿秋白好的纪念。瞿秋白本人的自我分析和自我评论，就是实事求是，不尚虚饰的。所以我在酝酿和写作的过程中，时时提醒自己，不能因为景仰先烈，有所溢美，失去实事求是的态度。相反，凡我认为是他不足的地方，又应当触及的时候，我就毫不避忌地写出来，并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作力所能及的分析，以期比较全面地体现他的本来面貌。我想这样做，或许有助于人们对他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评价。我希望同我一样对瞿秋白怀有深厚感情的人，能够理解我的心情。同时，对于别人已有的评论，我也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和现有的认识，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或取了新的角度，希望其中会有一二可取之点，能对瞿秋白研究作出些微的贡献。至于粗陋浅薄和错误不当之处，我由衷地期待着同行的批评，专家的指教，使得我们共同从事的瞿秋白研究不断有所开拓，有所前进。这是我更殷切的希望。

最后，我要对丁景唐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本书的酝酿和写作过程中，他对我的指点，使我得益不少。不仅如此，丁景唐同志还一直在精神上给我以热情的鼓励和督促，在资料上给我以慷慨的帮助和支持。这些都是我永远难忘的。此外，林远同志为本书封面题字，也谨在此表示我的谢意。

王铁仙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五日。写完后，见报载新华社四日讯：根据党中央按原样重新修复瞿秋白墓的决定，瞿秋白烈士墓已修整一新。欣喜之余，附记于此。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瞿秋白论稿

作者 =

页数 = 2 3 9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
封底